

目 录

(一) 1945 年后三个月	(1)
小引	(2)
45 06 山头会议	(2)
45 07 在延安我活动的“四至”	(5)
45 08 从延安到张家口	(6)
(二) 1946 年	(12)
小引	(13)
46 01 从张家口到北平	(13)
46 02 李克农和我的一次谈话	(15)
46 03 我在北平独立工作	(18)
46 04 同事们陆续到北平	(23)
46 05 三道栅栏四十一号和方壶斋九号	(25)
46 07 我们走在大街上,坐在电车里	(35)
46 08 报童和特务	(38)
46 09 四月三日清晨	(42)
46 10 《特务现形记》	(50)
46 11 特务赶跑之后	(54)
46 12 胜利归来	(57)

46	13	“四三事件”后的北平《解放》报	(59)
46	14	查封	(63)
46	15	罗瑞卿保护我们进解放区和仓夷遇害	(70)
46	16	桑干河上	(73)
46	17	快马加鞭回延安	(75)
46	18	清凉山上	(76)
46	19	一篇毛泽东修改过的不发表的社论	(77)
(三) 1947年			(81)
		小引	(82)
47	01	“中央土改工作团”的组成和出发	(82)
47	02	理发室里的收藏	(85)
47	03	保德新哇村	(88)
47	04	新哇调查	(92)
47	05	残疾的手指	(93)
47	06	我来到了滹沱河边的贾峪	(96)
47	07	重访贾峪村	(97)
47	08	全国土地会议	(99)
47	09	全国土地会议后贾峪的土改	(100)
47	10	刘少奇同志同工作团全体团员的一次 谈话	(102)
47	11	平分土地的研究	(104)

47	12	刘少奇给我的一个锦囊妙计	(107)
47	13	如果你是列宁那时该怎么办?	(109)
47	14	冀中十分区土改	(111)
(四) 1948 年			(115)
		小引	(116)
48	01	介绍一点渤海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	(116)
48	02	我所知道的渤海土地工作会议的情况 和听到的康生的言论	(119)
48	02	康生说刘格平这个人真怪	(120)
48	03	毛岸英在渤海	(122)
48	04	董家佛堂	(126)
48	05	解放了的石家庄	(133)
48	06	到中央宣传部的第一晚	(135)
48	07	工校艺术科	(136)
48	08	你写的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138)
48	09A	“秋游”	(140)
48	09B	总支学习委员	(141)
48	09C	琐事	(142)
(五) 1949 年			(144)
		小引	(145)
49	01	迎接全国解放的一年	(146)

49	02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48)
49	03	在“劳动大学”的时候	(158)
49	04	上海探亲	(164)
49	05	人民政协的召开和胡乔木要我做的工 作	(166)
49	06	成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84)
49	07	1949 年的《学习》	(186)
49	08	大红罗厂	(188)
49	09	开国大典	(190)
49	10	政治课的今昔的见证人	(195)
49	11	三大系统的政治课	(204)
49	12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的 一个材料	(207)
		后 记	(213)

(一) 1945 年后三个月

小 引

这一年,我写的只是三个月的故事,内容一看便知。

45 06 山头会议

七大之前的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只总结了抗战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李立三、王明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但是到1945年七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抗战已经八年了。毛泽东在七大之后,提出要总结抗战时期历史经验的建议。为此,提出先按各“山头”开会,回忆与研究抗战时期党的工作状况,为总结抗战后党的历史经验作准备。

各个根据地的山头会议开得比较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说彭德怀在一个会议上“骂娘”。我一听就明白，毛泽东说的那个会议，就是我知道的山头会议中的彭德怀那个根据地的山头会议。

要我参加的山头会议有三个。一是“一二·九山头”。“一二·九”虽然发生在抗战以前，但是“一二·九”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在抗战爆发之后，“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也可以算做一个小小的山头。这个山头的山头会议是在中央青委举行的。但是抗战之后，“一二·九”毕竟算不上一个实体，算不上一个“山头”，只开了一两次会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

二是“湖北山头”。抗战后我在武汉工作了一年，从1934年秋到1937年秋做过武汉临工委的委员、湖北省工委农委的委员、长江局青委书记和委员。经过延安整风，自己的认识提高后，回头看，认为王明、董老之间存在不同的指导思想，而且对这不同的指导思想产生的后果也了解了一些。比如王明，他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同蒋介石搞好统一战线上，用过多的力量去做上层工作，而对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基础、准备打游击战争不予重视，对国民党同我们的斗争的警惕性不够等等，对武汉、湖北乃至在整个长江局领导的范围内的各个地区造成许多恶果。在会议上，我讲起郭妙春的事情。她是武昌的一个女中学生，武汉青年救国团的积极分子，后来加入了党。在武汉沦陷后，她同一些同志从武汉去鄂东地区，那时候他们得到了若干支枪，由于缺少警惕性，枪支不是扛在肩膀上，也不

是拿在手上,而是把枪捆起来,两个人抬着枪走。也没有学点射击技术,结果想得到这些枪支的人眼红,把她杀害了,枪支也被抢走。我也回忆了贵州民先队员张益珊被贵州当地反动派杀害的事例。我们在山头会议上就讲了董老(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特别重视在农村中打游击的指导思想,减少了王明路线的有害影响。并且指出,如果不是王明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当时利用武汉的有利形势,动员更多的人到农村去,对以后湖北省的武装斗争会有利得多。

武汉山头会议有几次是在中央党校开的。我得到通知时说,这个会议由钱瑛大姐主持。我在湖北省农委工作时,钱瑛大姐是组织部长。我第一次去中央党校找钱大姐,结果找到了另一位参加辽宁山头会议的钱大姐,因此我多认识了一个钱大姐。

三是“广东山头”。1938年到1939年我在广东省委做过将近一年的工作,包括广州沦陷前在粤北翁源和韶关的工作,对于广东省委这段历史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终究不如在武汉时那么深,我认为这个时期广东省委的书记张文彬工作问题并不大。

山头会议还在开,就得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抗日战争胜利了,传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山头会议不要开了,大家赶快准备离开延安,出去抢桃子吧!这个山头会议就不了了之了。

45 07 在延安我活动的“四至”

快离开延安了，我曾想到，我在延安时最远都到过什么地方，即我活动范围的“四至”是什么。所谓“四至”就是东南西北，我最远都到过什么地方。

在延安，我活动的“四至”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四至”不是一个概念。在延安我活动的“四至”，只包括延安市和延安县。我只写延安的“四至”，不是写陕甘宁边区的“四至”。如果写陕甘宁边区的“四至”，1939年我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就经过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看见过关中的塬地，它同延安地区的丘陵不一样。要说陕甘宁边区的“四至”，最南就是关中地区。最北我到过绥德地区，离开延安到张家口，就是在葭(佳)县过黄河，到山西临县的。我还到过延属地区的安塞，那就是和狼见面的地方，属于东北方向的“一至”。我没去过三边地区，也没有去过陇东地区，这就是说陕甘宁边区没有去过“甘”和“宁”，只去过“陕”一个地方。

现在我讲我在延安的“四至”。假如只说延安市，最北是到过蓝家坪北的中央医院。中央医院的院长何穆是个肺病专家。我到中央医院是因为自己觉得老是神经衰弱。在自然科学学会工作时，我认识了何穆院长——解放后他在通县一个肺病专科医院里当院长。一天我去了中央医院，背了一个大背包，在门口挂号，管挂号的人问“病人是谁”，我说“就是我”。管挂号的人见我这样背着大包，十分诧异。那时没有查出什

么病,我的收获就是到了延安市最北的地方。我还到保育院看过吴学毅。但我弄不清楚那个地方究竟是在中央医院的南边还是北边。

最西大概就是杜甫川了,这里说的是西南方向。西北方向也许可以说是去过枣园。最南涉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问题。最东就是到过桥儿沟,我去过的柳树沟已经属于延安县,不属于延安市了。

我还到过过一个地方就是龙儿沟,我到那里去过两次,我想它也不会是属于延安市的,到那里我们是两条腿走去的,有比较远的感觉。但是它到底在哪里?东南西北,一点也说不清楚。

总起来说,我在延安期间活动的范围实在太狭窄了。

45 08 从延安到张家口

再见吧,延安!

我在陕甘宁边区呆了六年又好几个月,除了走了一趟绥米之外,一直都住在延安市。在延安,尽管挨过整,住过特别班,对有些社会现象也看不惯,但靠自己的那个“革命阿Q主义”,过得还是愉快的。在这些年中一直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战争已经八年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党的力量在不断增长,解放区在不断扩大,但毕竟还在农村,而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天地也毕竟太小了。看到延安人一队一队离开延安,出去“摘桃子”,朋友们一个一个地向我告别,明知快轮到自

了,还真有些坐不住了。11月底,终于盼来了我们延安大学也要前去东北解放区的消息。延安可爱,但在广阔的土地开展工作更有吸引力。再见吧,延安!

在12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开拔了。

张家口是1945年8月下旬解放的,是华北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从延安到张家口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只能步行到那里。因此整个延安大学组成一个行军大队。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各组成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之外还有一个由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和校部的人组成的一个大队的直属队。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队队长。不过其他三个中队并不走在一起,基本上我没有管。我这个大队秘书是虚的,直属队长的工作才是实的。直属队人数少,但有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有大人也有几个小孩子,需要比较多的照顾,条件也会好一点。特别是队伍快出发时,自然科学学院中队提出,自然科学学院有一些年纪很轻的女同志,跟着他们的中队走,可能比较吃力,可否到直属队来。大队长周扬同意了。我这个直属队长的队伍因此又扩充了七八个队员。其中就有我现在的老伴孟秀英,现在改名孟苏。

先介绍一下一路的基本情况。从延安到张家口,每隔几十里设立一个兵站,负责帮助过路的人顺利完成“行军”的任务。这些兵站把过路的人住的、吃的地方都事先安排好。第二天一清早,大家按时起床,简单地盥洗完毕,这时兵站事先已经动员好的当地老乡带着自己的大牲口就来了。每个大牲口都负有一个可以捆铺盖卷的木架。这时候大家把铺盖交给

老乡，老乡就把铺盖捆到木架上去，然后大队人马就出发。中午大队人马和老乡在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吃一顿饭，略事休息就接着走，到傍晚就到了下一个兵站，把铺盖卸下来老乡就回去了。我们又在事先安排好的地方吃晚饭，过夜，第二天把前一天的活动方式再重复进行一遍，去第二个兵站。因为行军的队伍多了，兵站的这项工作组织得很好，我们从延安出发，一天一天都这么过日子，每走一站我们就离张家口更近了一站。

直属队人少，但是事先给兵站打招呼要的牲口多，它的条件比别的中队优越。除周扬和苏灵扬，张如心和何锋两对夫妇以及何干之夫妇一直都配了坐骑外，还多要了两头牲口，准备给走不动的人坐。我身体很好，那时我才过三十岁，很强壮，根本没有想骑什么马，我对我自己的两条腿有很大的信心。

没有想到，上路的头一天我就把脚崴了，崴是陕北话，指的是脚背上的肌肉因为没有走好，受了伤。原因是我不注意路不平的情况，老是在一侧倾斜的路面上走。第二天我又坚持走了一天，第三天就实在不能走了，当时还没有出陕甘宁边区，我不得不占用了准备给别人用的坐骑。我本来是照顾别人的人，却变成了受照顾的人。周扬、张如心等人的坐骑是兵站配的，我保证他们坐的是马，可是我自己骑的可真热闹了。马、骡、驴、牛，还有骆驼都骑过，只是没有骑象和鸵鸟，在全国都没有这样的坐骑，更不要说在陕北和晋西北了。

“马背哪有牛背稳”。可是走起路来牛可真慢。它就是

个慢性子。自然科学院来的同学就一下一下地抽打这头牛，但它还是稳如泰山般慢慢地行进。于是我就像张果老那样倒骑着牛，在牛背上给她们说话。其实这些年轻的女同志很会走，也挺能走。自然科学院中队负责人说怕她们走不动，完全是多余的。

当我不得不坐在牛背上的时候，她们却迈着轻快的步伐，挥着树枝，驱动我的坐骑。跟着我们这个直属队走的自然科学院的同学，她们的名字我都还记得：谢巧华、席小三、王秋玉、赵凯、陈平、陈平中（她们是姊妹俩，陈平是姐姐，陈平中是妹妹），还有一个现在是我的夫人孟苏。一起走了几天，我看到她们都很能吃苦，但是我还是想使她们少注意些走这么长的路的疲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只有给她们讲故事，古代的、现代的、编造的、真实的、亲身经历的、别人讲给我听的、有教育意义的、没有教育意义的、好笑的、并不怎么好笑的……都讲给她们听。不过路实在太长了，讲到最后，快发生故事枯竭的危机了，旅途也快结束了。

那些女同学身边带的东西中有一种自制的产品，大概是以以前别人从来没有用过的，里面絮着棉花的面罩。用上它面部就不怕冷了。当然走路不能不看路，所以在面罩上留下两个窟窿。她们说这是在延安时听人说这次行军是在冬季，在路上会遇到很冷的地方，会用得着这个东西。看了这个东西，就让她们戴着给我看看，觉得真滑稽。不过这是实用的东西，美观是不重要的。大家都还是带在身边了。

一路上，天并不那么冷，她们都没有用。延安到张家口每

个兵站相隔都只有几十里(这是为我们这样慢行军的人安排的,如果有的队伍愿意强行军,可以一天走两个兵站)。我们早上出发得不特别早,到下一个兵站的时间也不特别晚,没有遇到寒风刺骨的情况。只是到左云这一天,路程特别长,天色也完全黑了,我们还在路上,而且也刮起风来了。我提醒她们,这面具你们带了一路,为什么现在不拿出来试试。真的,她们把这东西罩在脸上,好在夜间路上没有其他行人,如对面来人,见到这样一副面孔,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会吓一大跳。走了一段路,我问她们,这东西有用没有,她们一齐回答“管用”。有一个女同学把它摘了下来,让我试试,我就戴在自己脸上,真的舒服不少。

那一晚真冷,我穿着棉袄棉裤,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穿、光着屁股那样,风直往衣服里面钻。这时候我明白了穿皮子衣服的意义。皮挡风的性能,要比棉花好得多。

那次,几乎每到一个兵站,我都会丢掉一件小东西。丢三落四是我的老毛病,但在这一次得到了集中的表现。人家笑我,我说就算是在每个兵站都留个纪念品给当地人吧。不过那时我实在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丢。

没有想到,到了阳高可以上火车到张家口。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件好事,可以少走两天路。少走这两天路,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可以在1945年年底以前赶到张家口,否则元旦还会在路上过。

我们坐的是闷罐车,没有一个窗户,本来是装行李的。坐在里面,外面的景象一点也看着不着。车晃得厉害,但是大家都

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人说,这些年我们的同志对铁路线都是横着穿过去的,可是现在是在铁路上直着向前进。大家回顾坐火车的历史,坐过各种火车,惟独没有坐过我们共产党自己的火车。

张家口,我们华北解放区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终于到了。多少年我们都在农村,因此看到其实只是中等城市的张家口,就仿佛到了世界的大都会。房子高大,道路宽阔,城市的灯光在我们面前大放光明。

中国也正在大放光明。

(二) 1946 年

小 引

这一部分主要写上半年我参加办北平《解放》的故事，讲得很集中。下半年写的回张家口和重返延安的那些故事，就比较零散了。

46 01 从张家口到北平

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东北解放区。没有想到，到了张家口之后，听说到东北解放区的路不太好走，要我们在张家口等待。更没想到当我还在路上的时候，中央组织部已经决定分配我去北平办报，电报已经打到张家口等我了。周扬到张家口第一件事就是去晋察冀中央局报告我们这个大队已经到达了张家口。他从中央局带回两个消

息,一个是从张家口到东北解放区的道路有阻,还有一条是中央决定我立即去北平办一张报纸。周扬只是口头通知了我,并没有让我看调令。我问周扬党组织要我在北平参加办的报纸究竟是什么样的,要我去北平做什么样的工作,办报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周扬说这些中央局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只收到一个调令。我一想在张家口既然没有人可以问,也就不必问,到了北平,见到那儿的党组织就都明白了。周扬告诉我,中央局的同志告诉他,我到北平后要到军调部我们方面的委员叶剑英那里报到和请示,他们住在北京饭店,军调部有一位李克农,是叶剑英的助手,帮助叶剑英处理日常工作。

于是,我立刻做准备,在做准备时有一条我倒想到了,我想去北平开展工作,如果有一些可靠的、有用的社会关系,是一定会有好处的。我曾经在北平住过十来年,我的舅父舅母和好几个表弟表妹抗战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平。他们和我一直很亲近,是很可靠的社会关系。在这城市中还有一些老师和同学,除这些人之外,我还想在北平多找一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短时间内我找到两个,一个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教员聂春荣,他说自己有个表弟在前门外打磨厂的一个字号里当掌柜,姓孟。还有一个是张家口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苏子衡,他是台湾人,解放后是我们台盟的负责人。他在北京有家,准备让他的妻子回北平走一趟,处理一下家里的财产,然后就回张家口。他的妻子当时正在北平,就住在西单的一条胡同里,她的名字叫甘莹。

我在张家口只停留了两三天,就坐飞机去了北平。这是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坐的飞机很小，是军调部的军用飞机，面对面的凳子可以坐八个人，那天党的方面坐飞机的共三个人，除我之外，记得的还有伍云甫。三个人到齐后，很久很久飞机不起飞，说还有上飞机的。等了半天，上飞机的人来了，原来是三具国民党方面翻车死掉的报务员的尸体。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同死人一起升天的。

那天飞机飞过八达岭的时候，颠簸得很厉害，我的耳朵很痛，过去我不知道坐飞机有耳痛的问题。

我到北平的时间是1946年1月4日。

46 02 李克农和我的一次谈话

到北平西苑机场后，军调部我方的同志把我接到北京饭店——三方总部的所在地。我一到，马上见到了李克农。抗战初期我在武汉见过李克农，但是以后同他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在延安时我只知道他在社会部工作，虽然多年不见，这次在北平我还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他圆圆的脸，不高的个子，唇上蓄有小胡子。那天他一见我很高兴，那会儿似乎也不忙，从从容容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一大篇话。

这篇话的大意，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先对我讲了一通办这张报纸的意义：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南京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全国性政治中心。我们党在南京要做许多工作，我们党办的《新华日报》也要从重庆搬到南京。同时，日本投降后我们党中央也不能一直待在延安，也要

搬出来。党中央很可能搬到北平来。北平虽然同延安不一样，不是解放区，我们也不能把国民党的势力统统赶出去，但是城外四周围都是解放区，城里我们党的力量现在就很强，党中央搬来后，我们在北平就会占绝对优势。北平就会成为以我们党为主的另一个全国政治中心。那时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就会搬到北平来编辑发行。你们来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来办做准备的。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新的名称，报头也就用延安《解放日报》的那几个毛主席写的字。你们现在好好工作，将来延安《解放日报》搬来时，一切就都现成。

听了李克农的这些话，我对办这张报纸的意义和它的前途非常清楚，情绪也非常兴奋。以后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李克农所说的那样。我们1946年在北平要办的那张报纸，后来被国民党北平反动当局查封了，没有能够办下去。具体情况下面我还要详细讲。1949年我们进城以后，也办过一个《北平解放报》。这份《北平解放报》我还买到过一份合订本。人们很容易把它和我们的报纸弄混。因此需要特别说明。它同李克农说的《解放日报》不是一回事，而且后来代替延安《解放日报》的，也不是李克农说的《解放日报》，而是原来在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这个《人民日报》现在还在办。它在北平开始发行的时候，是当时的《北平解放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即《人民日报》要搬到北平的时候，这张《北平解放报》就停刊了。

那么李克农讲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李克农对我讲这一篇话的时候，即 1946 年初，党中央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在日本投降之后，有一个短的时间，我们和蒋介石还没有撕破脸。这时候中国人民，乃至许多外国人，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不再发生内战。我们应该顾及他们的情绪。而且我们当时也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争取使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并没有丧失警惕，一刻也没有放松战争的准备。我们一直强调要以斗争去争取和平。后来形势明朗了，和平民主的局面不可能实现，国民党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但在 1945 年 12 月底到 1946 年 1 月初，那样想一想、说一说，我认为并非不能允许。即使以后没有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延安《解放日报》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所写的《和平实现了》这样的评论，表达对和平的一种热望，讲一些代表中国大多数居民的心愿的话，应该说是正确的。历史证明事实正是如此。

在 1946 年初，利用当时的条件，党中央在北平创办了这样一张报纸，意义的确十分重大。

李克农给我讲的这段话的意思，以后没有再从任何方面听说过。不论正式的传达或非正式的谈话中都再没有听说过。我自己当时除了对姜君辰讲过之外，也没有再对谁传达过。我也不知道报社的其他负责同志是否听到过这样的意思的话。说来奇怪，对党为什么要办这张报，我们这张报纸的前景如何，报社内竟没有议论过。

我们这张报纸的名称、报头，后来完全是按照李克农对我说的那样做的。报社的总编辑钱俊瑞是 3 月间到职的，那时

候以“解放”两个字为报头的报纸已经发行了。副总编辑姜君辰是1946年2月初到职的,他赶上了这张报纸的创刊。我想这张报纸的名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李克农的话传达的是中央的考虑。确定报纸的名称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除了党中央外,决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作主的。那一天,李克农还给我讲了不少关于军调部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来北平是同三个死人一起上天时,他说,像这样的报务员,如果死在国民党统治区,那些反动家伙就会像死了一条狗似的,说“活该”。可是这次因为死在我们解放区,他们就大做文章。即便是由于他们自己不小心在张北翻车,我们毫无责任,他们也要大肆宣传,给人的印象是死得不明不白,暗示可能是我们害了他们。就是这样的原因,你才会同那三具尸体一起上天旅行了一回。

46 03 我在北平独立工作

在姜君辰来到北平以前,北平只有我一个人在办报。当问李克农我该怎样工作时,李克农说:党中央正在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他们来了,你就同他们一起工作。不过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你也要抓紧时间,能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比如办报总要有印报用的新闻纸,你就应该设法多买些纸,保证一编出报来就可以印刷发行。报纸出版后,纸张的供应不能让它中断。你也可以设法去联系敢承印这份报纸的印刷厂。这些只要有办法,你就可以先做,不要等待别人来。你有解决不了的

事情,就来找我。

当我告诉他自己在北平有不少亲戚、同学、老师等时,李克农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在北平办报就要多了解些北平居民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感情。你的这些社会关系很有用。

和李克农谈话后,我立即开始工作。

首先是买印刷用纸。我找到了打磨厂孟掌柜的那个字号。孟掌柜虽然是商人,但对我们党的态度很友好。我向他说明我的要求后,他立即说他有办法把纸买到。过了不几天,我找到他时,他已把可以买纸的数量、规格、价格、交货日期和暂时存放的地点,都落实了。我对他提出的价格等等表示都接受,并且对他表示感谢。他报给我的数量当然是不够的,他说还可以继续想办法。在买纸方面,我也找了甘莹女士。她也告诉我可以想办法。可是她后来告诉我,可以买到的纸的数量太少了,于是我就不想再麻烦她。我想不如靠孟掌柜去继续努力。

关于印刷厂,也是通过孟掌柜的关系,找到西直门内大街靠近新街口路北的长城印刷厂。这个长城印刷厂只是有几间临街门脸的房子,说是“厂”,其实只是个手工作坊,只有一台对开机。掌柜的倒是很热情。我一想,光靠这个作坊是不行的,但是这个关系还是有用,于是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以后我们还是用上了这个印刷厂。

我想到办报总要有房子,于是就动了买房子的念头。我找到李克农讲了我的想法。李克农说,这件事是应该办的,你可以努力去办。我问起钱的问题,李克农说,几千块钱我们党

组织是可以出的。你去找,要多少钱,再来找我。于是我印了一盒名片。名片上用的是重庆《新华日报》秘书的名义。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秘书”的职务是不低的,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我就用这个名片在社会上找房子。我通过我的亲戚朋友打听,哪儿有房子要卖,也用名片上刻的名义去活动。最后我找到三四所房子。第一所是在前门内的顺城街,地点大概就在现在新华社大厦附近。在那个地点我见了房主——一个挺时髦的三十来岁的太太。见面后她和我拉近乎,说她在南京中央饭店见过我。南京中央饭店是个阔佬们去的地方。我不置可否地应付着。她陪我看了房子,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房子的质量可以,那所房子的位置我也满意。价钱开口要3000元,不算便宜。主要的问题是我觉得房子太小,这件事就没有再积极进行下去。我还看了另外两处,条件还不如这一处。

这些事我一直在做。另外对北平居民作调查的工作,我更有兴趣,因为我毕竟不是善于做行政工作的人,社会调查研究才是我的本行。到北平后很快地找到了我的一个表妹。她的家庭就是我到北平后的第一个调查对象。她和她的丈夫不但对我这个表哥很热情,对我们党的态度也很好。他们介绍了听到的北平居民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解放军说的好话。表妹还告诉我,她丈夫有一个当医生的弟弟,听说叶剑英在北平曾经作过一次体格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北平的医务界都传开了,说国民党高级官员吃喝嫖赌,总会检查出这种或者那种病,而共产党的将军身体却这么好……这位表妹是我姨母

的孩子。

她还有一个表妹,那时也在北平的辅仁大学上学。有一次我去她家,那位表妹正好也在。我这位小表妹,那时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苏联军队在东北搬机器,对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在东北做事的一个工程师,被我们镇压)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她不加掩饰地对我讲了自己的观点。我同她争论了一通。她还告诉我,第二天在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有一个青年集会,她要去参加。我就提出要她带我去。第二天她带我去了,中山纪念堂站满了人。开会时我就站在她的旁边。会上国民党青年工作的骨干们一个一个地演讲,进行反共反苏的煽动。听了后我了解到他们的反动宣传都讲了些什么。当有一个特别会作反动煽动的家伙讲话时,我那个小表妹竟激动起来,跟着举手喊口号。我就在她耳旁训斥了她一句:“你起什么劲!”

北平有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举行的反苏游行,我估计我这个表妹也会参加这次游行。参加这次游行的人不算少。游行队伍有意从翠明庄我们党的招待所门口经过,在门口高喊口号。当时我和几个同志在楼上屋顶观看。我对他们说,这些青年,将来觉悟过来申请入党时,必须对这次行动进行深刻检讨,无论如何这是她(或他)历史上一个很不光彩的问题。后来我那个小表妹果真如此。我这个表妹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受国民党影响的群众,同那些在中山纪念堂演讲的家伙性质是不一样的。将来就不能那么轻易放过那些家伙,他们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从这个表妹处得知,我还有一个表弟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我就去了沙滩,到了后来成为中宣部的那个大院,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见到了他。他的同学听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纷纷跑到他宿舍来。屋子里四张双层的床上都坐满了人,还有一些人挤到宿舍里来站着。有一些学生实在挤不进来,就站在宿舍门外。那些学生们提了许多问题,我一个一个地回答了他们。这次活动既使我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中知道了这些学生心里都想些什么问题,也做了一次有针对性的宣传。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有一位化学系主任张子高教授,在日寇占领时期一直没有离开北平。我从张家口到北平时就准备去看他,而且记下了他城里的住址。到北平后我找到了他。我没有听过化学系的课,但他听说过有我这样一个清华学生。到他家和他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问他自己和周围的人对时局的看法,并且向他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房间里闯进了一个人。这人二话不说,就对张子高说:“我最近听到一些关于共产党的消息:朱毛不和,朱要打仗,毛主张和平,互不相让。”接着他又说,“现在北京郊区就有所谓解放区。那儿的老百姓的日子很悲惨。对日子稍微好过一些的人进行斗争。逼得许多人上吊,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共产党还起了一个名词叫‘扫地出门’。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个人讲得很起劲,讲的话远远不止我现在复述的这些。我开头听他讲,不吭声,想听听他会讲出些什么。接下来实在忍不住了,就说:“我才从解放区来,这位先生说的完全是谣言,不符合事实。不应轻信谣言、传播谣言。”这时候张

子高就向他介绍我,说:“这位是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郁君,抗战后一直在延安和解放区工作。”并把他介绍给我:“这位是辅仁大学的刘教授,是数学家。”在这间房子里,有我这样的人,而且说出这样几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我是北平的学生,想不到是共产党人。当时他就很尴尬,也很吃惊,只得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子高先生正在会客,我家离这儿很近,以后有机会再来。”说着,急急忙忙地走了。

他走后,我问张子高:这样的人在北平多不多?他说不多,但是从解放区来到北京的人说什么话的都有。人们有的信,有的不信。我又问这位教授是怎样的人,他告诉我这位教授同国民党似乎有点关系,曾经是加入过共产党也加入过国民党的跨党分子。并告诉我:“他的妻子还进过清华。这对夫妻政治兴趣浓厚,一般教授不像他们那样关心政治。”

我一个人在北平的时间不算长,但我接触的面还不止这些,我还接触到从事各种职业、各种觉悟程度的人。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46 04 同事们陆续到北平

我一个人在北平紧张地工作了几天,收到的效果不算大。在我的工作中有一个失算,那就是我没有想到应该要求李克农帮我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取得了联系,我工作的效果肯定会好得多。同事们陆续到北平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情况就大不一样。

报社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从张家口、延安、重庆、山东和东北几个地方调来的。就近从张家口来的，以原先延安大学的人最多。这是因为延安大学的干部去东北解放区的道路受阻，正在张家口停留，调动方便。我是其中的第一个。除我之外，从延安大学调来北平的，要数姜君辰和余修比较早。姜君辰是30年代就已经从事研究和著述的经济学家。1944年到延安后在延大财经系当主任。他来报社时，还没有明确报社究竟由哪几位负责。可能因他年龄最大，资历也深，就负起主要的责任来。来后他也住在翠明庄，我和他天天见面。我把自己一个人在北平做的事告诉了他，然后我俩分头活动，交流情况，商量工作。余修是“一二·九”运动时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年龄也比较大，在延安大学当教育系主任。到北平后，报社人事工作暂时就由他去抓。

以后从延安调来北平的干部也不只是延安大学的了，有从别的单位调来的，而且不是一批，分好多批来的。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这时从延安来到北平参加报社工作的还有余宗彦、张蓓、陈笑雨、刘稚农、祖田工、肖英(女)(还有一个男肖英是从晋察冀日报社调来的)等，他们都是延安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和新华总社的人。他们来北平谁早谁迟，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几位来得比较早。我到北平后不久就见到其中一位。我曾经对他说：我也是从延安来的，走了二十多天才到的张家口，而转到北平走了快一个月。你从延安出发，当天就到北平，还是坐飞机快得多。不过那时坐的飞机远不如现在舒服。

46 05 三道栅栏四十一号和方壶斋九号

到1946年2月中旬,来北平办报的人已经不少了。有从事编辑工作的、采访工作的、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也有从事行政工作、人事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办报可以说初步有了个班子。也就在这时候,在张家口担任法院院长的阮慕韩,把他在北平的一座私人住宅交给我们报社使用。那是一所两进的小四合院,十几间平房。有了这个院子,报社一部分人就可以搬进去办公;报纸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发行;报纸登记也有了地址。我们这张报纸的最早两期,就是在这个三道栅栏胡同四十一号编辑的。

三道栅栏胡同四十一号是阮慕韩的住宅,也是北平地下党的活动地点,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房子的产权已经是归属阮家了,不过,现在是别的单位在使用。阮慕韩很早就在北京工作。在1934年至1946年12年内这所房子一直是我党北平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并且从未被国民党反动派或日寇破获过。30年代在这里活动的著名早期革命家除阮慕韩外,还有王世英、张友渔(建国后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副主任)、杨秀峰(建国后教育部部长)、南汉宸(建国后财政部长)、孙文淑、张申府(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刘清扬、邢西萍(徐冰)、何松亭、钱应麟、阮务德、庄金林等同志。

在1935年至1937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这

里更是抗日救亡爱国活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抗战后,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志士经过这里投奔解放区。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同志抗日时期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向解放区运送医药等物品,也经常来这里活动。现在阮慕韩早就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还在。我们海南省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还有一个儿子叫阮崇德,一直在张罗着把这个地点作为一个纪念地保存起来。

印报的纸张我已经买到一些,印几期不成问题。我联系的那个长城印刷厂实在太小了,只能承担排版的任务。后来同事们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帮助,找到了坐落在今天建国门贡院东街(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旁边的位置)的立达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就把印报的任务承担了起来。于是就采取把在长城印刷厂排好的铅版用三轮板子车拉到立达印刷厂开印的办法出报。

总之,那时尽管已经知道还有几个负责同志没有到北平,编辑部的房子也没有买妥,印刷纸张存货不多,印刷厂的条件也很差,但姜君辰、我和其他在北平的同事们经过讨论,还是决定立即创刊,使报纸及早与北平居民见面。

当然发行也是一个大问题。地下党派来了马健民负责发行。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与地下党有联系的“联合派报社”。这个“联合派报社”是1945年11月冀中北平工作委员会刚刚建立起来的。它以发行国民党的报纸作幌子,推销进步书刊。虽然只成立了三个来月,但已经找到了一批报童。

于是1946年2月22日就成了我们北平《解放》报的创刊

纪念日。

三道栅栏这所房子对于我们报社的人意义虽大,但是它毕竟太小了,一定得花钱买房才行。我一个人在北平时曾经看过三四所,没有办成这件事。后来还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从一个银行家杨寿枢手中用 2000 银元这个比较合适的价格买到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这个院子。这个院子的主建筑是一座不算太小的二层楼房。在二层楼的楼上还有几间阁楼,也可以说是三层楼。小楼的建筑质量还可以。除此之外,还有十来间平房,在大门口也有一排平房,除房子外,院子里还有不小的空地。买到了这个院子,我们就把它作为编辑部的所在地。加上三道栅栏做发行所,报社和新华社的工作空间问题就解决了。在签订土地房屋契约时,姜君辰穿了一身西装,以一个富有的实业家的身份与原房主签约。这个买卖房地产交易的“中人”,是西城的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我参加了这个签字仪式。等房屋买定后,三月初,报社所有编辑人员和在新华分社工作的人都搬进了这所自己的房子,不再有人住翠明庄了。

在方壶斋九号的房子买好以后,报社的工作人员又陆续到达北平。3月初从山东来了钱俊瑞和他的夫人何文。钱是陈翰笙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村研究会”的成员,也是从 30 年代起就从事经济问题研究和著述的学者,是抗战前沈钧儒、邹韬奋等人领导的上海救国会中的活动家。1938 年在武汉我就和他相识并一起活动。调来北平前他在山东工作。党中央把他调来,是要他担任北平《解

放》报的总编辑兼新华社北平分社的社长。

同钱一起到北平的还有舒翼翬和丁九，他们两位原来在山东《大众日报》编辑部工作。

差不多同时，党中央从重庆《新华日报》（或新华社重庆分社）调来了杨赓。杨也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和“一二·九”运动时在中国大学的黎澍、清华大学的曹国枢（他是宋平的入党介绍人），在长沙办起了一张《观察日报》。1938年初我出差长沙时曾去报社见过杨赓。这次调来北平后，他是新华社的副社长。

从重庆同他前后调来的还有记者张维冷、茅盾的儿子沈孟韦等。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从冀北辽报社调来了范元甄（女），她也是我的老熟人。抗战前她在汉口懿训中学时，就同在北平民先总队部工作的我有通信联系。在武汉《新华日报》创刊后不久她就到报社工作。从沈阳还调来了杨林、王继尧、缪延东，还从晋绥日报调来了程序等。

这时候，张家口又有人不断调来。张家口是晋察冀中央局的所在地。北平城和城四周，都属于晋察冀解放区，北平城内的党组织也是晋察冀中央局领导的。而且除了北平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外，晋察冀中央局还设立一个北平城市工作部。它的总部当时设立在解放区内的离北平很近的泊头镇。与北平有关的许多工作由这个城工部来管。晋察冀中央局和它下属的北平城工部以及北平地下党组织，从各方面用很大的力量支持我们把这张报纸办好。在人事方面，晋察冀中央局把

担任研究室副主任的郑季翘调来报社。到报社后分配他担任编辑部主任。郑是我的清华同学，山西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从张家口调来的人还有晋察冀日报社的记者仓夷和肖英(男)等。后来在延安大学工作的王宗一、王抗、程钧昌、杨进琳、何洛、马乃庶、蔡茗虹(就是那个有名的画家)、刘振明、吕枫等也都到了北平。

在钱、杨、郑都来到北平后，党就决定把这张报纸的编委会建立起来。一共五个人：报社总编、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钱俊瑞，报社副总编姜君辰，报纸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的社长杨庚(这时钱俊瑞不兼社长了)，报社的编辑部主任郑季翘，我担任报社的研究室主任。此外还有从北平地下党调来的报纸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有名的电影《青春之歌》是根据杨沫的小说改编的，杨沫就是马健民的妻子。前天——2003年7月27日，我遇到了作家老鬼，他就是马健民的儿子。杨沫没有住在三道栅栏)，从重庆《新华日报》调来的经理部主任孙敬文——他是“一二·九”前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那时他是个中学生。我不清楚马健民和孙敬文的分工是怎样的。从延安还调来了原来延安印刷厂的厂长祝志澄等几个人。从发行处的阵营来看，完全够得上把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后的要求。

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大都是从外面调来的，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批有经验有水平的同志，是不能办好这样一张党中央要办的报纸的。当然，将来如果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还会有大批高水平干部参加。但是除了已

经从北平地下党调来的马健民等人做发行工作以外，报社和新华社中也不能完全没有熟悉北平情况的人，也不能没有作为我们的培养对象的年轻人。除发行工作、印刷工作外，报社编辑部也进来了多位当地的年轻人。还是我一个人在北平办报纸的时候，我就接受孙政同志到报社工作。孙政同志就是在孟用潜同志等创办的中外出版社的办公地点同我见面的。他是最早到报社编辑部的青年人。他参加了报纸创刊号的编辑出版工作，那时他还只有 16 岁，现在也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

我在报社管的研究室中有何洛、王宗一、程钧昌、杨进琳等人，他们是做研究工作，为报纸写文章、写评论的。研究室内还有一个资料室，由舒翼翬和何文负责。剪报和资料分类工作需要若干年轻人。岳旦、郝建宁、葛涛（女）等年轻人就是那时候到资料室来工作的。至少岳旦和葛涛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工作。岳旦后来改名岳巍，是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现在也已退休多年了。

我们的这张报纸从创刊号和第二期是在三道栅栏四十一号编的，报纸从第 1 期到第 57 期一直都是在三道栅栏发行的。1994 年 3 月 24 日下午我和孙政访问了这所房子。在胡同口看到红底白字的“三道栅栏”四个字还钉在墙上，很高兴。可是我们熟悉的院子一下子没有找到。院子的大门拆掉了，有三户人住在里面，各开一个小门进出。每家住的地方都很狭小，整个院子变得杂乱无章。听说这几年有些变化，我们也没有再去。这所房子是值得纪念的，应该在它的墙上钉上

一块牌子,写上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

这样解放报社就有了两所房子。第一所是西四三道栅栏四十一号,第二所就是新买的方壶斋九号。

三道栅栏这所房子房间虽然不多,建筑面积不大,对报纸起的作用却很大。它是我们这个报社得以在1946年2月22日创刊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所房子,二月份的报纸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虽然从第三期,即三月份开始,这张报纸的编辑工作改在方壶斋进行,但是从创刊到被查封的整个过程中,这张报纸的印刷、发行一整套工作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进行。

在买到房子以前,我和姜君辰都还住在翠明庄。翠明庄就在东华门大街和南池子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上,现在改成翠明庄宾馆。原来是日本人住的地方,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房间里都还是榻榻米。当时,在军调部的三方除总部在北京饭店外各有一个招待所。美方的招待所在协和医院,当时那里不是医院。国民党方面的招待所在台基厂的六国饭店。我们共产党的招待所——翠明庄最小。可它解决了我们共产党来往战友的住房问题。我住进翠明庄的时候,认识了李普同志和他的妻子沈容。也是在那里见到的刘白羽。但是来人多了就不行了,还是要买房子。

既然我们写的这一节小标题是“三道栅栏四十一号和方壶斋九号”,我想不妨对我们在方壶斋九号这个院子里工作和居住的状况描绘一下。报社和新华分社主要的工作人员都挤在这座算起来只有三百来平方米使用面积的主楼里。二楼

和三楼有几个小的单间，周扬、钱俊瑞、姜君辰和单身女同志各住一间。郑季翘主持的编辑部、杨庚主持的采编部的人也住在二楼。他们怎么住和办公，我说不上来了。我主持的研究室的人最多，在楼下占用了两大间，一大间是办公室，一大间是集体宿舍。三十来人连居住和办公只使用这么大的空间，实在太挤了。但是我们知道条件只能如此，也就很高兴。在那里我们工作得很有效率，生活很愉快。

有了方壶斋这样一个院子，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工作就按部就班、秩序井然地开展起来了。报社和通讯社的工作本来就比较紧张，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就更多一番紧张，更要讲求高效率。

当然在紧张工作之余，大家住在一起也就有更多交谈的机会，说话的内容从形势、工作到个人思想情绪等，无所不谈。以前我没有住过集体宿舍，这时也觉得很有趣味。

报纸从1946年2月22日创刊到4月2日正好40天。每天，写的人写，编的人编，采访的人采访，正规地工作。报上关于国内外政治形势、国民党和我党的动向和主张的报道，完全采用新华社总社发的新闻稿，分别登在报纸的要闻版和“解放区之页”中。它们使读者识破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性，澄清了反动派制造的关于解放区的谣言，深受北平居民的欢迎。北平当地的消息是由采访部出去采访写的。由于敢于提供其他报纸不敢揭露的事实和现象，读者看到所反映的全是实话，感到“真痛快”。当地新闻这一部分，读者也非常关心。读者来信来访也是报纸稿件的重要来源。北平市民把

自己的痛苦和要求向我们申诉,我们就把他们的申诉登在报上,做他们的代言人。报纸被认为敢于发表仗义执言的呼声。我们研究室也写一些评论。因此这张报纸在读者中赢得很高的信誉。报纸的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受印刷发行能力及其他物质上和人力上的限制,初创刊时发行量虽然只有一万多一点,但其影响远超出这个份数。一张报纸许多人看,加上口头上的传播,《解放》报在北平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出版物。方壶斋九号也成为越来越有名、有吸引力的地方。

方壶斋九号在有些北平人的心目中就是解放区的象征。报社一位负责接待读者来访的同志,在报社里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报社里来了个工人,他说自己是根据城市秘密流传的一个顺口溜找到这个地方来的。报社的那位同志说,我们还没有听到什么顺口溜。这位读者便念给我们听:“出了宣武门,往东别往西,到了方壶斋,就是解放区。”这位同志后来著文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当我把此事转述给同志们时,大家都高兴得笑出了眼泪。”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这位同志告诉大家的:“有一天门房拉响了两下铃声。这是事先约好的告诉我们报社来了读者,但来人可疑的信号。方壶斋的大门是敞开的,来访的人很多,一般的来访者门房就拉一声铃,觉得可疑就拉两下。现在门房拉了两下,我急忙跑到门口去,见到三个青年,看来还不到20岁。他们一见我,就握手,不说话,只是笑。我接过会客登记单一看,这三个来访者的名字是‘赤子’、‘革命’、‘解放’。我问:‘这是你们新起的名字吗?’其中一个青年回答:‘不错,

名字是假的,心可是真的。’我对这三位青年说:‘如果有事,请到屋子里谈话好吗?’另一个青年说:‘不用进屋,院子里就很好。其实我们没什么事,就是想到解放区看看。’我们的同志一时没有懂他的意思,说:‘什么解放区?’回答说:‘就是这儿!解放报社就是解放区。’接着说,‘我们来就是想呼吸一下解放区的新鲜空气!’说完这三个青年就在院子里做深呼吸动作。说到最后,他们说:‘我们是刚考上大学的三个穷学生,国军一来,乌烟瘴气,不想上学了,不知道能否到解放区上大学?’”

方壶斋这个院子,在一些向往解放区的青年中就有这样的地位!

1994年3月24日我和孙政也到方壶斋访问。方壶斋的院子倒一下子找到了。但是院子里的那座楼已经拆了重新盖过,原来蛮不错的外形、颇为好看的建筑,改成方盒子的“工房”。原来有平房的小院子也没有留下。大门口,叶剑英将军曾在那里拍摄过照片的那两扇门也没有了。原先报社的门房修成了公共厕所。而且方壶斋整条胡同正在拆除,准备建造大楼、宾馆或商场。方壶斋九号这个院子那时只是暂时保留着,现在恐怕早已不存在了。我希望在方壶斋新的商业区建成之后,请我们去考证一下,在离这个院子最近的那座建筑物的墙上也钉上一块铜牌,作为我说的“墙上历史教科书”的一页。

周扬三月间也从张家口来到北平。他来北平的原因是费正清邀请他和老舍、曹禺一起访问美国。他在北平一方面等

办妥出国手续,另一方面研究一些问题,做出国前的准备。他知道我们在方壶斋有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不愿住在翠明庄,于是就住到方壶斋来。大家表示欢迎,就给了他楼上一个单人小房间。不过他住在方壶斋总得有一个对外的说法,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对周扬说,你就算做我们报社社长吧。其实他不是报社的人,根本不是什么社长,也不管报社的事。他经常在外面跑。张光年后来对人说,那个时候周扬经常找他,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相熟的。不过周扬是热心分子,住在报社,常常对报社工作提出这个或那个意见,我们都很尊重他。

46 07 我们走在大街上,坐在电车里

方壶斋九号是“解放区”,报社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走在路上就是个挂了牌子的共产党人。

1946年北平城里的一般的老百姓很少见到过共产党人。城里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在哪里?谁是?不知道。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都是地下工作者。从外表上是认不出来的。军调部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但是共产党的军人穿的军服同国民党的军服没有不同,也认不出来,而且他们很少在社会上活动。一般的老百姓只知道出出进进北京饭店的军人中有共产党员,却不能就近接触到。因此在那时的北平,人们如果知道某人是共产党员时,就有想多看他几眼的心理。

我有这样一个经历:1946年春天,清华大学一年一度返校日那一天,我回到母校。“清华园”、“水木清华”这两个横

匾，同抗战前一点没有变化地挂在那里。许许多多同学坐在工序厅里休息。在厅里有几个倾向国民党方面的清华学生，围在当时国民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少将参议戚长城的周围。我同他一个年级——清华八级的。1934至1935这两年，因他和我同一间宿舍的黄冠群熟识，经常来我们房间，同我也就认识。而另外比较多的、倾向共产党的老同学，就围在我们周围。在工序厅中不少低年级的同学因为和我们不熟悉，不敢围到我们跟前，但是目光一直不离开我们。我看出他们就是想看看共产党员的模样和神情。这样的目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看不到的。那一天在清华园水木清华，聚集了许多同学，我和戚长城面对面，相隔相当远。两个人四目相对，点了点头。戚长城的意思是要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我的意思是要他走过来，和我握手，不想走过去，拿一点共产党人的架子。两个人就这样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还是他让步了，他走过来了。这个戚长城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被我们劳改了。

由于当时北平的一般居民有这种想看看共产党人是些怎样的人的心理，我们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和坐在电车里是很出风头的。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我们佩戴着“共产党的标志”，即在胸前别着共产党的报纸或新华分社的徽章。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人数虽然很少，但是有一些人经常出来采访或者办事。那时我们没有小轿车这样的交通工具，不是走路就是骑自行车或者坐电车，因此在北平城内的几条大街上倒是不难看到这种身上挂着共产党招牌的人。

鲁军至今还保存着自己佩戴过的蓝底白字的新华分社的徽章。在公共场所或者进行采访时,它是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惟一证件。那时我佩戴的解放报社的徽章因为没有保存下来,已经记不清它的样子了。只记得它是景泰蓝的,上面有好几个字,“解放”两字比较大。这两个字似乎是红色的。我经常把它佩戴在胸前。走在街上经常有人用一种友好和钦佩的眼光看着我。从这种眼光中我看出他们似乎在说:“看,这就是被说成是青面獠牙的共产党!原来他们是这样一些谦和温雅的青年人!”在电车里,我常看到乘客中有人以极大的兴趣盯着我佩戴的徽章。有两次那个看我徽章的人似乎是近视眼,嫌看不清楚,就凑近我的胸前来看。我就让他们瞧个够,或者把徽章上的字念给他们听。有时干脆告诉他们,我所在的解放报社是个怎样的工作单位,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报社的宗旨和基本方针。有一些人主动向我搭话。他们大都是纯朴的工人、店员和学生。胆大一些的人,就在那样的公共场所公开热情赞扬共产党和八路军。也有的人憋不住发起牢骚,像见到亲人那样地诉苦,发泄不满。还有人要我的地址。我就写下宣外方壶斋九号以及本人的大名。其实我应该印盒名片带在身上,送给他们更好。这些人也都没有名片,常主动掏出本写了自己的地址给我,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当时北京只有几路有轨电车,速度很慢,如从天桥到西直门就要坐四五十分钟,我就可以和车上的人聊上相当长的时间。在车上和老百姓作短时间的谈话,使我很高兴。

我记得在报社工作时,曾经到过离报社不远的几个人家

做过客。

有一家人住在西单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家里有一个中学生，叫解华芳。在她家里常常有左派的文艺界的人士。她和吴祖光等都是“二流堂”的成员。我不记得怎样认识的她，因为她住的石驸马大街离方壶斋很近，我曾经溜达到那里去过，而且不止一次。有一次，周扬也在那里。这个解华芳前几年找到了我，她的名字改成解冰，给我电话联系过几次。她现在就住在木樨地 21 号楼。可是始终没有见过面。想必也是个老太太了。

我至今记不起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我不能排除可能就是在电车上结识的。很有可能是我注意到他们告诉我的地址离报社很近，我有空就去他们那里转转。

46 08 报童和特务

北平《解放》报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潮流的压力，考虑到日本投降前他的兵力龟缩在“大后方”，一时难以调动出来发动内战，他一方面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快运兵，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一方面作出和平民主姿态表示愿意停战。于是就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面组织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停战实施这样的事。从文件上来看，国民党 1945 年 12 月 31 日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主张，正式在文件上签字，并公布于众；停战令直到 1946 年 1 月 10 日才颁

发；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面在北平设置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决定，也是在这一天才发布。按照这个决定，这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方三方组成，每方面有一个委员。我方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是郑介民，美方的委员是饶伯逊。接着 1946 年 1 月 11 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那个政治协商会议后来被称为“旧政协”）。开幕这一天蒋介石讲话，作了一些姿态。事实上执行部的工作在 1945 年 12 月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党中央也就是在 12 月作出办报的决定，并开始调集干部。当时蒋介石受到整个形势的制约，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形势把报纸办了起来。对于办这样的报纸来说，一月初的形势最好，如果在一月初就能出报，我们可以多办两个来月的报。不过做这个工作总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我们用很快的速度筹备，在二月下旬才创刊。办报时总的形势还可以。蒋介石还忙于靠美国空军的帮助调兵遣将，还不好出面禁止我们这张报纸的出版，只好在下面动员特务来威胁我们。报纸一创刊，就不断地收到恐吓信，说要来放火烧房子、丢手榴弹。在方壶斋和三道栅栏的门口，还经常有一些一望就可以看出是特务的人在那里转悠，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监视着这两间房屋出出进进的人。但是只是威胁，没有敢动手。

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只敢对报童下手，目的是使我们的报纸不能顺利地发行，限制这张报纸影响的扩大。

报童是城市中一群十一二岁、十三四岁的孩子。国民党统治区一般居民生活很困难，有一些居民已经属于城市贫民

阶层,许多本来应该在学校上学,或者已经上了几年学的孩子,不得不放弃学业,想方设法去劳动,赚几个钱回来贴补家用。到街上吆喝卖报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卖掉一张报纸可以赚一两分钱,也算有点收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孩子本来就比较懂事,他们在街上听到看到的事情多,大都是追求上进、聪明能干、同情革命的。他们卖报后,接触到的社会现象更比一般的孩子多,再加上我们的训练,许多报童对革命和反动派都有基本的认识。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这样的报童是我们的报纸发行到广大居民中去的基本力量。重庆《新华日报》多年来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学习《新华日报》的经验,把报童们组织起来,清早的时候让他们到三道栅栏取报,准备了布包,让他们背着到大街小巷里吆喝。

创刊的那一天,反动家伙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基本上平静无事。第二期一发行,街上就出现冲突的局面。西单、东单、西四、东四、前门等地就出现许多特务。他们把我们的《解放》报叫做“匪报”,骂报童是“八路崽子”,动手就打,抢到报纸就撕。可是被撕破的《解放》报还是有人要买。报童们一是喜欢这张报,二是这张报“出手快”,连被撕破的报纸也有人愿意花钱买,因此很愿意卖这张报。特务破坏,报童们就同他们周旋。小孩子们无非搞点小诡计,可是特务们也让他们耍得够呛。

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优势,他们挨了打,报纸被抢走,有时就躺在大街上哭大嚎。路人见了既同情这些小孩子,又痛恨特务们这种行径,常给报童们打抱不平。搞得特务们常常不

敢在人多的大街上和报童斗。有时特务干脆出钱把报纸从报童那里买去,然后当众撕成条或者放一把火烧毁。他们出了钱不好不卖给他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多印一些。

还有一个故事。4月29日,三名十四五岁的报童在西单一带叫卖。这时来了两个特务,抢走了他们手中的60来张报纸。一个特务走了,另一个特务还在。三个报童一起上前向这个还未走开的特务要求赔偿。这个特务想逃,有一个报童趁其不备拔掉了他骑来的自行车的气门芯。这个特务硬被三个报童捉住送进派出所。报童与特务一路说理,许多人看热闹跟着走,引起许多路人的注意。有人问:“他们在干什么?”有人就回答:“是捉特务。”到派出所去后,许多群众围住派出所“看特务”。派出所不敢随便放走这个特务。这时报社的同志闻讯赶来,我们的同志同群众一起“审问”这个特务。这个特务慌了,支支吾吾,报社的同志取出照相机给他拍了照。接着把这个特务从派出所押往分局。一路上又有许多人跟着。报童们高喊:“看撕《解放》报的特务!”边走边喊,从派出所到了分局。在群众的压力下,这个特务不得不交代自己的身份,认了错。我们的同志最后对警察局的人讲:“特务撕报已不是一次,这是危害言论自由的罪行。今天由报童抓住这个罪犯,交给了负责治安的警局,请你们秉公处理。”最后警察局只得判处这个特务必须赔偿报童损失。

46 09 四月三日清晨

从2月22日到4月2日,北平《解放》报恰好办了40天。在这前40天中,除了发行工作中经常遭到特务扰乱外,编辑工作还能不受干扰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的工作在逐步改进中。没有想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准备向我们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想使我们的工作无法进行下去。这就是我国新闻史上有名的“四三事件”。

报社编辑工作的习惯是上夜班。1946年4月2日晚,大家照常工作,大多数人到午夜才休息。那天我工作到凌晨一时才上床,正在熟睡,突然被嘈杂的声音吵醒。睁眼见到有一群军人、警察和宪兵正在院子里叫嚣:“起床!起床!”声称要检查户口。不容分说,他们就开始动手翻我们的杂物。大家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事情了。

当时我没有看表,估摸着大概三四点钟。一开始,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是哪儿派来的也不知道。后来很快我们就查清楚了,被派来的是警备司令张继和警察总局的赵耀南率领的92军14师26团1营2连、警备司令侦察大队、警察第二中队第四分队、宪兵19团一部以及便衣特务等共200余人前来执行任务。也是在后来才得知,邻居中有个人半夜发觉自己房顶上有动静,起来走出房门一看,见有军警趴在自己的房子上面,而且架起了机关枪,向着九号院子,吓得这个人赶快回房。那时候大概报社还有人

点着灯没有睡觉,他们没有行动。等看到全楼灯光熄灭,众人都入睡之后,他们就去找地头上管事的保甲长来叫我们的院子的门。门房老徐把门打开想问他们什么事的时候,军警宪特们就蜂拥而进。说来也可笑,那时他们用两挺机关枪对着大门,门一开,军警们就用卧倒姿势匍匐前进,好像我们也会用机关枪扫射他们那样。其实里面一支枪也没有。真不知道反动派是怎么动员下面的这些“兄弟们”到这儿来“完成任务”的。他们一定是说在这个院子里有一群武装起来的“不法分子”,后来进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也就泄气了。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

我住在方壶斋九号那座主楼的楼下,大约有十来个人住在一起。他们进楼,我们这一间便是他们最早到的房间,因此也就是他们最早动手的地方。一进门,他们大叫“要检查违禁品”,根本不理睬大家的抗议,把床上床下、桌子上、抽屉里、箱子里和提包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抗议道。一个警官模样的人说:“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带的东西很少,他们到底想查出什么呢?这时听见一个警官说:“没有那种家伙。”我心里就明白了,他们大概希望找到一两支手枪或盒子炮,这样就可以大做文章了。对这一点,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任何人不许带武器弹药到报社来。我自己不但没有带任何武器,连到张家口后发给我的那一副戴着很暖和的、绿色的兔毛手套,也早就用一瓶蓝墨水把它染成蓝色。在服装方面我们也都非常注意,他们怎能查出什么枪支弹药呢?

他们来的人很多。一部分人在我们这个房间里搜查,另一部分人就上楼去了。楼梯就在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里面。在楼上他们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们不让我们上楼,我就在楼下听动静。开始也乱了一阵子,大概也是被查了。接着安静了一阵子。后来知道这座楼上住的报社的负责人钱俊瑞、姜君辰对他们的头头正式提出抗议,要他们正式签具院内没有任何武器和违禁品的证明。最初一段时间他们楼上楼下楼内楼外地出出进进,后来有一个短时间安静了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大概是请示了上峰,开始捕人。于是我就听见楼上很高的叫喊声和很乱的脚步声。再过一阵子,看到几个军警揪着姜君辰的手臂和衣领,从楼梯上拉下来。姜君辰同志使劲抵抗,用手紧紧抓住楼梯的栏杆。他被揪下楼时,几乎是头朝下被架下来的。姜君辰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被捕的人。“你们凭什么动手抓人!”这时候在楼下的这个房间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一齐喊叫。接着钱俊瑞下楼,没有要他们使用暴力,是自己从从容容地走下来的,当然周围军警围着他。他见到楼下这个房间里的人那么多,就用冷静而很强硬的口气对大家说:“现在这里发生的事完全是破坏和平、破坏民主的非法行动,我要到警察局抗议,你们要在这里坚守。在我回来之前谁也不要随便离开。”钱俊瑞这几句的意思很明白,一是不许他们把我们的人抓走,二是不要我们抵抗。不过无论大家怎样喊叫,那些抓人的家伙都不予理睬,还是把楼上的同志一个一个架下楼梯,从楼下房间架到院子里,再从院子里架出大门。在楼下的人也一个一个被抓走。在把我们的同志架出

去时,由于同志们的抵抗,不少同志受到殴打。特务们叫喊:“中国人不打是不行的。”被殴打的有姜君辰、张维冷、鲁果、张蓓、丁九、郑季翘、吴之平、郑仓夷、肖英(男)等十几个人。在楼里和楼外平房被捕的有姜君辰、杨赓、艾国立、张维冷、吴之来、陈笑雨、孙政、刘志华、董保身、刘稚农、郝毅亭、张鸣烈、潘言祥、段恒德、王长春、程钧昌、张蓓、徐复森、徐大红、王宗一、王佩章、秦健生、吴士荣、鲁果、缪延东、杨琳等 29 人。去外二分局交涉的钱俊瑞和马乃庶,也被扣住不放。

被抓的人边表示愤怒边使劲抵抗。当时没有被抓的人也齐声抗议。他们大概事先没有做好我们坚决抵抗的准备,来人虽多,但在大家的抵抗下,他们还是感到“兵力不足”。带走了 29 人之后,在方壶斋的编辑、记者、工作人员中还有二十多人未被捕(没有在方壶斋住的除外)。

大概周扬住的三层阁楼发现得比较晚,等到他下楼时,楼下第一批人已经被抓走了,房内只有比较少的军警了。他就同我们一起待在楼下房间里。

这是我在楼下亲眼看见、至今记忆犹新的情况。这些警察除了在这座楼房之外,还在那个小院和大门口的平房里有类似的行动,也遇到猛烈的抵抗,不过我没有亲眼看到。被抓的 29 人被带到外二分局。一路上的情景我也没有亲眼见到。后来听说,除了钱俊瑞(他还要马乃庶秘书跟着,昂首挺胸走向宣武二分局。特务们怕他中途逃走,用几个军警把他和马乃庶两个夹在中间)外,其余的人在路上一直抵抗,都是两个军警架一个我们的人。他们还怕不牢靠,加到三个人架一个

人,因此到方壶斋的军警宪特一下子走了许多。其余的人在那里等待上峰的命令行动。

也是在4月3日凌晨,军警也到三道栅栏去抓人,借口也是检查户口,大肆搜查。去的人少一些,也有30多人,也未查出任何“违禁品”。当时房东不在,有两间住房锁着,特务竟用枪威胁门房老赵,要他把锁拧开。老赵不干,就被他们打了一通。后来是他们自己用东西把门砸开,但也“一无所获”。他们在那儿捣乱了一大通之后,除留下门房老赵和一个厨师外,把住在那儿的十几个工作人员用绳子捆着手全部逮捕,带到内四分局的拘押所,与从方壶斋带走的人不拘留在一起。三道栅栏的人去警察局拘留所后还被带上手铐。同志们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戴着手铐照相,他们害怕了,只好解开手铐。三道栅栏抓人的情况我没有亲眼看见,也就不能写得生动具体。

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北京党史》2003年第三期发表了《四三事件始末》,并且还登出许多张当时“四三事件”很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我以前没有看见过的。我把他们写的那篇文章附在这里。

附:

一组有关“四三事件”的历史照片

编者按:1946年4月3日,北平发生了一起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和平、非法绑架解放报社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史称“四三事件”。在57年后的今天,李克农的儿子、81岁的李力同志将家中珍藏的历史照片提供给我们,经有关老同志的甄

别,其中有18张是在“四三事件”现场拍摄的。这些照片尘封57年而未遗失实属不易,遗憾的是照片的拍摄者尚无法考证。经李力同志同意,本刊将这一组珍贵的历史照片公开发表。

“四三事件”始末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为实行停战协定,决定在北平设立由美国和国共双方共同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是叶剑英同志,中共代表团的参谋长由罗瑞卿担任,李克农任秘书长。代表团的驻地设在东城区的翠明庄(现中组部招待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进行公开活动提供了合法地位。194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建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并公开出版解放报三日刊。新华社北平分社由钱俊瑞任社长,杨赓任副社长。解放报社徐特立未能到北平任职,社长由钱俊瑞兼任,姜君辰任副社长,杨赓兼任采编部主任,于光远任研究室主任,郑季翘任编辑部主任,祝志澄任经理部主任,孙敬文任营业部主任。与此同时,党组织先后抽调部分熟悉新闻工作的同志担任记者和编辑。解放报社的社址在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1946年2月22日清晨,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出现在古城的

大街小巷,几千份《创刊号》很快被争购一空,临时加印 3000 份也很快售罄。读到《解放》报的北平群众如同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而国民党反动派却视《解放》报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6 年 4 月 3 日凌晨,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张继、北平警察总局赵耀南为首,纠集 11 战区 92 军 14 师 26 团 1 营 2 连、北平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警察第二中队四分队、宪兵 19 团一部及便衣特务共 200 余人,突然包围了方壶斋 9 号的解放报社。全副武装的军警宪兵爬上屋顶,用两挺机关枪封报社大门,然后便衣特务胁迫甲长上前敲门。门刚打开,武装军警好多人冲进院内,以查户口、查违禁复制品为名,在各办公室肆意翻箱倒柜,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搜身。姜君辰等 29 人,被押往外二分局。在《解放》报工作人员遭难的同时,《解放》报临时发行处西四三道栅栏 41 号,也来了数十名军警宪特,以查漏报户口为借口,采用同样的方法绑架了马健民等 12 名同志,关押在内四分局,并被戴上了手铐。国民党当局在对报社动手之时,还对设在西城前京畿道 12 号的 18 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筹备处进行了搜查,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等人被绑架。很明显,几起绑架事件是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蓄意破坏“双十协定”的阴谋。

这一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召开军调部工作人员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了斗争策略,分头营救被捕的同志们。叶剑英分别致函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11 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同时给重庆的周恩来发电报,将这起事件进行了详细报告。周恩来收到叶剑英“四

三事件”的报告后转给蒋介石,就此事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严惩北平警宪特肇事者,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要求停止全国特务活动并向军调部中共代表及解放报社、新华分社道歉并赔偿损失。在北平的中共代表团宋时轮将军赶赴内四分局,慰问被捕的12名同志,宣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慰问信,鼓励他们要和法西斯斗争到底。4月4日下午,18集团军滕代远将军代表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释放被捕人员,查清事件责任;惩办肇事者,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三项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四三事件”是反动派向人民进攻的步骤之一。全国众多的进步新闻、文化单位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反动派这一暴行。被捕的同志们在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钱俊瑞还写了《我们被捕了》一文。

国民党当局迫于正义的压力,在4月4日下午6时,将全体被捕人员释放,警察局长陈焯当着中共代表团领导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的面,正式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对《解放》报、新华分社有所歧视。叶剑英等领导带领被捕同志分别乘车,一路上高呼口号、燃放鞭炮回到驻地。中共代表团为被捕同志召开了欢迎大会,叶剑英在会上高度赞扬了这些同志的革命精神,并向他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四三事件”斗争取得胜利,北平《解放》报声誉大震,发行量从平时的一万多份激增到五万多份,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大报在北平的发行量,这一点是国民党当局始料不及的。

46 10 《特务现形记》

4月3日,春分已经过了十多天,在北京不到六点天已大亮。聚集在楼下与看守的军警相峙的我们,看到在室内等待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下一个行动不是办法,我就带头喊:“到大门外去!”房里的同志们就跑了出去。除了这个房间里的人外,我们还把院子里其他的人都叫了出去。大家走出大门,一片抗议声、口号声,吸引了许多居民和过路人围观。本来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干完,没有想到我们这么抵抗。而且现在斗争的现场从院内、楼内转到街上,他们再也不能偷偷地干这件事了。

对于以后的事情——4月3日上午方壶斋大门外的斗争,在4月4日凌晨我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副标题是《四三事件中的一个片断》,署上于光远的名字,发表在4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现在我想整段地引在这里。当时记载的情况总会比现在回忆时写得更准确些。引用时,我把想补充的说明放在括号里面。

“还是清晨,第一批同志们被逮捕了,军警宪特还在继续‘强制执行’。一边拉,一边打,喊着‘中国人不打是不行的’,夹着各式各样的辱骂。同志们愤怒到了极点,在骚乱中大家认出了一个指挥抓人、指挥打人并且亲自动手抓人的特务。

“这个特务穿着一件军绿呢军装,绿呢大衣,黑衣领,佩戴着少校领章,但是没有符号。矮矮的个子,短短的脖子缩在

大衣领里面，扁圆的脸又黄又白，满脸横肉。大家看见：是他，一会儿跑到楼上，一会儿跑到楼下；是他下命令，布置工作；是他，用我们的电话机同他的上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样的人，一望就是特务。

“几十个人集中在大门口，几十个愤怒集中在非法逮捕和辱骂殴打我们同志们的特务身上。（我们出大门，这个特务在院子里面没有出来）

“那布置工作指挥抓人的特务到底姓甚名谁？属于哪一部分？担任什么职务？警察局的长官说：‘我们不知道他是谁。’92军弟兄们说：‘这个，咱可说不上。’

“既然有权指挥别人打人，既然自己敢于无耻地说：‘就是我打的，怎么样?!’为什么又鬼鬼祟祟连姓名职务都不敢让人知道呢？问问他到底根据什么理由、根据什么法律来抓人打人?! 不交出特务，我们不答应。

“‘让他出来讲讲理!’众口一声地要求。

“那个特务不敢再露面了，躲在房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勾当。

“百多个带着枪的人，重重包围着我们——穿着露出脚后跟的鞋的士兵、皱着眉头哭丧着脸的警士、没精打采的宪兵。他们深夜12点以前就被糊里糊涂地集合起来，一直到现在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也许还在挨着饿，自己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特务分子要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因为特务自己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他们与中国人民势不两立。而他们跟着来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分散开来一个对一个地同这些军队警察的弟兄们讲话,解释特务分子的行为完全是非法的,告诉他们为什么自己这样痛苦的原因,告诉他们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当我们问一个士兵为什么他没有鞋穿的时候,他很愤慨地说:‘鞋有的是,就是没有我们穿的。’一个警士告诉我们说,在家乡他有两个哥哥也是当八路军的。不过他家有七口人在北平,交通不便回不去,说他自己对我们是完完全全赞成拥护的。”

“当周扬同志向大家演说的时候,一位含泪很久的警士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显然,对特务说来,他们不是什么可靠的帮手。”

“这时候方壶斋南头警察局派出所后面拐角处,悄悄地来了一辆自行车。一个高个子,穿着中山装,佩着北平市政府的小证章,穿着灰大衣,从车上下来,走到人群中低声地分别向92军、宪兵、警察下命令:‘你们不要害怕,他们不肯走,就一定要强制执行,不管多少人,所有的人一个人不落全带走。出事情由我负责。’”

“‘好,由你负责,你叫什么名字?’有一位同志(这位同志听到他说的话)向他质问。他却像受到一个突然袭击,好久才吐出‘魏明(未名)’两个音节。我们追问他究竟是哪两个字、问他身份的时候,他却急急忙忙地溜走了,并且在腰间拔出手枪来。”

“‘负责’叫人‘不要害怕’的特务自己先‘害怕负责’,溜走了。”

“太阳已经很高了,(除大门口围观的人之外)胡同口数

不清的群众老远地望着这边，执行部中共方面行政处处长赖祖烈同志也赶来了。（大家走出院子时祖田工没有出来，他在院子里给一个警察几块钱，打了个电话给执行部。于是执行部的赖祖烈穿着上校的军服，坐了一辆小汽车赶到大门口，威严地站在一旁看着）形势发展到已经不是可以进行秘密逮捕，一任那些专门造谣的中央社等宣传机关信口雌黄、欺侮民众了。

“法西斯特务陷入了逆境。门外的特务们忙着跑来跑去，交头接耳，忙着打电话请示。门里的特务在忙着用凳子、木板做垫脚准备翻墙逃路，却又连翻墙的勇气也没有。

“突然间，穿绿呢大衣的特务出现在门口。‘就是这个特务!’‘就是这个特务!’同志们上前去控诉他的罪行。他沿着墙脚企图溜走。进行非法逮捕和在现场行凶的主犯卑鄙下流地竟想逃跑了。群众和本社同志一拥上前把他围住。他着慌了，他下命令给警察宪兵士兵让他们来阻拦我们。但这些带枪的人一动也不动，谁也不听他的了。执行部的赖处长上前劝他不必逃走，他竟举起了手枪。大家的愤怒爆炸了，不约而同地指着他喊出‘特务!’‘打倒特务!’‘捉住特务!’的口号。任何凶器不能威胁住我们，大家勇敢地奔向前去。‘英雄’失色了，倒提着手枪，撒开腿，像狗一般夹着尾巴就跑，绿呢大衣挡住两腿，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在他后面紧追着一群我们的同志和一群老百姓。一片‘特务!’‘特务!’‘捉特务呀!’‘捉特务呀!’的呼声。转到茶食胡同，恰停有一辆洋车，他跳上了车，用手枪指着车夫大叫‘快走’。洋车夫走得不快，眼看

快被我们追上。他翻身跳下车再跑。赶了半里光景，终于给他钻小胡同逃跑了。

“我们的同志回来时，沿途给老百姓说明事实经过，老百姓的脸上个个都露出从来没有过的笑容。他们嚷着说：‘这混蛋要给抓住了得好好地治他一治，全是他们把咱们害苦了，今天你们可给我们出了口气，赶明儿咱们老百姓跟你们一样团结，有组织，敢说话，胆子大，谁还敢欺侮咱！’‘别看他凶，官儿不小，拿着手枪，带着这么大的队伍，还是吓得发抖，逃跑了。他理亏，有什么办法！……’

“雪里埋不下匕首，纸里包不住火，特务分子的行为，人民眼里是完全明白的。”

46 11 特务赶跑之后

特务赶跑了，方壶斋安静下来了。不过太安静了！人被捕了一大半。钱俊瑞、姜君辰、杨庚、郑季翘和我五个编委中，被捕去四个，只有我一个没有被抓走，好像有意布置留下我一个人负责坚持工作，我下了决心：报纸还是要照常出，4月5日是该出报纸的日子了，我们决定准时印出发行，一天也不想耽误。我对没有被捕走还在方壶斋的同事们讲了这个决心，大家也都说一定要争这口气。国民党反动派想破坏我们的报纸，抓走这么多的人，可是我们的报纸照常出版，偏要气一气他们！于是留下来的人不分原先干什么的，都来为报纸的如期出版奋斗。

我们马上动手写对当天事件的报道,起草《我们的控诉和抗议》评论。我还提出做这样一件事情:请几位分头到四周的邻居家访问,一则向他们表示慰问,说今早你们受惊了,同时趁机了解他们的反映,并调查一下他们所了解到的当天早晨的情况。半夜军警出现在屋顶观察我们院内的动静的事,就是这次访问中了解到的。我自己也访问了一家。非常凑巧,这家是1937年7月党组织要我离开北平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临时总队部,8月初我在太原建立这个总队部时的同事、组织部长马寅同志的姐姐的家。在到报社的邻居家访问的人回社向我汇报后,我就卷起袖子写了一则题为《特务行凶、居民受惊,本社人员分访慰问》的200多字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新闻报道我以前没有写过,以后也没有再写,但在那个时候再也不讲什么分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时候,声援被捕同志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的事情,主要由被捕同志和由叶剑英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许多同志进行。我们在方壶斋坚持工作的同志十分关心被捕同志的斗争,我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要同李克农通一次电话。社里的其他同志也从各方面去了解被抓到警察局里去的那些同志们的情况。传来的消息是很令人兴奋的。国民党反动当局把我们的许多同志抓到外二分局后,不敢采取任何行动,而我们的几十个同志却在那里闹翻了天。警察局的人对我们的同志无可奈何,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杨庚回社后讲自己的做法是:“在那里大吵大闹的时候,根本不要去听那些家伙讲些什么,只顾自己发脾气,找厉害的话去闹,再加上

拍桌子、摔凳子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

4月3日上午10点左右,听说执行部派了滕代远将军去了外二分局。同一个时间,宋时轮将军去了内四分局慰问,当面训斥警察局的人,使他们无辞以答。这场斗争是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但又没有做好准备,没想我们的动作很迅速、很坚决、很强烈,想下台又不得不下台。4月3日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上午把在外二分局拘押的同志转去警察总局。从外二分局到警察总局,两处距离很近,但同志们坐在车上还高呼口号,引起路人注意。下午警察把在内四分局的同志也转到总局。外二分局在宣武门外。1994年3月我和孙政访问了方壶斋后,孙政提出还想看看自己曾经被关押过一天的外二分局。这个地方现在仍然是公安局一个分局的所在地。孙政作为一个被关押的人向我和陪同我们的警察同志介绍当初被关押的情况和关押大家的那个房间。4月3日那天下午,被拘的40多个人都聚集在一起了。那一天,在方壶斋的我,也密切注意着警察局内的动态,不断了解关于被捕同志的消息,但毕竟不在现场,写不具体。

4月3日,我一分钟也没有躺下休息。白天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慰问过邻居之后,派人去三道栅栏和拘押我们同志的内四分局送饭。我们采取了保温措施,让他们吃到热白面馒头和酱肉。这使得内四分局的警察——他们吃的是冷窝头和咸菜——看了发馋。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要看稿编报——那则200多字的新闻报道不算一回事。直到4月4日凌晨三四点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又想起清早在大门口捉特务的那个

场面,觉得应该把它记下来,遂拿起笔来写了上面引过的那篇《特务现形记》。我是个写评论文章的人,过去没有写过通讯,可是在那时候就顾不上藏拙了。

4日中午有位同志来到报社,告诉我们,上午滕代远将军到了警察局,慰问我们被捕的同志,并向警察局提出抗议。滕代远去警察局的时候,钱俊瑞当场交给他一篇《我们被捕了》的抗议文章,请执行部同志带出来交给我们。4日上午我们已经编好稿子发往印刷厂即将印刷的这一期报纸,在稍后收到钱俊瑞的文章后,我们马上拿去印刷厂调整了一下版面,把它也排进了报纸头版右上方显著位置。

46 12 胜利归来

4日中午,我接到李克农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今天被捕的人将要释放,要我准备庆祝胜利的鞭炮。4月4日,春节和元宵节已经过去了很久,市面上买不到鞭炮。我又想起了孟掌柜。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去找他。从方壶斋到打磨厂并不远,孟掌柜一听我的要求,说他可以办到。过两小时后他亲自送来了很大的一包鞭炮。我就立刻让社里的人送到李克农那里。

4日黄昏,19时左右,叶剑英和李克农、罗瑞卿等来到警察总局与被捕同志见面,和被捕的同志一一握手并与钱俊瑞拥抱。刘振明回忆那个场面,说他被叶剑英同志抱在怀里,叶对他说:“勇敢!勇敢!斗得好!”这时许多同志控制不了自

己,泪流满面。李克农做了个手势,让大家靠拢站在一起。这时那个北平警察局长陈焯向大家鞠了一躬,说:“各位先生,误会了,对不起,兄弟向各位道歉了。这件事我不知道,一定查办肇事人。请大家放心,今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陈焯见到叶剑英将军阴沉着脸,又接着说:“叶将军是我的朋友、老同学,此事请多担待,兄弟赔礼了。”叶剑英生气地说了一句:“老兄说话要算数!”回过头来对同伴说,“现在陈焯局长已经向大家道歉了,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大家回去为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继续努力工作。”叶剑英接着下令说:“现在上车!”军调处执行部为我们的人准备了三辆卡车。点了点人数,上了车。三辆卡车上都把已经准备好的庆祝被捕同志胜利归来的红布横幅展开,插在两根竹竿上,由两位同志举着。三辆车都点燃了我买来的鞭炮,就在警察局的院子里劈劈啪啪地响了起来。然后发动汽车开出警察总局。卡车后面跟着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宋时轮坐的小汽车。卡车用极慢极慢的、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速度行驶。车从警察总局(现在历史博物馆所在地)经过天安门、东长安街、王府井,最后转入东华门大街到翠明庄。我们的同志站在卡车上面一路高喊口号:“反对非法逮捕!”“正义胜利!”“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其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喊得最响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可能是第一次,或者也是惟一的一次,加上不绝于耳的鞭炮声,有些居民还以为解放军进城了呢。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到接近全国胜利和在北平这个我们党的力量已经很

强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卡车经过哪里,人们就赶到哪里,真是人山人海。车上车下口号连成一片。卡车经常被路人围住,不能行驶,就干脆停下来,等待人散开一些时再继续前进。这件事到现在(2003年)已经有57年了,当初20岁的青年,现在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不知道那一天目击这个景象的路人,还有记得这件事情的没有?

在翠明庄门口举行了欢迎被捕同志胜利归来的仪式。我们同志下车时,人们把钱俊瑞抬了起来往上抛。我们的同志和群众高声欢呼。接着又进翠明庄食堂举行了庆祝会。会上叶剑英讲了话,再一次鼓励了大家,表彰大家的坚决勇敢,号召大家继续斗争。

然后三辆卡车分做两路,两辆去方壶斋九号,一辆去三道栅栏。路上大家还继续喊口号。在方壶斋九号,我们也作了欢迎被捕同志归来的准备。大门口早已挂起了欢迎被捕同志胜利归来的红布横幅。被捕同志离开翠明庄的时候用电话通知了我们,在那里全体工作人员和四邻群众也都聚集在门口热烈欢迎。同志们相见,彼此问这问那。其实只阔别了一天半,40多小时的时间,但就像分别了很久的战友重逢似的兴奋。在欢迎者之中有我一个。

46 13 “四三事件”后的北平《解放》报

“四三事件”我们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超出了预先所能够估计到的。4月4日全国知名的进步人士、全国进步

舆论界、解放区百余团体纷纷声援被捕同志，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委员叶剑英向国民党驻北京军政要人提出书面抗议，滕代远将军还为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制造“四三事件”的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抵抗，但没有想到全国的声援和抗议会这么强烈。当然主要还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还没有完成，这种行动采取得早了一些，因此他们不得不退让，只好很快释放被捕同志。

“四三事件”的胜利，我们很高兴，北平的老百姓也很高兴。可是据说蒋介石得知“解放军人员”坐汽车在北平街上游行的消息，咆哮如雷，大骂国民党军统头子、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郑介民是“饭桶”。

“四三事件”的胜利，使《解放》报声誉大震。报纸创刊时发行一万多份，到“四三事件”前还没有到二万份，“四三事件”后猛增到五万份以上，成为当时北平各报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我们的报纸是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立华印刷厂用平板机印刷的，赶印这么多报纸工作很紧张。而国民党办的《华北日报》用卷筒机印，它的发行量连赠送和摊派在内只有八千份。

对4月21日中山公园的事件的报道，进一步使北平《解放》报受到中外瞩目。那一天举行的“国大选举演讲会”，是北方民主运动兴起的代表性的事件。中国大学法学教授陈瑾昆在会上演讲，反对国民党一手炮制的约法，主张坚持政协决议。在会上，特务大打出手，殴打了陈教授，引起群众极大愤怒，当场把凶手抓住。这是在北京重演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我们的报社记者对这一血案作了详实有力的报道,并且连续报道,并且经过新华总社发到全国,影响很大。我们的记者在北平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方面。

“中山公园事件”的报道表明《解放》报在深入北京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对国民党军需部联系总部被服厂拖欠纳鞋(也就是制鞋)工人工资的报道、对中学生张耀东苦读事迹的报道,表明报纸已深入北平经济生活。张耀东在一所学校读书生活困难,露宿在学校的大门洞,被学校工友发现,出于同情每晚偷偷让他在教室过夜。他借墙外的灯温习功课,被学校发现后驱逐出校,到隔壁的一家豆腐脑铺帮工借宿。但他考试成绩一直在前三名。报社记者杨觉发现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苦读模范张耀东》。这则报道在《解放》报发表后,本校同学捐钱,天津寄来捐款,陶行知先生也捐钱给张,反映很好。在“四三事件”后报社广泛开展了群众来访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任弼时提出,我们可以在报上大力宣传北平社会上的好人好事,这样可以扶植正气,也可以广泛联系群众。这个指示,从延安传到北平我们的报社,大家觉得过去没有想到,以后这样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由于读者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报社实力的增强,从5月起我们社把三日刊改为双日刊,改双日刊并不觉得那么吃力。我们在北平要创办的报纸本来是《解放日报》,于是就决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出对开的日报。试编试排过一次,编委们看了,认为需再多试几次。同时,一块“北平解放日报”的招牌也早就制作好了,预计早则6月、迟则7月《北平解放日报》

就可以同读者见面。在印刷方面,我们早就准备把立华印刷厂改为我们报社的印刷厂,与这个印刷厂签过一个转让合同,对印刷厂的设备进行了扩充。

“四三事件”后,随着蒋介石准备内战的“进展”,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新闻界的处境越来越恶劣。我们并没有因为那次事件的胜利而麻痹大意,认为反动派总结了那次失败的教训之后,肯定会采取新的行动。他们几次准备动手,又几次暂时搁置。北平《新生报》在4月14日就透露:“据某方消息,当局为节约纸张起见,对平津报纸未经中宣部核准发行者,均暂予停刊。”我们的报纸就在4月17日发表法学教授陈瑾昆的评论,对当局的这种言论予以驳斥。我们的三日刊在创刊前三天就向北平社会局申请登记,出《解放日报》的申请又在3月5日交去,可是就是不予批准。我们多次得到他们要动手的消息,都作了准备。我们报社严格规定不保存党的机密文件。有文件要看就去执行部我们的代表团驻地。我们研究室倒积累了不少剪报资料,这是舒翼和好几位青年同志的劳动成果。它们虽毫无机密,但也怕特务捣乱把它们毁掉,因此就把它装在两只柳条箱里。听到一些风声就把柳条箱转移出去,风声平静一点又把它转移回来。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要用到它。

“四三事件”后《解放》报发行量大增加,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难以容忍。4月25日发行时,在发行所门口突然来了大批特务、宪兵和三青团员,他们气势汹汹,分组把守通道,公然掠夺了二千多份报纸。警察站在一旁观看,不去制止这种行动。

报贩们忍无可忍，当场抓获一名特务，送进了警察局，可是不久就被释放了。反动派见到《解放》报的销路这么大，就不断抢报、撕报。在有很多群众的场合他们不便抢报、撕报，撕报时就采取了掏特务经费把报纸大量买走，然后毁掉的办法。在这些办法外，他们又生一计，办了一张《解放区》报。报头、版式和《解放》报非常相近，可是内容完全相反，非常反动，专门造我们党和解放区的谣言。我们的报童又对这展开了斗争，不但自己不卖，而且做工作让别的报童也不卖这种假《解放》报。结果这张报纸只得自己收场。

46 14 查封

随着蒋介石备战的进程加快，北平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我们一方面紧张地工作，提高警惕，抢时间在北平扩大党的影响，同时也照常以愉快、轻松的心情生活。除了在报社内搞点娱乐活动，有时也去翠明庄参加自己人的舞会。我虽然在延安学会了跳舞，但是跳得不好。因此在舞场上我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主动请一个女同志同我跳一场，这一场算是她照顾我这个笨拙的舞伴，以后我就坐着等女同志来请我。王光美同志常常请我跳第二甚至第三场，她是很愿意照顾别人的人。

在舞场上我也见过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这些将军，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学会他们那种在紧张的形势下从容不迫地应付局势的本事。

山雨欲来风满楼。进入5月之后，蒋介石要对《解放》报

和新华分社下杀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报社已经做了应变准备。如印发新华社新闻稿的工作已经从方壶斋转移到翠明庄。5月29日下午，执行部中共代表团说有紧急的事要我们立刻派人去那里。去后，代表团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刚刚接到延安的电报，电报里说蒋介石决定今天晚上查封《解放》报。并且说，延安来的电报里写道，毛主席表扬了《解放》报的同志在“四三事件”中表现出的威武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同时指示，现在形势同那时不一样了，对于这次查封不能像“四三事件”那样硬斗，要封就让他们封，要抓人就让他们抓，要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到代表团去的同志回来说，李克农传达党中央这个指示后，幽默地说：“这回斗也没有用了，就按计划安全地撤退吧！”我们把这个指示传达到报社的每一个人，要大家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当天夜里，大家等待着这件事的到来。我入睡之后，也特别注意院内动静，结果一夜平静。在清晨起床时，我以为他们改变了行动的日期，心想5月30日是到处部署内战的蒋介石坐飞机预定到北京的日子，也许怕采取这样的行动造成群众上街不好看，改到他走后再动手。

到30日早晨，比我起得早的人都在说，有一个查封的布告贴在大门口。我到门口去看，果真如此。延安电报上告诉我们的这日期十分准确。布告上写的，无非是“凡报纸、杂志、通讯出版、发稿，必须先呈请中央核准，早有规定。近查本市许多报纸、杂志、通讯社竟未遵照规定，一面呈请登记，一面印刷发行，甚至有言论荒谬者，殊属不合，奉中央严令取缔，勒

令停刊”这样的话。布告上的字当时我们抄下了，可是现在我手边没有，上面引号里的话是5月30日报上报道北平市政府发言人对报界发表谈话的话。除了布告外，两扇大门上还各贴有一张封条。布告和封条上的时间都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封”。一张是封报社的，一张封新华分社的。封条的贴法也真特别：封条总要封什么东西，而这两张封条像对联那样贴在两扇大门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封住，大门照样开关，人员照样进入。看来，经过“四三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惊动我们，怕惹出麻烦，半夜偷偷贴完就走了。

看来他们选定这个日子也有讲究。这时候我们出日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即使6月1日出版，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那块制作好的招牌，也只等出日报那天往大门口挂了。出日报的消息有可能特务机关已经侦察到了，抢先在我们日报未出之前动手。当然更主要的是蒋介石要发动内战，《解放》报也是一个碍手碍脚的东西，岂能再允许它存在？作为陪衬，北平还有75家进步新闻出版单位，连同我们和新华分社两家，正好是77这个数字。因此叶剑英把这件事称为第二个“七七事件”，说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空前的大反动”。

这件事理所当然也引起强烈的抗议，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抗议，叶剑英发表长篇谈话。5月30日这一天下午，叶剑英带了好几位在军调部工作的负责同志来到报社。叶剑英先看了门口的布告和封条，听了我们简单的汇报，就在报社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熊斌。下面是叶剑英

对着电话筒给熊斌讲的话。当时有几位同志在电话旁边，他们听到了而且记住了：（大概前面还说了几句）“啊哟，你要打仗吗？我们的部队就在西山，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一定是熊斌在推诿）“老熊，你怎么不知道？署有你的大名的查封布告就贴在我们的门口。怎么样？我揭下来给你送去？”

（又一定是熊斌在电话里表示自己有困难，请求谅解）“老兄的困难可以理解，那就不揭了，我照张相给你送去！”

打完了这样的电话，叶剑英对我们说：“和这些老奸巨滑的国民党老家伙斗争就这样。他封了报纸还推说不知道。市政府市长的布告你揭下来，他就说你犯法。我们尽力做合法斗争取得胜利。”

这时候我们把那块早就制作好了的“北平解放日报”招牌抬出来挂在大门口。大家簇拥着叶剑英走到大门拍照。叶剑英站在招牌的左侧（从照片上看就是右侧）手指着那张布告，态度十分严肃，表示抗议。报社的副总编辑姜君辰站在另一边。报社的总编辑、分社社长钱俊瑞，分社副社长杨赓，报社的秘书马乃庶站在姜君辰的后面。现在这些人全都成为古人了。

拍完照立即去冲洗，送到熊斌那里去。

接着叶剑英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

“国民党政府查封《解放》报与新华分社，是因为你们替老百姓说话。群众拥护和平，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反对独裁，你们敢于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敢于宣传真理，主张正义，敢于

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的、反动的丑恶面目及其法西斯反革命罪行。《解放》报在北平，每期销售四万多份，最多时达到五万多份，成为平津一带销售数量最大的报纸。这就是一种最好的民意测验。他们从《解放》报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它的销售数量也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发展前途胜利的象征。因此，它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们的肉中刺、眼中钉。他们不惜破坏政协决议和蒋介石的四项诺言，也要把它封掉。

“国民党反动派害怕的是人民觉醒起来、力量壮大起来。他们想消灭人民军队、消灭解放区，因此不愿意和平，要打内战。打不赢又要和谈。谈也是为了准备力量打。谈，他们也不会占到便宜。在战场上他们得不到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打，我们要把它打垮。谈，也要把他谈垮。打和谈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尽管他们可以猖狂一时，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进行斗争的革命党人，要善于观察分析形势，灵活地制定战略战术，应进攻时进攻，应退却时退却。今天的退却是为了明天的进攻。大风暴来了，就要蹲下来。（说到这里，叶剑英同志做了下蹲的姿势，大家笑了）

“反动派今天下了决心，查封我们的报纸。现在北平的政权还在他们手里，硬顶是不成的，只有暂时收场。你们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又不是军调部的官员，得不到保护，再在北平是很不安全的，也只有回解放区。

“我们几个月在北平的奋斗，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信要不了很久，会重返这个古都，那时候这

个城市将是我们的天下。”

大家听了喜笑颜开，热烈鼓掌。

附记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段怀念叶剑英的话。我最早见到叶剑英同志是1938年初，我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时候。记得是在食堂里，我们同桌吃饭，彼此没有说话。我在写回忆文章时一直写长江局有四个委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党史专家告诉我还有项英、董必武、叶剑英。就我在长江局工作中接触到的情况和列席过的委员开的会议来说，董、项、叶的情况真使我就有点糊涂。

董就住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机关的所在地，而且在我担任长江局青委书记时，董的秘书张维明是青委委员之一。但是董似乎不管长江局的事。只有党派熊向辉到胡宗南那里去，要我正式以党组织名义同熊谈话，并叮嘱熊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工作，要注意哪些事情——这件事是董必武作为绝密任务，亲自向我这个长江局青委书记布置的。

后来把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的名字公开出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建议书时（这个建议书当时就在《新华日报》刊出），只署了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即博古。有没有何克全——即凯丰，我记不清了），没有署董必武的名字。而接着以中共湖北省委名义发表的关于保卫湖北的建议领衔的就是董必武。

1938年在武汉是我第一次见叶剑英时，没有听说他是长江局委员。当党史专家告诉我，长江局委员名单里有他，我心

里倒有一些明白：那时长江局管辖的范围很宽，黄河以南整个国民党统治区都归属于它。

东南几省党中央设立了一个分局，项英担任书记，它归长江局代管。新四军办事处都曾经在武汉设立过。项英是长江局委员，在1938年我倒听说过。我们党那时在西南地区没有设立中央分局这样的机构。但是这一片应该有叶剑英这样的人抓。因此叶剑英是长江局委员的道理我也就明白了。

1939年是我第二次见叶剑英，那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青委要我从广东省委机关去延安，我从桂林经贵阳到重庆这一段我搭叶剑英的便车的那一回。这时候武汉已经沦陷，长江局也已经撤销。王明、博古、凯丰回到延安。周恩来已在重庆，叶剑英此行一定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当然我不会知道。

那次我他同行了许多天，虽然在过娄山关时，他要司机停车，让我们统统下车，听他讲长征途中在娄山关战斗的故事，可是这两次我都没有同叶剑英说过一句话。

那两次同叶剑英见面，我想叶剑英不会认得我。

到1946年这次，情况就大不一样。我听到的、看到的叶剑英事就多了。这次我对他能够近距离地进行观察。他把我们的同志从警察总局接出来时，对付陈焯的那一幕我不在场，而查封《解放》报和新华分社那天的情况和那次同我们大家讲话时我在场。上面我记得很详细。

1997年4月28日是叶剑英将军的百岁诞辰，我一直深深怀念着当代中国的这位伟人。

46 15 罗瑞卿保护我们进解放区和仓夷遇害

报社和新华分社人员,包括在北平参加工作的除了个别安置以外,主要分向三个地区撤退:一部分回延安,一部分回山东,大部分(共有二十多人)去离北京最近的已经获得解放的“大城市”张家口。我是回张家口的人中的一个。

去张家口的人由罗瑞卿护送。先在西直门坐火车经南口到康庄。康庄是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分界线。双方都设有用铁丝网做成的关卡。我们要过的第一道卡子是国民党的。在这道卡子旁有十多个国民党的官兵。卡子以南就是国民党的军队。从这道卡子往北,隔开四五十米或者一百米就是我们的卡子,也有十多个我们解放军的官兵。卡子以北就是我们的军队。我们在快过第一道国民党设的卡子时,罗瑞卿要我们站在他的身边。他自己就坐在路边的一个土堆上,派上一个少校军衔的杨副官前去交涉过卡的事。谈了十几分钟,对方坚持要一个一个地接受检查,不肯让步。这时罗瑞卿突然从土堆上站了起来,对我们说了一声“跟!”大家就提着手提行李跟着他走到卡子前面。他对坚持要检查的那个国民党少校军衔军官说:“怎么样,要检查我吗?!谁叫你们这么干的呀?!”那时罗瑞卿穿着将军衔的军服,那个少校军官不得不端端正正地站着。罗瑞卿继续训斥:“这里是哪个部队?没有教养!连我都要检查?你们的师长是谁?我找他算账!”他一面说一面使眼色暗示我们过卡。那个军官不敢再

拦。罗看我们已经过完了，自己也跟着过卡，边走边对那个国民党军官用比较和缓一点的口气说：“现在不是还没有打仗吗？告诉你们的部队要讲团结，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嘛！”那个少校一直端端正正地站着，还大声地回答“是！”无可奈何地一直看着我们走过自己的卡子。

走到我方关卡时，接我们的一个警卫人员，立即让我们过关，帮大家装好东西，督促大家上车。罗瑞卿走到车前小声问是否都上来了，说了一声“快开车”。车子开动了，大家向罗瑞卿挥手。离开这个地方，到了我们的解放区，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大家马上活跃起来，在车上说说笑笑。四五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张家口。

1991年纪念北平《解放》报创刊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写到撤退那一段时，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我们报的记者郑仓夷本来应该同我们一起乘汽车回张家口的，却乘从北平到张家口的飞机回去。于是不幸因此而遭反动派杀害。仓夷是一个使大家很喜欢的小伙子。他是华侨子弟，回国参加抗战，参加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他写作能力很强，工作积极而且能干，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记者。他到机场上飞机，机场上有两架都是从北平到张家口的飞机，其中有一架是从北平直飞张家口的，另一架是要在大同停下来，再飞张家口的。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上了中途在大同要停一下的那一架飞机。结果飞机飞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同，他不肯下飞机，反动派强迫他下飞机，说要押送他到解放区。在离开大同飞机场去解放区途中，国民党把他杀害了。这个凶手在解放

战争中被我们抓获了，但听说在押送中这个凶手跳火车逃跑了。不知道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后来这个凶手被再次捕获，并被我们镇压了。我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够提供有关仓夷的准确和比较详细的材料。”

当时我看到别人的材料也是这么写的。

后来我明白了，这么写有误。实际的情况是，那一天仓夷是同我们一起经康庄通过国民党的关卡回到张家口《晋察冀日报》的。后来他又奉命到北平采访，他被杀是不久后从北平再次回张家口时发生的。被杀的过程同我1991年写的情况基本相同。

仓夷同志在报社时，我同他并不很熟。他同报社中比较年轻的同志们关系当然比同我要密切。1991年沈孟韦的回忆文章写了他一段，我就把这一段全文抄在这里：

“仓夷是华侨，生长在新加坡一个贫寒的家庭，小个子、尖下巴、大眼睛，微突的颧骨，浑身充溢着勃勃生机。他来时正值隆冬，身上只穿一件毛衣就往街上跑，后来才加上一件短呢大衣。他是在高中时接受了新思想，抗战爆发他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家，告别了女友，千里迢迢回到祖国，直奔延安。后来又到了晋察冀，当了记者。八年的岁月已将这个南国的儿子融入了北方的质朴中，只有他那嗓音、那眼睛、那精干的身段，使人猜到他来自南方。他常谈到他的故乡，而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女友——未婚妻。他们是中学同学，有共同的志向，但她却因父母的阻拦未能回国。他们分别时立下誓言，永不变心，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再相见。开头，他们通过两封信，后

来就断了联系,但仓夷相信她一定在等他。日本投降后,仓夷马上给她写了信,他相信她能收到,并能来祖国与他团聚。他随时珍藏着一张照片,他曾掏出来给我看:一个短发的大眼睛的少女在向你微笑。”

46 16 桑干河上

我的清华的老同学姚依林,比我低两个年级,可是我们是在上海大夏大学同一个考场考清华的。他考一年级新生,我是转学三年级。因为他的眼睛有毛病,虽然考的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注意到这个人了。1946年他在晋察冀中央局当秘书长,分配支援我们《解放日报》的郑季翘是他领导下的晋察冀中央局研究室主任。我从北平到了张家口,就住在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成了中央局的客卿。这时候郑季翘从北平回来以后,继续担任原来的研究室主任。我的“办公”和住的地方就在他的研究室。我这个“客卿”插不上什么手,也就是在那里休息休息。有时候在那里接待一下在北平时认识的朋友。我记得那位甘莹女士就在那里见过我。但是我更想出去,看我的朋友。比方说,我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时一块工作的屈伯传,就在张家口化工研究所当所长。在张家口我们办了一个工校,孟苏,还有别的一些从延安来的人在那里学习。我很喜欢到那里去,看看他们。在工校,我记得给师生们做过关于“一二九”的报告。是我自己瞎吹牛,讲得很生动,也很受欢迎。

我们中央局的地点在张家口的东山坡，它的地势比较高。其他单位住的地方的地势都比较低。比方说，工校的地点是在解放路。因此，我在中央局东山坡办公室的门口骑自行车，一蹬，就可以一直滑到解放路。回来的时候就惨了，只能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走上坡。从东山坡到解放路中间要走过晋察冀日报社，在那里也有从北平回来的人，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我的秘书胡冀燕的父亲胡开明。也是在那里见到后来在中央宣传部一块工作的陈道。我还在那里认识了大名鼎鼎、臭名远扬的张春桥。在我推车回东山坡的时候，有时就在那里歇一歇，同报社的人聊天。

大概在张家口当客卿的人不止我一个，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丁玲，她有一本长篇小说，书名就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就同我们一伙子人，在桑干河附近的地方搞土改。搞土改的地点就是在怀来，桑干河流域的鸡鸣驿。后来又一起同两个当时有名的人物，一个姓李，丁玲小说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以他为原型，他的确是一个爱好文学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鸡鸣驿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好几百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村庄与之完全不能相比。土改工作怎么做，我是一下子摸不到头脑的。总之，在那里工作的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出乱子。而且时间不长，我的工作地点又转移了，转移到平北，也就是北平的北面解放区。地点就在现在属于北京市的延庆和属于张家口的赤城之间。我正在那里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党中央的调令来了，要我回延安。

46 17 快马加鞭回延安

回去怎么走呢？这时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已经打响，张家口也面临被暂时放弃的形势。不过我要回延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紧张。这时候，周扬没有去成美国，就在晋察冀中央局当宣传部长。他的儿子，就是那个跟着他从延安走到张家口的那一个，在从张家口撤退到阜平的路上翻车死了。我从张家口回延安，走的还是老路，不过，不再是慢慢地走，而是快马加鞭。不是一天走一个兵站，甚至也不是一天走两个兵站，当然不再有骑牛、骑驴、骑骆驼的情况。骑的是自己的快马，只走了八九天就到了延安。

这次去延安不仅是我一个人，我记得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谁，得慢慢地想，我记得有一个是王宗一，一个是余修，还有两个也都是延安大学的。一路无话，也有一个笑话：回去的时候正是夏天，路过临县休息，口很渴，一人吃了半个西瓜。兵站把我们分配到一家去住。这家人只有姑嫂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把我们安排在里窑，自己住在外窑，我们吃了这么多西瓜，半夜不得不小便，我第一个手里拿着蜡走出去，一看，这两个女的，一丝不挂地躺着。我没吭声，结果其余的四人都按照我的办法一个一个地出去。第二天，大家说起这个事情，哈哈大笑。天地良心，我们一点不是故意的。而这两个女的，睡得很熟，一点没有惊醒她们。要说一路无话，这算是路上我们可以讲讲的笑话。

46 18 清凉山上

党中央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延安《解放日报》言论部的副主笔。这时候，钱俊瑞也调去延安《解放日报》当副主编兼言论部主笔。也就是说，我是他的助手。不过，事实上我是独立工作的，他在忙别的事情。我主要的工作是写《解放日报》的社论。那时正在打仗，我写的社论好多篇是军事评论，是纸上谈兵。不过，反应还可以。传达下来，毛泽东还表扬过我写的社论。此外，还写过一些专论。我记得的有搜集解放区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

在延安的工作比起在北平《解放》报的时候轻松得多了。空闲时间就聊天，聊天的对象当中有一个是美国人李敦白，他很活跃，中文讲得很好，而且还很会说俏皮话。有人请他做报告，他也不推辞。记得有一次，他讲美国人是蒋介石的洋爸爸，蒋介石是美国人的洋娃娃。李敦白后来受怀疑，蹲过我们的监狱。当然，最后没有问题，他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在政治运动中，他也站队。而且似乎又站错了队，又成为他的问题。七搞八搞，后来又回美国去了。我和他是朋友，他来中国我还同他联系，他的妻子是个中国人，他本人现在对哲学兴趣比较浓。有一次来中国，我和他讨论客体的和主体的词源学的问题。他到了美国之后，查了一些书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讲 subject 和 object 这里面的 ject 是什么意思等等。

除了聊天以外,我还有一件引起很多人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对我自己身体的锻炼。这时时间到了很冷的冬天了,延安已经下了几次雪了,我就把衣服脱掉,只穿了裤衩跑,并且用雪擦身。很多人看见了,说我是个怪人。李慎之这个时候调到新华社(对了,也许你们不知道,《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还有广播电台一部分人也住在清凉山),当时我和他不认识,如果他后来不说起他看见我锻炼的情况,我还不知道他到过延安。我那样锻炼真管用,从不感冒。可是解放以后,不锻炼了,得了慢性气管炎。在北京也没有那样的条件锻炼,一直咳嗽。

就在这个时候,了解到胡宗南要进攻延安,这就发生下面我要讲的那件事情。

46 19 一篇毛泽东修改过的不发表的社论

1946年底,大约是11月12月之交,又得到了胡宗南要入侵陕甘宁边区的情报。我们解放日报社编辑部和其他部的人员,决定分批暂时向瓦窑堡一带转移。有一批人先动,第二批是否转移,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军事情报再说。

我在解放日报社除了在业务方面担任工作之外,还是机关党委的一个委员,在第一批人转移后,我就到离开延安的各同志的窑洞里进行保密检查。我在艾思奇同志处理稿子的字纸篓中,发现一篇他写的、但是没有在报上登出的社论的草稿,题目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上面

有毛泽东作了很大修改的字迹,还有张闻天画的红杠杠和对个别字句的修改。而且毛主席把题目改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似乎改完后,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批了“此文不发表”几个字。我把这篇稿子收藏起来了,一直保存在我那里。后来我考虑这个珍贵文物应该送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如果有人要看毛泽东、张闻天和艾思奇他们亲笔写的手迹的这个原件,就可以到历史博物馆去看。

在我把这个原件送到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给我做了一个复制件。这个复制件做得非常好,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不是那种我们用复印机做的复印件,而是手工产品。纸张质量、颜色和原件差不多。上面写的毛笔字和钢笔字看了就像是毛笔字和钢笔字。这样的复制件我现在还保存在这里。我都不愿意轻易给人看。

有关这篇稿子,后来我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作过一些研究,写过文章。我了解到这篇社论不是1946年写的,也不是1945年写的,而是1944年下半年写的。原来在写那篇文章之前,1944年上半年延安《解放日报》开始连续发表了一些根据地改造旧家庭和有关举行家庭会议的报道。编辑部也收到几篇有关“在家庭领导”上实行改革建立“民主家庭组织”的材料。于是决定写一篇实行家庭民主、改造旧家庭的社论,由艾思奇执笔。艾思奇就写了我的这篇文稿。毛泽东在文稿上修改了60多处,加了1100字,改了题目。改定之后,他认为他所修改的“与原文的各部分颇不调和”,要编辑部“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他的意见先是口

头上传达给了编辑部，编辑部就另外写了一篇《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在1944年8月25日见报。毛泽东同志看了那篇社论之后，认为社论没有把握住家庭改造与民主革命紧相联系这一重点。于是，他又在8月31日给当时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秦邦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已经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阐述了家庭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指出“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等，家庭是不可能得到改造的”。“问题的重点是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毛泽东这些言论，源自我得到的那份文稿，因此它是研究家庭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送给我的好几份复印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看了艾思奇写的《社会与生活》以后亲笔写的笔记和给艾思奇的信。也有关于这篇《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写给博古和艾思奇的信。这个复印件不在我的手里，以后可以考虑照相制版附在这里。

涉及有关这篇文章的事情，我写过一篇《有关家庭问题的两件往事》，其中第二件往事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其中第一件事情是1977年11月20日，我的吴有训老师问什么时间有空，他来看我。当然后来是我去看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件心事：这就是前几年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了他，把他

的儿子调到北京,在科学院内工作。但是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同意这件事,为此一直不安。他想向党中央写一封信,建议中央对党员和非党的革命者在家庭观念变化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教育。他找我为的是想听听我的意见。他找我引发了我想起上面说的这件事情。我认为家庭观念变化问题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理论意义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这篇文章在1980年10月25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以后,有一位朋友还觉得我说得不全面,于是我又写了一篇《再谈家庭问题》,发表在1981年11月25日的《文汇报》上。

(三) 1947 年

小 引

这一年,没有做别的事情,就只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及冀中土地工作会议。

47 01 “中央土改工作团”的组成和出发

1947年3月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参加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取得一些经验。出发前并没有传达中央组织这个工作团的目的和要求,也并没有正式的名义,“中央土改工作团”是大家口头都这么说的。这是件大事,可是我并不很清楚。我知道除了我参加的那个土改工作团之外,还有其他人参加组成的土改工作团。

我参加的这个工作团的规格很高。

首先带队的是康生。

康生在五四时期就参加活动。在《文史资料》上我看到过许德珩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说自己参加北京五四运动时,作为学生代表到上海见过张三洗。而我也听康生自己说用过“张三洗”这个名字。抗战前他和王明都是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抗战爆发后同王明等一起回国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前在延安,他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职务。那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47年带土改工作团,作为团长出发时他还有什么职务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政治局委员。这个工作团有这样的人带队,规格当然是很高的。

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也跟去了。1929年在上海作为陈翰笙办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雇员时,她用了一个玛丽亚的名字。1935年陈翰笙在莫斯科见她时,知道她同康生结婚,名字是曹轶欧。

土改团团员中不少是老党员,我现在记得清楚的,首先是高文华和他的夫人贾琏。我1938年初去长沙时,高文华是湖南省委书记,可是没有见到。在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以前,说不清楚是哪个年代,高文华还负责过整个北方局的工作。据说那时候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总之,高文华在党内是做过很重要工作的人,是个老同志。

再有一个是很有名的张琴秋,在红军时期是鼎鼎大名的四方面军的女将军。

团员中还有徐冰和他的妻子张晓梅。徐冰本来姓邢,叫邢西萍。抗战前是北平地下党党员。在延安和何思敬一起翻

译《哥达纲领批判》。1946年在军调部工作，我在北京饭店见过他。

团员中还有当时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廖鲁言和他的妻子。

年轻一点的有史敬棠、曾彦修和我。我们三人在团里被称做“三青年”。

团里还有一个不算正式团员，但是跟这个团一块工作的毛岸英——毛泽东的大儿子。他一直在苏联，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上还登过一篇他介绍苏联儿童生活的文章。毛岸英回国时间不长，毛泽东认为他对国内的生活不熟悉，就要他到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家里。成立这个团时，毛泽东委托康生照顾他，带他出去参加土改。毛主席要他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学习了解实际情况。于是就有了毛岸英到我们工作团来的事情。

康生本人认为自己没有很多时间去照顾毛岸英，因为团里有我们三个和毛岸英的年龄接近——我们大概只比他大三四岁，共同语言会多一点，就把他介绍给我们“三青年”。要我们更多地照顾毛岸英，并且当着他的面把这个照顾他的任务交给我们。要他尊重我们三个人，向我们三个人学习。

再说一遍，这个工作团并没有“中央土改工作团”这个正式名称，但是因为参加这个团的人的规格高，人们都称它为“中央土改工作团”。

这时候从延安出去搞土改的还有别的人。似乎陈伯达也带上几个人在晋绥土改。同他在一起的有田家英。不过他们

的情况我不清楚。

团组成之后，很快就出发了。还是骑马从延安、清涧、葭县过黄河。这是条我已经走过四次的老路，算这回是第五回。葭县的对面就是山西晋绥的临县。

47 02 理发室里的收藏

在临县，有两件事情可以说一说：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康生和团里面的一两个老同志讲起毛泽东要他带毛岸英出来的事情，我正好在那里听到了。康生说党支部批评毛岸英，说他犯了很重的政治错误，不应该把毛泽东当做普通的父亲，而应该看做党的领袖。后来我了解到持这种批评的说法的人，主要就有胡乔木，他是毛泽东的秘书。毛岸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党小组。

后来土改工作团结束以后，有一段时间毛岸英由曾彦修帮助。这时候，曾彦修和毛岸英都住在西柏坡，但毛岸英不住在毛泽东那里，也很少到父亲那里去。在西柏坡毛岸英的事情都是胡乔木安排的，胡乔木最早安排田家英来帮助毛岸英，后来就转为由曾彦修来帮助。那时胡乔木对曾彦修说，要多给毛岸英讲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

一段时间以后，帮助毛岸英的工作又从曾彦修那里转到我这里。毛岸英这时搬到东柏坡。曾彦修转告我胡乔木的交代，要我注意。我一听就明白胡乔木的意思。而曾彦修不知道，他没有听到康生和那一两个老同志在临县的那次谈话。

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曾彦修之后，曾彦修也就恍然大悟，明白了胡乔木交代的要如何帮助毛岸英的原因。又说，难怪整个的土改工作期间毛岸英一个字不提他的父亲，当然更不会提到江青。看来，毛岸英对党支部的批评心中不以为然，只是不愿意说就是了。毛岸英从渤海回到建屏，一次从毛泽东住处西柏坡回来，见到曾彦修时，忍不住说：“又吵架了！”随后似乎发现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只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停下来。

这是一段后话，就放在这里。

工作团过了黄河在临县停留了好几天，任务是了解这个县土改的情况。

我感到头发长了，就到县委机关的理发室去理发。我住在县委机关里，理发室里有两个理发员，都很年轻，不到20岁。一个替我理发，还有一个闲着正埋头看一本书。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手上拿着的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这样的书我看得多了，老远一望就可以辨认出来。一个理发员这样专心地看马列著作，即便在解放区也是比较少见的。我对这个理发员产生了某种兴趣，要他把正在看的书给我看看。我坐在理发椅子上一看，那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再一看，我惊住了。他看的这本《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用过的书，从头到尾都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的道道，有直的道道，有弯的道道，还画了不少圈。有几页上还有毛泽东用毛笔写的眉批。我就对他说：“我有一本新的《左派幼稚病》，换你这本旧的好不好？”我没有同他讲任何理由，他也没有向我

问任何问题,马上说“成”。我理完发就马上回到住的房间拿来一本恰好在身边的同样的书,换到了这个理发员方才看的那本珍品。

回到房间再仔细看,毛泽东做的眉批并不多,但是也有好几页,都是写在这本书第一、第二两章的那些页上,很有意思。写的都是毛泽东读到这里认为应该特别注意的东西、读时产生的感想,比如列宁在讲俄国革命有国际意义时写道“俄国所发生过的现象……必然要在历史过程中重演出来”,毛泽东就写了“必然重新发生的事情,因此不得不承认,俄国革命有些基本点是有这一种国际意义的”这样的眉批。接着列宁又写道:“如果……认为这个真理所包括的,不仅是俄国革命基本点中之有些基本点,那自然是放大的错误。”毛泽东就在这句话旁边批“因此不能不硬搬”。接着列宁又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先进国家中得到胜利之后,多半会发生一种剧变,那时俄国很快就又成为模范国家……而又成为落后的国家”。毛泽东则在眉批中写道“此点在理论上对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同时在列宁写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的旁边他写了一句:“中国的革命精神,将成为东方的模范,但日本革命之后,中国将成为落后的。”

上面写的只是他在这九页所写眉批的一小部分。我在临县对这本毛泽东看过的书反复看了好几遍,觉得从这书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思路和治学方法。

读这样的书既可以学到列宁的思想,同时又可以学到毛泽东的思想。但有些地方也不能启发我的思想。

我真没有想到在得到毛泽东改的艾思奇的那个文稿之后,又得到这样一本书。

我没有去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落到那个理发员手里。我想一定是得到胡宗南要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报后,党中央、毛泽东的图书室也撤退过了黄河,但书没有保管好的缘故。

我一直想专门就这本书写一篇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写。

47 03 保德新畦村

这是我参加工作团后下乡搞土改的第一个村庄。

1947年4月到晋绥,工作团的成员在这个解放区的首府兴县停留了一个不短的时期,目的是了解整个解放区土改的全面情况,并且研究部署全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是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的。而下到村里记得的事就多了。

工作团大多数人留在兴县,去保德的只有我和廖鲁言两个人,我们各去一个村庄,他去花树塔,我去新畦。

塔(记音)是指一种地形,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话说就是山地中的小平原,有点同四川、贵州话里的坝子相近。但是坝子可以很大,“塔”只是很小很小的。用“塔”这个字来记音,肯定不符合本义,因为它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同塔联系上。我想用“塌”这个字代替“塔”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当时当地的人都这么写,我也就不想自作主张地去改写人们写的地名。

因为地平,“塔地”在当时就是一种好地。以“塔”命名的村庄比起以岭、梁、沟命名的村庄一般说要富一些。我对晋绥

这些表示地形的名词作过一番研究，写过一个资料，而且我注意到晋绥同陕甘宁差不多，地形相似，都是黄土丘陵地貌。村庄用地形来命名的很多。但是我去的那个新畦村的“畦”字似乎不是地形，为什么这个村用这个名称，我始终没有弄清楚。

新畦这个村在山上，山下就是花树塔，这个村庄有60来户，如果在陕甘宁就要算是大村了，但在保德就说不上，只是个中等大的村庄。这个村不富也不穷，也是中等程度的。据说工作基础也是中等的，什么都是中不溜儿的。

这个村的运动，我们进村前已经搞过一遍。全村只有一个地主，他是共产党员，以前是村长，他的名字叫张学曾。一旦被划成地主，党员村长当然是当不成了，成了革命对象。他原来村长的地位使他比较早地知道要搞土改的风声，就把地献出来了（“献地”是当时土改的语言）。他被划成地主，我们去了之后觉得他不算冤枉，但他只是个小地主，而且人缘很好，因此在村里对他斗不起来。

此外全村还有两三个富农，也没有“民愤”，因此上级认为这个村的土改没有搞透，还在继续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去了。

去新畦是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晋绥政府民政处处长杜心源和一个名叫王惠的女同志。他们对晋绥的情况很熟，也搞过土改，都是很有经验的。因此我很尊敬他们，自己主要是做调查和观察运动的发展。

比起我在张家口南鸡鸣驿看到的，这里斗得要凶得多。

如果只是分配土地,是不会那么尖锐的。山西的财主据说有一种在土里埋银子的传统,这种财产叫做“底财”。斗地主富农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交代出把银子埋藏在什么地方。财主真的有“底财”往往不肯说。而没有“底财”的人因为说不出来,也就被怀疑是在隐瞒“底财”;有的有“底财”的财主交代出自己在哪儿埋有“底财”,而且挖出来了,人们就怀疑他还有没有交出来的“底财”。这是没有边的事,因此一搞“挖底财”的运动就会很凶,而且很难有什么界限。在土改中常常有因为逼“底财”把人逼死的。

我们这个村在以前就没有挖出什么,这是上级认为新畦土改不彻底的根据之一。我在这里见到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斗争方式——“磨”,就是把斗争对象用麻绳捆着,拴在牲口的后面,由人把着牲口,把斗争对象拉着在斗争场地打圈圈。一边磨,一边要他交代“底财”埋在什么地方。我看过两回,但都没有交代什么。我倒是还看到了一个景象:在一次被“磨”的时候,斗争对象身上掉出了一毛钱。他在被磨完之后,急急忙忙地去把这一毛钱找回来。“磨”这种野蛮的现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感觉很不舒服,就同杜心源和王惠两人商量。杜是个很稳重的人,的确很有经验,对此也不以为然。他就同在那个村掌握运动的人,婉转地表达挖“底财”是个无底洞,不宜抓住不放,我们估计新畦这个村庄未必有什么底财,即便有一点,也不会多,如此闹出人命太不值得。于是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就停止了。

在新畦,我们觉得做到以前已经做到的程度,本来就差不

多了,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进一步搞”的语言,但是我们还是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对运动的状况、群众的心理、运动的后果作了考察和研究。我同王惠两人还做了这个村子的基本调查和研究。

参加工作团后第一次下乡搞土改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运动搞完了。

晋绥的党的组织是中央分局,驻地就在兴县。康生就在兴县的一个叫做郝家坡的村子亲自领导土改。郝家坡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我们这个组工作完后要向康生,也要向晋绥分局汇报。本来应该是我去的,但是我的一个手指头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后面我还要讲。因此,去兴县汇报的事情由杜心源负责。杜心源后来告诉我,康生当着杜心源的面没有说什么,但是在工作团内部批评我们新哇的工作“右”了。康生也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晋绥分局。晋绥分局又下达指示,领导人认为我们在做土改的工作时,没有取得好的成果,我们的结果不算数,要另外派人去搞透。后来听说一个我们认为已经可以过关的富农名叫“犬养子”的,在那场要搞透彻的运动中自杀了。康生亲自在兴县郝家坡搞的那一套,他自己认为是典范。站在郝家坡经验的立场上新哇当然是右了。不久中央批评了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郝家坡就成了极左的典型,而我们在新哇时持的观点,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后来有一个到新哇去过一趟的同志对我说,新哇的群众对后来再去把运动“搞彻底”的那些上面来的人意见非常大,而对我们这三个人说了不少好话。

杜心源、王惠后来都南下去四川工作了。杜长期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和文教书记。王惠在财经部门工作。杜心源同志前几年已经过世了。王惠同志一直联系不上,不知道她还在世不在世。

47 04 新畦调查

十来年前,我考虑过出版新畦调查报告的事。这个调查是与参加这个村的土改工作结合着的。杜心源没有参加,而是我与王惠两人做的。做的时候完全没有出书的念头。50年代初抗美援朝期间,党和政府号召捐钱买飞机,许多人没钱可捐,但是又不能借钱去捐。当时我稿费收入很多,于是就用把本来不一定要抄的资料找人去抄的方式,付钱给抄写的人,好让抄写的人有钱可以捐献。这样我就有了一本《新畦调查》的手抄本。80年代初我拿出来看看,觉得其中所记的对于研究土改的历史是有用的,就与山西一所大学的人联系,把这个稿子给了他们,由他们派人拿着这个稿子再到保德去一趟,作一点新旧对比,然后出书。结果这个学校里的人并没有去做,我也很长时间同他们联系不上,后来我用了很大气力才把那份稿子追了回来。现在我不知道能否自己去一趟保德,能否有时间对稿子进行整理和校勘工作,但它总算又回到我手里了。

47 05 残疾的手指

我现在右手食指有残疾。只说残疾,不说残废,是因为这个食指还没有完全废掉,还能派相当大的用处。

现在我写字是用这个食指和拇指捏着笔,加上中指作为支架来完成的。但它毕竟有残疾,右食指萎缩了,比左食指短了大半个公分。食指关节只能弯一半,食指尖不能弯到手心,要靠中指帮助右手才能握成拳头。

致残的地点便是在晋西北保德县的新畦,时间是1947年的四五月间的土改工作期间。致残的经过是,晚上被油灯的火焰烫了手指尖,起了一个泡,然后非常无知地听从了一个人出的很不卫生的主意:用一根头发穿透那个泡,把泡里的水引出来。这样做就把葡萄球菌带进了食指,引起炎症。接着又为了工作,拖延了治疗。炎症就从食指尖扩大到整个手指,再从手指扩大到手背和手心,引起淋巴腺发炎,病情有扩大的趋势。

最后等这个村的土改基本搞完,我不得不到兴县一个医院去治疗。那叫做什么医院呢,连一个称卫生所都不够,病房就是几个窑洞,几个病人挤在一条炕上。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接近败血症。从手指往上,手臂上可以看到有了一条红线,据说这样的红线如果延伸到胸区,这个人就没命了。我住进去的兴县那个医院虽然非常简陋,但还是治好了我的一场起因很小,只是因无知与马虎而酿成的重病。

在兴县医院治我这手指的经过是这样的，医生见到我炎症这么严重，就决定给我用消炎药，给我吃一种磺胺(S. N)。这种磺胺本来是外用的，只能把它撒在创口上来消炎，不是内服药。但医院里没有别的药，就让我服用。据说服用这种磺胺到一定用量时，一定要吃苏打片，可是医生没那样做，使得我吃了这药后胃痛得无法忍受，只好停药，结果炎症继续发展。内服药不成，就动手术，在手指上和手背手心开了许多刀，引出许多脓，据说是开刀时医生不知保护肌肉神经，把它们切断了。于是整个手指也就萎缩了。

接受这个手术，我可吃了相当大的苦头。医院说麻药不够了，在我手指手背五六次下手术刀时是在没有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老实说真痛得够呛。人们说“十指连心”，在开刀时痛得我头上直冒汗。但如果不这样我这个病就治不好。

在兴县那个医院里没有病床，四个病人躺在一条炕上，和我一个炕的三个病人都是士兵。其中有一个人动了截去半条腿的手术。他们告诉我，在动手术时他坚决不接受全身麻醉。这个战士有一个观念：如果全身麻醉，有可能死了自己都不知道。他坚持在清醒的状况下接受截肢手术，用一块手绢叠成好多层，用嘴咬住，让医生去动手术。他还是经受了下来，手术后据说那个手绢都被他咬破了。比起他来，我没有用麻药在手上开几刀又算个什么？

我的这个残疾，对我以后这么多年的生活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我不说，别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个手指。可是在使用计算机之后，这个残疾的缺陷就很突出了。用计算机就要使

用鼠标。通常人们都是右手抓鼠标,灵活地使用右手的几个手指操作鼠标,同时使用双手十个手指敲键盘。我的右手还可以抓住鼠标,让光标移动,但是还要用左手的手指来按鼠标键。也因为手的这个残疾,最初我不敢使用计算机。一直到2000年才不顾这个残疾学会了使用计算机。

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还在保德另一个村庄和王惠在一起工作了短暂的时间。对这个村庄的模样和我们工作的地点还有点记忆,可是村庄的名称和那里遇到的问题完全记不住了。

就在那个地方,我得到了通知,全团要到河北省建屏中央工委的所在地去,向中央工委汇报。

1947年3月党中央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党中央准备离开延安搬到华北去,但是认为还有必要在陕甘宁边区再坚持一个时期。这时候胡宗南要大举进攻陕甘宁,党中央留在陕甘宁有利于粉碎胡宗南的进攻,击溃乃至消灭蒋介石的这支精锐的部队;但党中央机关要从延安向北转移,转移到米脂杨家沟一带。于是,3月28日后《解放日报》就不在延安发行,而全国各解放区的工作,又急需中央的比较具体的指导,于是决定在华北某个地方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党中央毛、刘、周、朱、任五个主要领导人中,毛、周、任三个人留在陕甘宁,刘、朱到华北中央工委。中央决定中央工委书记由刘少奇担任。

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解决土改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与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指导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健康发展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一项中心任务。

党中央工委的所在地选择了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47 06 我来到了滹沱河边的贾峪

于是我们从兴县出发东去，路经阎锡山的家乡五台山附近的定襄到平山。

我想把平山县的地理位置和我记得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情况，讲给这本书的读者听。平山县——它的位置在石家庄的正西偏北，有一条名叫滹沱河的河流穿过这个县。中央工委所在地的西柏坡就在滹沱河的北岸。

平山县属晋察冀解放区，自从张家口沦陷之后，晋察冀中央局又搬回阜平的城南庄。平山和阜平是邻县，阜平在北，平山在南。可是两县之间不是平原而是山区，所以平山与阜平间的距离，反而比到非邻县的河北平原上某些县远。

在1947年的时候，晋察冀解放区把原来的平山分为两个县，平山和建屏。中央工委和刘少奇就在建屏县的西柏坡村。

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是1947年3月初离开延安的，比少奇同志离开延安的时间要早几天，而我们从晋绥来到河北建屏时，少奇同志朱德同志已经在西柏坡了。工作团到了建屏，团员们就分散在西柏坡附近的一些村子，团长康生住在西柏坡。我被派到离西柏坡步行要不了半小时的贾峪村。

47 07 重访贾峪村

西柏坡也是一个革命圣地。1947年刘少奇、朱德在这里工作了一年的时间。1948年毛泽东从延安出来也住到西柏坡。西柏坡就成为中央最高领导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成为党中央——不再是党中央工委的所在地。党中央在延安有好多个机关和学校，这时候，没有那么多了，而且压缩得很小。但是在西柏坡一个村庄还是容纳不下的，因此，机关学校就分散在建屏的好多个村庄。比方说，中央团校就设立在离西柏坡很近的南庄。我在那里向全校师生做过关于共产主义的露天演讲。那次演讲时的照片我还保存着。

西柏坡是党指挥人民解放军和蒋介石进行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地方。

有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西柏坡举行的。

贾峪是西柏坡的邻村，从西柏坡到贾峪中间只隔一个东柏坡。这一带村庄很密，邻村之间只有二三里路，村庄的人口也很多，虽然似乎比不上我去过的鸡鸣驿，但是小不了多少。

这几个村庄都因得到滹沱河灌溉之利，很富。滹沱河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得很好，河边土地肥沃，种植水稻单产相当高。滹沱河的灌溉工程是很古的时候修成的，中间经过改进，我在那个时候特别注意考察了一下，感到修得很好，我到达那儿的季节正是夏天，农作物和林木长得很兴盛，看到那里的风光，真使我又仿佛到了我的家乡江南农村。

可是这种风光现在看不到了,因为1958年在它的下游修建了一个库容为十多个亿立方米的岗南水库,上面我说的这些地方的农田都淹没在水库里了。

当时的贾峪是一个很大的村庄,有一条大街,大街的两旁有许多小街。现在这条街淹没了,居民们搬到了山上,整个村庄被水库的水分割成很多的小村庄,彼此之间要靠坐船往来,陆路据说也能走,但要绕远。1978年10月1日我利用国庆节重游30年前我工作过的地方,它已经面目全非。

我现在还保存着1947年记的有关贾峪村情况的几页纸。在纸上我记录有贾峪有431户,人口1721.53(我已忘记人口为什么出现小数点后的数字的道理了)。水库蓄水后分散的状况我没有具体掌握。当时,稻田加水田、旱地(即高产田)占三分之二强,现在全都没有了。1978年我重访贾峪时,带上了我保存的当时17个主要村干部的名单,按照这张名单找到了程士魁(当时是教育委员)、陈更杏两个人,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但程士魁那时还担着大队党支部委员,陈更杏是大队水貂厂厂长(贾峪建设了一个水貂养殖场)。他们把我仔细辨认了一番,都不能记得我当年的模样,只知道当时叫老于,甚至还记得我当时住在谁家。那天我还找了贾峪村几个现有干部座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说了过去和这几年的情况。知道建国将近30年这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竟比当时还要差很远。进行了这样一个今昔对比之后,我很有感慨。

贾峪已经没有平的耕地,也不能种什么水稻,看到的惟一的新鲜的东西,就是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个水貂养殖场。

47 08 全国土地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就在西柏坡村举行。这个会议开始的时间是7月17日,正是天最热的季节。西柏坡没有可以举行这么大会的礼堂,因此就在一个打谷场上支起很大的白色的帐篷作为会场。各代表团的代表到齐后,会议就开始了。各代表团的团长中有我一个很熟的朋友,他就是1937年北平沦陷时同我一直从北平到石家庄的赵德尊,他是黑龙江代表团的团长。其他解放区的团长多是知名的老干部。来到这里的代表团带有各地区土改资料,这些文件我都有一份,后来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带进了北京城。

对这个会议,我们工作团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的。

我们到建屏向中央工委报到之后,知道刘少奇准备在西柏坡召开一个全国土地会议。在举行这个会议之前,让我先到西柏坡东面的一个叫贾峪的村庄参加土改工作。

现在我就讲讲当年我在贾峪工作的情况。

我在贾峪的工作可以分做两段。第一段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工作团中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还没有平分土地的政策。刘少奇同志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就是考虑全国的土地改革的政策。由于贾峪靠近西柏坡,少奇同志对贾峪的情况特别关心,他在考虑土改工作问题时就常常把贾峪当做一个具体对象来研究,要我把贾峪的情况经常向他汇报。我同少奇同志有直接的而且是比较多的接触,就是从这个时候

候开始的。后来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听少奇同志的报告,其中虽然没有明指贾峪,但是从他讲话的不少内容中,我听得出是以贾峪为背景来讲的。

我在贾峪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了,我们工作团的任务就是继续研究土改问题,为全国土地会议作准备,而到了开会期间,工作团中的几位年轻同志就担任会务工作,记录各代表团的发言,阅读各代表团带来的资料,向主持这个会议的少奇同志反映。这段时间,贾峪的工作我不能完全不管,有时也回去一下,但主要的时间是在会议上。

会议开得很长,直到9月才结束。少奇同志主持会议,讲了一下会议的目的任务等等之后,到会各代表团的团长和团员们(他们代表一个地区)一个一个在大会上发言。各代表团的团长有时也在一起开会,这种会就由少奇同志主持。他听取汇报,并且提出问题。在少奇和工委的同志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意见之后,提出《土地法大纲》,并听取各代表团对《土地法大纲》提出的修改意见。9月4日那天少奇作了总结发言,会议就结束了。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平分土地和反对官僚主义,整顿土改队伍、整党等问题,整个会议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

47 09 全国土地会议后贾峪的土改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少奇同志在《土地法大纲》中提出他平分土地的主张,在这个会议结束后,又要我回到贾峪,按照

《土地法大纲》来进行这个村的土改,研究执行这个《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贾峪应该说是第一个按照《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的村庄。这时候钱俊瑞来到了贾峪和我一起工作。此时组织上已经决定让他去建屏当县委书记。所以他就先到贾峪来蹲点,领导贾峪的土改。

我在贾峪工作到10月下旬,随后整个工作团又从西柏坡出发前去冀中继续参加土改。

全国土地会议是9月上旬结束的。接着贾峪平分土地的工作就开始了。首先在无地少地农民中进行讨论,接受平分土地的方针。9月12日开始,看地分等级(三等十二级),将土地分类统计,同时进行人口统计。贾峪村原来有一个普查委员会,但是不健全,就又从农民中推出6人,并且吸收了26个贫雇农骨干,12个熟悉情况的干部,9月13日组成了40多人的分地委员会。9月15日召开全村农民大会,通过布告和八大纪律。9月18日起,分地委员会分13个组研究抽补方案。“抽补”就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简称。平分土地常会发生这种情况。9月21日起作具体规划先用地主富农的地填平补坑,然后同中农协商,抽出地来补给贫农下中农,然后再给中农补地,后再给地主富农补地,有问题随时个别修改。9月25日发榜请群众提意见,然后举行骨干分子会议,开无地少地者的会议,是以“闾”(贾峪村分成若干个“闾”)为单位,先提意见,后作决定解决问题,闾民会议有初步决定权,最后决定权在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在作出最后决定后,10月2日宣布分地决定,发“土地条子”(不是正式的土地证),按条

子领地找地,自己找左邻右舍的土地的主人分地,在分定的土地上动手种冬麦。会上我们讲如果有意见,以后还可以提,有纠纷在工作组领导下解决。分地中个别错误,一直到10月8日才算解决清楚。同时解决麦种、军田的问题,转入生产。这一个多月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

按当时的土地,对地主是先宣布废除其原有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再分。土地数量上不少,质量上比较坏、比较远的要进行区别。因为这里没有新富农,有的都是旧富农,因此对富农在政治上要打垮,不过旧富农中也有区别。

做完这些工作,贾峪平分土地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这时少奇同志决定土改工作团要继续前往冀中和渤海在实践中考察和研究这些解放区土改的问题。

47 10 刘少奇同志同工作团全体团员的一次谈话

在这个时候,工作团要求少奇同志同全团同志谈一次话,对以后如何工作进行指示,少奇同志答应了,在1947年10月19日作了这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我整理出一个记录。谈话中第一个问题是我提出的,请少奇同志就贾峪的平分土地问题谈谈他自己的见解。当时我了解到有人对《土地法大纲》中提出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思想上不那么积极,要求给地主富农少分土地的意见很强烈。这种情况我已向少奇同志汇报过了,想再听听少奇同志的意见。对此少奇同志讲了一大篇话。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说:“平好,不好反驳,

不好反对,毛病最少,群众一定要坚持某种不绝对平,则也可以允许。但如果有争论,仍以‘平’来解决问题。在平分土地时,要给地主富农留得同样一份地。”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还说:“南庄(也是西柏坡的一个邻村)地主80%是抗属、干属,如果我们的老子饿饭,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当权的政党,对和尚、尼姑、婊子都要负责,对地主富农也要负责。给地主富农分一份土地,不是照顾地主、富农,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要坚持法令解决问题,不能说应该不平一点,可以不按法令办,那就变动大了。”“如果老百姓硬是不赞成‘平’,实在要少分一些给地主富农,可以依百姓的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声明,我们的方针是‘平’,不平是你们的主张,不是我们的主张。因为我在这里,我可以替你们负一点责任,但这是你们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就是说在农民要求不绝对平时,我们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究实际,不能脱离群众。少奇同志还进一步发挥,如果这个村是贫雇农当权,我们坚持“平”这个原则,不必主张不平,地富仍然会少分到土地,贫雇农仍然会多分到土地。如果地富走狗当权,我们不坚持法令,允许一些不平,那就一定是地富多分。他还说:“即使在贫雇农当权的地方,我们还不能说可以不平,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自己就破坏了法令的严肃性。”我觉得少奇同志的这些谈话充满了辩证法。

少奇同志对贾峪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在这次谈话中,当我再次提出希望少奇同志对贾峪的工作作出评价时,他说:“贾峪在工作中提出了些问题,启发我们的思考,但贾峪不足

以为模范。没有农会，没有代表会，只是小组方式。我们现在运用小组方式比较熟练……没有集中的代表会，工作便集中到工作团手里了。没有代表会，便只有以党治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向我们学的。此外你们赶着要在种麦以前完成平分土地的工作，被动了。从你们的工作来看，你们是不熟练和生疏的。在土地会议时，受到扰乱也受到影响。”后来在谈到土改中整顿党时，他又说：“在土改中把党观察好，在土改中对党加以考验，土改做完，党也就整得差不多了。然后在土改后开大会集中整党。贾峪的工作之所以不能成为模范，就是没有在土改中考验党员来改造党，而是故意叫党员不问不闻，允许党员‘合理消极’。”对我做的工作，领导上能够这么仔细地研究和进行评论，是以前没有和以后也没有过的，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47 11 平分土地的研究

如果说我在晋绥新畦土改中的兴趣是对这个村进行社会调查，那么在贾峪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研究平分土地的问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在土地改革中平分土地的方针。他在会上对这个问题讲了许多道理，这个主张带有比较多的理论色彩，也可以说带有比较多理想主义的色彩。我在贾峪的实践，就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实地研究。

在那种情况下做这种研究很有有利条件，因为许多材料只有在工作中才容易取得。但也有不利条件，如工作很忙，而

且那时我没有一个帮手。在晋绥调查时王惠同志是出了很大力的,在贾峪就只有我一个人做这个事。我那时候身体好,不怕吃苦,常常熬夜作统计。可是时间太仓促,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是研究了各阶层在平分土地中的盈亏情况。我向少奇同志书面汇报了这些情况,我提出的要求少奇同志回答问题的根据,主要也就是这些情况。

贾峪的阶级状况是:贫农 156 户,中农 208 户,富农 9 户,地主 42 户。平分土地之后,(1) 贫农有 7 户,占贫农总户数的 4.5%,分出土地;有 10 户,占贫农总户数的 6.4%,占有土地面积不变;其余 139 户,占贫农总户数的 89.1%,分进了土地。(2) 中农有 130 户,占中农总户数的 62.5%,分出土地;有 30 户,占中农总户数的 14.4%,占有土地面积不变;有 48 户,占中农总户数的 23.1%,分进土地。(3) 富农全部分出土地。(4) 地主有 39 户,占地主总户数的 79.6%,分出土地;同时土地不变和分进土地的也各有五户,各为 10.2%。这就是在平分土地中贫农 11%,中农 62.5% 受损,地主 20.4% 受损,中贫农合计受损失的占总户数的 37.9%,利益户为 51.4%。这是 1947 年 9 月 6 日我整理资料,原有对贫农何以有 7 户分出土地,地主何以有 5 户分入土地,各写有说明,但丢失了。

同时我还对占有土地的质量也作了一番研究,我认为土地质量比土地数量还要重要。在贾峪一带农村,土地以稻田最好,水田其次,旱地最次。我没有贾峪这三种田地亩产的比较数字,但有附近北庄的数字。根据这些数字计算,稻田亩产

45市斗,水田亩产33市斗,旱田只有11市斗。稻田、水田相差不多。我还把稻田、水田、旱地都分上中下三等。分类统计的结果是各阶层人均占有最好的稻田的亩数是赤贫民0.287、其他贫农0.175、中农0.177、富农0.012、地主0.023。占有最好水田的亩数是赤贫0.044、其他贫农0.062、中农0.042、富农0.012、地主0.007。从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来看赤贫1.986、其他贫农1.927、中农1.885、富农1.909、地主1.921,是基本平分的,但贫农尤其是赤贫户,质量和数量都占先,中农数量最低,但质量远远超过地主和富农。

我专门研究富裕中农土地抽补情况,30户富裕中农了除了一户临时生了孩子分到土地,在抽补中是入超外,2户不变,27户减少。富裕中农这个阶层上等稻田被抽走17.9%,中等稻田被抽走10.1%,上等水田增加35.2%,中等水田抽走31.8%。

我还对贾峪196户农户对平分土地的态度作了调查,结果是144户无地少地农户中赞成的是115户,占80%,反对的19户占13.2%,两可的3户占2.1%,还有7户表示愿意过集体生活不分地,占4.7%。52户中农中赞成的15户占28.8%,反对的37户,占71.2%,两可的1户,占1%,也有1户主张过集体生活。

对平分土地这个方针,直到现在似乎没作出正式的结论。我一直很注意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可是像贾峪那样去实行和研究的材料我一直没有看到过。

47 12 刘少奇给我的一个锦囊妙计

在贾峪土改期间,少奇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是我们中央土改工作团即将离开建屏的时候,我考虑到按照党的工作方法,我们这个工作团虽然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而且在团员中有不少是革命历史很长、地位较高的老同志,像我这样年轻的同志只有四个人(其中一位是毛岸英,他比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年轻同志又小几岁),但是到地方去工作,仍然要在当地党组织,比如在地委、县委领导下进行某一个村、某一个乡的土改工作,我们不能用“钦差大臣”的姿态工作。因此可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它发出的指示不正确,我们的工作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我就约另外一位年轻同志去西柏坡,“闯”进少奇同志的住所(是哪位同志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是田家英,但不敢确定),问他“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一次,少奇同志对我们说的话虽然不多,可是我记得非常牢固。我觉得他讲的道理对我很有用处。他说:“你们不要一般地、抽象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用处。国民党的法律,从表面上看,对地主和农民也还是‘平等’的,但是县政府在办案时,如果地主告状,他们就雷厉风行,没有官僚主义。如果农民告状,他们就搞官僚主义。这样地主就会感到这个县政府、这个衙门是自己的。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土地法大纲》面前,

地主农民也是‘平等’的。地主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土地法大纲》到我们县政府告农民的状。在地主到我们县政府来告状时,我们就可以搞点官僚主义。而农民来告状时,我们的政府就一定要雷厉风行。这样,农民就会感到我们的县政府是他们自己的。”

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接着他还讲了一段给我留下印象更深刻、记得更牢固、在以后工作中对自己更有意义的话:“你们在中央土改工作团做了半年的工作,又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中央精神你们是很了解的。你们也有自己的脑子,可以去分析、去判断你去的那个地方的党组织的某些指示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你们应该有把握做出这样的判断,知道哪些批示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是官僚主义的。如果你做出了这样的判断,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把这些指示当作党的指示,而应该视做官僚主义的‘指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向地委、县委讲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建议,但是你们也要有准备,尽管你们反对,也不能把人家的官僚主义的指示反对掉。而且,你们也不好老提意见嘛!老提意见也不一定合适。即便如此,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把他们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我觉得刘少奇在这里说的要注意不能把上级不正确的“指示奉为神明、坚决去贯彻它”这个提示非常精彩,也非常重要。这是原则。)至于你们如何去处理才得当,这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地去处理,要尽量想办法把事情办好。你们要取得好结果,也许不那么容易,要看你们的本事。(那是实际。刘少奇是很讲求实际的。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对人

民事业忠诚不贰的人,困难是不会小的。)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决不要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去贯彻。如果你们那样去做,你们自己就成为官僚主义者了。(刘少奇再一次强调原则性,反对同流合污。)你们应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作为嘛。”

这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头,决心不去做那种把官僚主义的指示奉为神明的官僚主义者。可惜的是,那时我没有做记录,他讲的比我记得的还要多些,但是上面那些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在以后我的党内生活工作中,我就是这么办的。事实上,上级作不正确的指示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许许多多党员因为这是上级领导人的指示,就积极地去执行这些指示。自从我听到过刘少奇讲的这番话之后,思想上得到了武装,就能够理直气壮地顶住,不去执行。有时迫不得已不得不执行了那样的指示,但是心中有数,决不把这样的指示奉为神明。我当然更不会同流合污。同流合污的人,往往不仅头脑糊涂,而且私心太重。其中一些人更可气,可以说属于马屁精行列中人。

我把刘少奇的这番话,看做他给我的一个锦囊妙计。

47 13 如果你是列宁那时该怎么办?

在西柏坡,我们土改工作团的人在刘少奇同志的房间里,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并不真实的“故事”,同时提出一个问题要我们回答。这是我在1947年在西柏坡时的一个特别的经

历。

少奇同志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他说，当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赤卫队攻进了冬宫。在冬宫里有几间大厅的墙上挂着俄罗斯历代统治者——这个和那个沙皇、这个和那个大公的油画。油画里的这些皇室贵族，男男女女穿着华丽的服装，表情神气活现。赤卫队一见就非常生气，就想立即动手把这些油画烧掉。当时列宁也在场。接着少奇同志就问我们：假如你是列宁，你该怎么办？

少奇同志讲到这里停下不说，等我们回答。当时大家不约而同都不吭声，等少奇同志说下去。等了一小会儿，见我们没有回答，他就接下去说，在那种情势下列宁是阻止不了的，列宁不许烧，赤卫队偏要烧，列宁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列宁同赤卫队一样愤慨，指着那些油画里的人说，这些家伙都是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的人，还想在这宫殿里流芳百世，该烧该烧！赤卫队员们一听高兴了。列宁接着又讲我们不能简单地一烧了事，应该在烧这些油画时，举行一个群众大会，控诉这些家伙们的罪恶。他问在场的赤卫队员们，是不是这么做比现在就烧好一些？赤卫队这时候已经没有激动的情绪，能够冷静地研究思考问题了。于是列宁就和赤卫队员们讨论，不一定非要烧掉那些油画，而是把它们作为博物馆的展品，利用展品旁的文字说明对这些旧俄罗斯的统治者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

少奇同志说，列宁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正确地解决了问题。列宁工作方法的原则，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站

到同群众对立的位置上去,我们应该每一分钟都和群众在一起。

47 14 冀中十分区土改

我参加土改工作团的工作,总共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跨1947年和1949年两个年度。这一年半的工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期:1947年离开陕甘宁到晋绥,我到了保德的新畦搞了一段土改工作。这是第一个时期。从晋绥到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一边在贾峪参加那里的土改工作,一边为全国土地会议做准备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是第二个时期。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是第三个时期。

在这里我说“我参加土改工作团的工作”是经过斟酌的。仔细分析起来,“我”、“我们一般工作团成员”、“工作团”这三个不同的概念比较接近,而工作团团长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同前面那三个就很不一样了。康生在晋绥我和他很少在一起。在建屏他住在西柏坡,我在贾峪。我没有向他汇报,他也没有问过。我和他只是在刘少奇找全体工作团开会时才见到。康生除了土改工作团团长的身份以外,还有别的工作。他参加土改活动,当土改工作团团长,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目的。康生当时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土改工作团团长,他做的事情有一些是我们看见了的,有一些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有时候我们在一起,有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了。

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我们工作团的任务并未结束。中央

工委要工作团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当中,检验这个会议所通过的《全国土地法大纲》。看看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解决。贯彻的第一步是召开各地区的土地会议。这时候,康生就去了阜平,参加全晋察冀解放区的土地工作会议,而要我们先去冀中。我不记得工作团其他的成员又到了冀中的什么地方,我只记得我去的是冀中十分区。第一件事情参加冀中十分区的土地工作会议。

我们去冀中,除了康生还在阜平开会之外,其他的人倒是一个时间走的。去冀中必须要路过石家庄,那时候石家庄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守在那里。我们坐的汽车是晚上经过,绕开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可是那天晚上迷路了,大家很担心,怕不小心闯进国民党军队的驻地。如果那样就惨了。后来,总算离开了石家庄。

我只参加过一个村庄的土改,对包括许许多多村庄的地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毫无经验。冀中地区更是第一次到,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在这个会议上,我只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从中了解冀中这个地方土改的情况。领导会议的十分区领导人,对我很尊重,因为我是“中央来的人”。可是我什么意见也发表不出来。我向刘少奇提出的如果当地领导人是官僚主义者怎么办的问题,在那里没有遇到。我反而主观地觉得这个地区工作得不错。

这个会议是在安国召开的。开会地点就在有名的安国药王庙。安国是华北有名的药材集散地,所以有这么大的、建筑得这么好的药王庙。这个会址留给我的印象比这个会议本身

还深。大殿上药王的塑像保存得很完好。我们的会是在侧厅举行的。在去安国前我就听说这样一个药材集散地的县城。到了安国，并且在药王庙开这个会之后，加深了这个印象。因此在安国开土地改革会议期间，对于全面问题的兴趣，反而不如对药材经营的个别问题的兴趣大，关心在安国土改中如何保护这个药材市场的事情。因为这个市场为安国当地居民带来不小的好处。

在安国我就住在城南老卜家，老卜是当地的大财主，家里比我在安国开会时住的地方还要阔气。而老卜家又是主要的药材商，对卜家实行什么政策合适，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了解情况，不敢瞎提意见，只是向地方党的领导人用随随便便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发现他们也不是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出中肯的意见。

在土改中少奇同志还是很重视工商业的，在西柏坡他对这个问题也讲了一段话，要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可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游击部队”是很难提出什么意见的。

开完在安国举行的土地工作会议之后，我就到饶阳的一个叫作耿各庄的地方“蹲点”土改。这样的工作是我的老行道了。饶阳有一个五官村，大概是全国第一个搞农业合作社的，那里发展的进度已经超出土改了。可是这个情况我了解得比较晚，是我到了耿各庄之后才知道的。不然就应该选这个村，回过头来看，他们是怎么超越土改这一阶段的。我在耿各庄时间很短，就得到通知要我前往山东渤海和土改工作团

大队人马汇合。

这时候,大概已经到了 1947 年的年底。

(四) 1948 年

小 引

48 年前半年继续进行土改工作,后来是到中央宣传部工作。

48 01 介绍一点渤海土地改革的历史资料

那时的渤海很热闹,由于战争的原因,华东局的人集中在这里,连东江纵队也有人在这。我就是在那里同我的一个老部下,广东省青委的干事张持平见过一面。华东局有一个工作队在这里已经搞了一阵子上改,组长王力(就是“王关戚”中的那个王力)向工作团汇报时我在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他。在渤海我还见到了袁也烈，他是 1937 年初我在民先全国总队部党委时的党小组长，也是我的第一个党小组长。那时候他是渤海军区的司令员。

工作团到渤海已经是 1948 年了。

全国土地会议要求各地区在会后都举行本地区的土地工作会议。我们土改工作团到渤海的时候，渤海地区的土地工作会议已经在举行了。康生也直接从阜平到渤海，比我们早到了一些时间。

我想在讲我参加的和看到的情况之前，先把渤海地区土地改革的历史的情况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最近，我偶然遇到一位在渤海工作过，后来又专门调查和撰写过《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同志。他给了一个他所了解的渤海地区土改的历史情况和 1947 年土改中发生的问题的材料。材料中说：1946 年 5 月党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就是有名的“五四指示”。这个文件提出要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注意决不可动中农土地，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不要用反对地主阶级的办法对待商业资产阶级等内容。这一年 9 月 1 日，中共华东局起草了《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华东管辖的范围就主要是山东，山东解放区分三个大区：胶东区、渤海区和鲁东南区。1947 年初华东局准备迁往渤海区。这时候，渤海区是个新解放区，可是集中的人们很多，包括在粤北、江西的同志也集中到那里去了。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1947 年 8 月到 1948 年 2 月 5 日在阳信的李家桥（后移至何

家坊),召开了为期138天的渤海区土地会议。我们到渤海的时候,这个会议已经开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康生是在1947年11月6日到这个会上的。他来到以后,在11月16日给中央发了个电报。电报里说:

“我接电后于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运也都很多。庆云、利津、广饶、滨县等县长,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的机关。”

康生在电报中对当时是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渤海区行署主任的李人凤、公安局长的李震是这样写的:“景(地主),李人凤(抗战初期为国民党军官),公安局长李(曾被日本俘虏过)……”

1947年11月25日,康生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混入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而且掌握着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

康生面对500多位代表,声色俱厉说:“就代表出身的情况就可看出,渤海党内不纯到什么程度。依靠这样的党是不

能彻底进行土改的。”

我看的这个材料的作者写着“上述电报和报告均保存在山东省档案馆中”。

康生在做报告的时候,我没有到会,还在冀中。他讲的这些话,我没有听到。以上情况还都是最近(2003年6、7月)看了这份材料才知道的。

48 02 我所知道的渤海土地工作会议 的情况和听到的康生的言论

我们到了渤海区土地工作会议上的时候,康生并没有把他给中央打过电报和做过报告的事情告诉我们。只是对我们说,渤海地区的情况严重;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这个人思想上没有入党;整个渤海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思想上的问题很严重,组织上也不纯。我们不清楚他所根据的是什么,总以为他是有根据的。我到了渤海以后,康生听王力汇报的时候,我也在座,而且我还记了笔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档案中。王力把渤海区的情况说得很严重。我就更不怀疑了。我在会上还听了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的讲话。邓子恢的讲话很长,我记得讲了两整天。其中就有批评渤海区党委,说区党委问题严重这样意思的话。所以,那时对康生的言论并没有怀疑。

后来,康生又去胶东区党委走了一趟,回来时说,胶东区党委的问题比渤海还严重。景晓春是思想没有入党。林浩是个假党员,组织上也没有入党。他把胶东区党委的书记林浩

也整了下来。

对胶东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抗战前我入党以后第一个党小组长袁也烈,那时是渤海区军区司令员,他也是挨批的。他在北京的家正在我家的对门。我在干校的时候,他听说他的对门住的有我,“文革”中他从干校回到北京,就来找我。他告诉我,渤海的景晓村、李人凤等这些人和胶东的林浩都是好同志。康生整他们完全是诬陷。

袁也烈告诉我,景晓村建国后平反,曾在机械工业部担任过副部长。他同景晓村有接触。景晓村还从对门到我家里来过。

48 02 康生说刘格平这个人真怪

刘格平是当时渤海区政府的组织部长,他同袁也烈一样是老资格的革命工作者。1948年2月10日是春节,记不清是当天还是第二天,刘格平邀请工作团的全体团员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应邀前去了。刘格平是回族人。从刘格平家回来,康生对大家说,刘格平是个共产党员,这个人不谈回族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谈起回族问题,他的民族情绪非常高,又把马克思主义丢一边了,事实上刘格平是回族的民族主义地位高于马克思主义。接着就说刘格平这个人很怪,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抗战以前的1937年,刘格平和薄一波等61名重要的共产党员,都被关在北平的草帘子胡同监狱。我记不清楚,也许是叫做反省院。监狱和反省院是有区

别的,监狱里的人是判了刑的,等刑期满了才能出来,反省院里的人还没有判刑,还要看住在那里的态度。按照国民党的规矩,被捕的人出来都要写反省书,承认自己在政治上犯错误,办了这样的手续,就可以把他们释放出来。我们党的规矩,是党员就不能写、不能办这样的手续。办了这样的手续就是丧失了气节。草帘子胡同里的那些人一直不肯写,也就关在里面一直出不来。这时候,在延安的党中央考虑到抗战可能很快爆发,非常需要党的骨干力量抓住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经过党中央讨论正式决定,允许这些党员办这样一种手续取得自由。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到草帘子胡同,薄一波等接受了这个指示,办了一个手续,就出来了(这件事康生没有讲之前,我就已经听过一点了)。刘格平也是坐监狱的人中间的一个,开头他不相信中央会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后来他知道中央的确作了这样的决定,仍不肯同别的人那样用这种方式取得自由,因此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取得自由。因此刘格平又比别人多蹲了八年监牢。康生说刘格平这个人真怪,康生对这个情况很清楚,康生也是在1937年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可能党中央讨论的时候,他没有参加。但是,很快他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在讲刘格平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口气和表情并没有丝毫赞许刘格平的意思,而只是说他怪,把这同刘格平回族意识超过马克思主义意识相提并论。他的这个意思,不只是我,工作团其他的人都听得很清楚。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工贼”。1937年办了手续出来的那些同志当然统统被定为叛

徒。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不但不向造反派讲清自己知道的事实，反而推波助澜，说薄一波这些人是叛徒。而当时在山西担任领导工作的刘格平，就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敌人面前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当时我是走资派，对山西运动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在围绕拥护和反对刘格平的事情上，山西两派斗得很厉害。刘格平的态度，也有点像造反派那样的神气，不过后来刘格平也被打倒下去了。

后来，在解决康生的问题的时候，我和曾彦修同志认为康生这种出尔反尔的作为非常恶劣，我们就把当时的情况写进材料，揭发康生。在处理康生的中央文件上，把我们那个材料作为中央文件的一个附件用上了。

48 03 毛岸英在渤海

关于毛岸英的事情前面讲过的那一些，有关在临县所听到的和在1948年他回到西柏坡及他后来搬到东柏坡去的事情，这里就不再重复。现在只讲他在渤海时候的一些表现。

我们到晋绥之后，他没有去保德。从晋绥到建屏中央工委后，工作团比较分散，他没有去贾峪。在冀中他也不在十分区。这样到渤海以前，事实上我们没有太多接触。

到了渤海，整个工作团在惠民区党委所在地的时间相当长，我同他接触的就比较多。我回忆得起来的关于他的事情也就比较多。

在渤海，开头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毛岸英还显得不那么

愉快,后来情绪好起来了。他和我们“三青年”很自然地常在一起。那时我32岁,曾彦修还不到30岁,史敬棠也不会比我大多少,毛岸英的年龄大概二十三、四岁。年龄相近,很容易谈得来。同毛岸英一接触,我就很喜欢他,他思想很开朗、肯用脑、不喜欢议论琐碎的事情,生活上大大咧咧的。我觉得他性格上同我比较接近。他在国外呆久了,对国内生活的知识比较欠缺。有一次不知是怎么弄到了几只螃蟹,他不会吃,拿起蟹腿就连壳嚼,然后吐渣,一面吃一面连声说:好吃,好吃。引起我们大笑。当时我们还对他作了吃螃蟹的技术指导。他也一本正经地学。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两起,我们笑他,他也不生气。在同我们谈了一些理论政治问题之后,他真的对我们佩服起来,有一点把我们看做兄长的意思。我们也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

有一件事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他的水平和性格。有一次康生听在渤海工作的人(记不清楚是不是王力)汇报,我、曾彦修和毛岸英正好在旁边。汇报人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村庄,反动派的军队在村庄里面,四周围都是我们的部队,我们攻打这个村庄,他们抵抗得很坚决。这时候我们派了两个侦察兵穿了便衣进村侦察,被反动军队发现。这两个人被抓起来杀害了。听到这里,康生勃然大怒,使劲拍桌子,用责备的口气说:我们围村的军队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对这个村庄开大炮轰,小小一个村庄都给我轰平,让反动派知道我们的厉害!

散会下来,毛岸英对康生大为不满,他说怎么能这么做?!

在那个村庄里不全是反动军队,还有许多老百姓,怎么能够开炮去轰?我们对他说康生这是气话,他不是在下炮轰的命令,事情已经过去了。毛岸英这次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他说,就是气话,康生也不应该这么说。一个政治局委员说话怎么能这样不讲原则。原来我们是劝他的,想帮助他懂得应该尊重康生这样的领导人。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倒是他说得正确,而想帮助他的我们,反而不那么正确了。这件事情,使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他常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对渤海土地会议有些发言中的内容,他也不以为然,而且都是从原则上提出问题。不过这些却只是对我们讲,不对康生讲。看来他还是有些顾虑。

毛岸英大大咧咧,做出让人好笑的事情,也不只上面说的那些,还有别的。

我们在渤海时,渤海区常委配备了几个人和我们这个工作团一起活动,其中有张辑五、杨士杰、戴曾斌等同志。张辑五后来在上海工作我见过。杨士杰就一直没有来往。关于戴曾斌,1956年党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我是江苏省选出的代表,并且担任江苏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在江苏省代表团的名单当中,看到有戴曾斌这个人,但是我们没有接触。几年后,我向别人问起她那时候在江苏做什么工作,没有人能回答出来。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照片,我们土改工作团和渤海的同志的合影。毛岸英站在最后一排,因为他的个子比较高,一看就看得出来。我和曾彦修等三青年大概是在第二排,戴曾斌是蹲

在第一排。我记得照片上也有张琴秋。似乎没有高文华夫妇。

我们在渤海开土地工作会议期间，康生从渤海到胶东开土地工作会议。他把毛岸英带去了。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材料，材料中写毛岸英从胶东回到渤海以后，曾经对同室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说：康生整人家太狠、太过分，缺乏政治家风度。别说毛岸英大大咧咧，可是他说话也还注意掌握分寸，也只说到这样的程度。

最近，田家英的女儿陈烈写了一本《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其中登了一篇毛岸英写给史敬棠的信的手迹。这封信有两页，照相制版的时候，把一页盖住了大部分。这第一页写的是这样几句话：“敬棠同志：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同志的信，颇有所感。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80%。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作忠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吴剑远已到此地团校学习，你知道吗？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我现在原机关工作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逐渐地改过，能改到什么程”。这是第一页，写到这里就被压住了，接下去的话就看不见了。这件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准备问一下曾彦修，究竟毛岸英批评史敬棠什么？不过从信中

可以看出来，毛岸英是很懂得掌握事物的分寸的。他收回对史敬棠的批评，也只说收回 80%。

全国解放以后，我再也没有见毛岸英，只是听说他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学习”了短时间。后来，他跟着彭德怀去了抗美援朝的战场，被一个炸弹炸死了，真可惜。

48 04 董家佛堂

渤海区土地会议后，我到了阳信的董家佛堂村。

董家佛堂这个村庄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有一年有一个姓董的农民从外地逃荒到这里。他挑了一副担子，全家的财产可能还有小孩，都在这副担子里头。但是在这副担子里头还带着一个很小的佛像。后来这个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根，长期呆下去了，他认为是这尊佛像保佑了他们家，就为这个佛像盖了一座很小很小的庙供奉起来。这件事在周围村庄传开了之后，就有外村的人来上供，这个村庄也就被叫做董家佛堂，同时这个村庄封建迷信色彩也比较浓厚。

我下到这个村庄之前被告知，这个村迷信的势力很大，而迷信势力又总是同反动政治势力勾结在一起的。我听说在这个村庄被解放出来之后不久，渤海区党委曾经派了一个工作组到这个村里搞运动。当工作组还在村里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几百上千的人拥到董家佛堂来取“圣水”。来的人说董家佛堂的水是“圣水”。喝了之后，有病的人病就好了，没有病的人可以不生病，而且外村的人已经治好了不少。这一天，

他们又来喝“圣水”，而且还送匾。这件事发生之前，驻村工作组竟一无所知。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主动提出进入这个村庄，来同他们斗一斗。渤海区党委给我配备了六七个人，还给我一支手枪，几发子弹，作为护身之用。不过这支手枪，我没有开过一枪，在全国解放后连同那几发子弹全部交公了。

我在那个村里发动了群众，把工作组的人分散到这个村庄的居民家中去住，一个人分工做几户工作。至今我还保存有这个村庄的地图。地图上标明各户的所在地和户主姓名，（若干户划成一个区）工作组组员都住在哪一家，分工联系哪个区。我要求若干天内到每户了解村里的情况，其中包括那次搞取圣水迷信活动的情况和村内的组织者，并且发动群众来同村中的坏人进行斗争。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效，迫使那个迷信活动的组织者具结承认错误，作出保证，打上了手印。这个姓慈的人（那个村庄该姓人很多）具结的原件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们的工作，从解决这个“圣水事件”开始走入土改的正轨，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没有发生问题，算是完成了这期的土改。但我对这次运动是否真的解决问题，还有一定的保留。我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彻底揭露出来。我们走了之后会不会再发生问题，我不很放心。但我们在那里暂时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到了该结束土改工作团的工作，到别的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了。

2001年6月21日，我专门又到董家佛堂走了一趟，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现在把这篇日记全文引在这里。

6月21日我到了董家佛堂 53年前我工作过的村庄

1948年春,我在山东渤海解放区的阳信的一个村庄——董家佛堂工作过一个时期,有多长记不准确了,总之不太长。回忆起来,不会超过两个月。

在渤海期间,在听当地的同志向我们工作团汇报时,听到一个有关董家佛堂的情况,说那里发生了一起事件:不久前的一天,来自附近村庄的几千人忽然聚集在董家佛堂来取能治百病和能给人带来幸运的“圣水”——一种迷信活动。当时这个地区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不久,渤海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派出了清匪反霸的工作组,为的是通过这个清匪反霸的运动,建立真正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农村基层政权。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迷信活动。组织这个活动,总有一个过程。要这么多的人参加,也不会很保密。可是住在各村庄的我们的人,包括董家佛堂工作组的人,对此竟一无所知。(这一点,同1999年5月,法轮功的信徒从各地聚集到北京来,到中南海西门外静坐示威的情况完全相似。)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很严重的。我又听说这个事件还没有处理。于是我自告奋勇,向工作团的领导提出,前往董家佛堂,调查研究,处理这件事。这样,我就到了阳信董家佛堂这个大村庄。

我在董家佛堂工作,这已经是53年以前的事情了。建国以后,阳信县的同志,知道我曾经在惠民阳信一带工

作过，于是阳信县党史办的边玉庆同志，在对中央土改工作团在渤海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向我本人调查，我给他们提供过材料。这些年来，我也老想旧地重游，到董家佛堂看看。今年6月我有机会去山东，经过联系，在2001年6月21日那一天，我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渤海的建制早就不在了，惠民、阳信都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的管辖范围。6月20日我先到惠民，那天晚上滨州市派了个女副市长祁维华到惠民接我到滨州，和滨州市的王宗廉书记等见面。第二天一早，在滨州宾馆同王书记共进早餐之后，祁副市长就陪同我出发去阳信董家佛堂。我没有弄清楚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汽车同阳信同志的车子会合，由他们的车子带路，一路曲曲折折走了很久，才到了那个村子。

一进村，我发现这个村庄的面貌完全变了。53年前，我在这个村庄工作时，曾经画过一张全村各户住宅位置的示意图，这图我还保存着。现在我坐着汽车进村时一眼就看出整个村庄的格局和当年相比完全变了样。可惜当年我画的那张图至今仍压在箱底，还没有拿出来，情况不能说得更准确。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全村占的土地比较少，各户大门是朝不同的方向开的。而现在的房子是军营式的。听说那时没有红色的屋顶。现在红屋顶的房子很普遍。我们的几辆汽车，开进那个村庄的主要街道时，看到街道上挂着一条欢迎我到这个村的横幅。今天没有带轮椅。原先感到有些遗憾，可是事实上用不着，

因为有一点小雨,而且村庄已经大变样,也就无“旧”可“怀”,即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坐着轮椅去看。

车子停在一座经过他们考证、当初我的房东家地基上新盖的一所民房门口。我的那个房东早已去世了。他的后代把他的照片送给了我。那不是53年前拍的,就是那时候拍的我也不会认出来。

我和陪同我前往的滨州市的祁副市长、阳信县的李慎猛县长和我特别通知希望在那里见面的边玉庆,进了房。我还没有坐定,全村的人知道我来了,一下子来了许许多多的人,趴在玻璃窗外看。

我进去的那一间房的面积大概有5m×4m,估计是布置过的,似乎是一间会客室。宽的一面是玻璃窗,朝窗摆了一大一小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似乎还有一把椅子和一个小板凳。我不想让一面玻璃窗把我们同村民们分开。我示意请外面的老人进来。外面的老人一进来,我同一个一个的老头老太太照相,市和县的领导只得站着。我在那时向这些老人问这问那,市县领导就只有站着听。这也许同今天的惯例不一样。我想平常不会有让领导站着,老百姓坐着的道理。那天没有办法只好委屈领导一会儿了。房间就那么小,坐位就只有几个。甚至有的老头同我合影,只能坐在小板凳上。

我问老人们的年龄。问他们记得不记得53年前村里的事情。1948年,当初30岁的人,现在是83岁;现在73岁的人,当时是20岁。今天来的人,年龄最大的就是

83岁。农村里讲虚岁。按他们的说法是84岁。按虚岁我就是87岁了。

他们对我提的问题回答不出什么东西,有的说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干什么的,以为我是搞“地下工作”的。1948年这个村庄已经解放近一年了。但是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还不够大,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错觉。

当时我们党和群众还没有建立起互相信任。那时的董家佛堂以及它附近的地方,政治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在我没有进村之前,我们党已经派了工作队进了村。可是那一天,谁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忽然从附近许许多多村庄有数以千计的人,(他们说大概有两三千人)来到这个村庄取圣水。许许多多人知道的即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事先我们却一无所知。这说明党的群众基础的确成问题,我对这个村庄记得最牢的当然就是这件事。可是当我那天在董家佛堂问那些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记得这件事。

1948年我到这个村庄后,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最后找到一个本村组织这次迷信活动的组织者,要他写了一个悔过书。他在这悔过书上打了自己的手印。他写的这个悔过书当时就贴在我在阳信土改的笔记本上,我也一直保存着,可以从箱子里找出来。这个写悔过书的家伙今天没有来,如果来了一定记得。我想他准死了。(后来听说,这个人被我们镇压了,这一点我下面还要写。)

那个写悔过书的人,我记得姓“慈”,第二个字是排

行，似乎是“振”字，姓慈的排行我记得还有的是“玉”字。6月21日我问起在座的就有一个叫慈振的。在董家佛堂，姓慈、姓董的人最多。1948年，当时姓慈的多一些，那天他们告诉我，今天姓董的又多一些。

在1948年董家佛堂的政治状况，当地我们的党组织看得的确是相当严峻的。

我记得很清楚，“中央土改工作团”没有来别的人，只有我一个团员。团长康生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到形势比较严峻的地方来，而且团里也没有别人到董家佛堂来看过我，帮助过我。当然我也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而是和好些当地同志在一起。比方那时我有一把防身的手枪，也是当地的同志给我的。而且他们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劝我不要随便跑。可是我还是白天晚上到处跑，同人聊天，同小孩子玩。否则我怎么进行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把村里那个组织那次迷信活动的家伙揪出来呢？

在6月21日那天，有一个66岁的老太太说，当年我同她一起纺过线，现在66岁的人当时的年龄应该是十二三岁。这件事我记不得了，但是符合我的性格。我在延安纺过线，在董家佛堂见到当时这个小姑娘在家里纺线，我一定会手痒，想露一手的。

不能在这个房间里，也不能在这个村庄久留，我就谢谢阳信县同志的邀请，不去县里吃午饭，就站起来走出房间。这时候门口街上围着我坐的那辆汽车，挤满了人。我请《齐鲁周刊》的记者李强，对四面的群众都照了相。

我同不同方向的群众鼓掌和挥手告别。

董家佛堂是个大村庄,1948年的时候就有百来户,四百来人。现在有一百八十来户,六百多人。它是阳信河流镇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它离惠民的何坊——1948年华东局就曾经驻在此地——很近。从董家佛堂去济南没有走从滨州去阳信的路。滨州和阳信的同志送上大道,我就同他们告别。这时候是将近6月21日的中午。从前一天的中午快13时到惠民宾馆,到这时候不到24小时。

最近我又收到边玉庆的两封信。

48 05 解放了的石家庄

1948年6月间,我结束了董家佛堂的工作。这时候接到组织上的一个决定,要我回建屏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其实不仅我一个人,土改工作团的全体团员,除了康生——他还留在山东——都回中央机关分配工作。这时候,从土改工作团开始工作以来已经快一年半了。

回建屏要路过石家庄。1947年10月下旬,工作团从建屏出发去冀中的时候,石家庄还是敌占区。而这次从渤海回来,石家庄已经解放了,再也不必担心在这个城市附近司机迷路了。大家提出在路过石家庄时,在这个城市多呆一下,看看这个新解放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子。石家庄是抗战后我到过的第二个解放了的的城市。第一个是张家口,我也想把这两个城

市比较比较。

在延安担任自然科学学院化学系主任的李苏，这时在石家庄当炼焦厂厂长。我就到那个厂参观了一下，而且晚上就住在工厂，同他躺在大床上，作彻夜长谈。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我很不习惯，他睡着了，我却一直醒着。

我们在石家庄的时候，还从石家庄出发去参观了井陘煤矿。我下过煤矿，有些经验，下井时带着一件比较厚的外衣。高文华却只穿了一件衬衣。下到井里又凉又有风，我怕这个老同志感冒，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我自己只穿一件衬衣。高文华比我岁数大得多，抵抗力不会有我那么强。结果证明，我自己的抵抗力也不怎么样，第二天回到石家庄，我发起高烧来，进了石家庄的铁路医院。医院说我得的不只是感冒，而且还有疟疾。烧到40度，真有点糊里糊涂的。不过我这个不能什么事也不做的性格早已养成了，烧得这么高，我还是教医院里的护士学德文字母。因为这个医院医生的处方是用德文写的，她们有认识德文字母的要求。

当然，一到石家庄，首先还是请当时在这里的最高领导给我们讲我们的城市政策。1947年少奇同志在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团长会议上讲过一次城市工作，强调不要把农村这一套搬到城市里去，讲了城市解放后进行清算、增资、房租等问题，讲了要鼓励私人资本，采取轻税政策和企业管理问题等等。在石家庄我了解到，他们基本上就是按照少奇讲的那样去做的。只是我住了一晚的炼焦厂和去参观的井陘煤矿都是我们接收下来的大厂，而同私人资本完全没有接触。

48 06 到中央宣传部的第一晚

我1948年8月从渤海到中央宣传部就职，一直呆到1975年7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连续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27年之久。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间比陆定一还要长。陆定一到中宣部比较早，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他就担任中宣部长，但是“文革”开始，他就离开中宣部了。这就是说他离开的时间比较早。因此，我是在中宣部呆的时间最长的人。所以对中央宣传部的这段历史，我是有资格的见证人。编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同志到我家访问过我，我讲了一些他人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这27年的起点就是1948年8月。

记得去中宣部报到这一天，我先是到西柏坡向中央报了个到，得知我要去的地方是东柏坡。东柏坡这个村庄原先我没有住过，但是很熟悉，因为它在西柏坡和贾峪之间。1947年我在那两个村庄之间来回走，都要经过东柏坡。于是吃罢晚饭，我就从西柏坡到了东柏坡。

那天天气很热。虽然已近黄昏，但是村民都不愿进屋。我先到了中宣部。王惠德在一户农民住宅的屋顶上等我。原来他们这些天都在屋顶上过夜。王惠德建议我也把铺盖搬上屋顶，和他一起在那儿过夜。便于让人们夏天在屋顶上过夜，也许是东柏坡的农舍都是平顶的原因之一。在1947年，我也在西柏坡和贾峪过过一个夏天，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次也没有

上到贾峪的屋顶过夜(可能是因为那时正开全国土地会议),因此王惠德要我在屋顶过夜,我觉得很新鲜,就照办了。

王惠德那时才 26 岁,比我年轻 7 岁。他到延安的时间比我早。在延安时我就听说过有王惠德这样一个人,知道他才 20 岁左右。在马列学院毕业之后,他就留在那里当政治经济学的教员,是特别年轻和优秀的理论工作者。而且在延安流传一个故事,说王惠德和也在马列学院教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学者王学文曾面对面地争论,各不相让,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看法。他们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当时没有问,以后也没有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争论的内容,想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后来我从北平回张家口,在晋察冀日报社同他见了好几次面,他对我一直很热情。这次他又为我安排了这个露天的住所。

那天晚上,在屋顶上不能点灯,也就不能做什么工作。王惠德就在屋顶上拉小提琴。此道我一点也不通。不过在晴夜的满天星斗之下,两个人都在屋顶上,一个人一曲接一曲地拉着提琴,另一个人躺着听着,这样一个景象给人留下的记忆是很深的。

我在中央宣传部 27 年历史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48 07 工校艺术科

党中央在西柏坡,对周围的老百姓说是一所学校,简称“工校”。中央宣传部在东柏坡也就有一个代号,是“工校艺

术科”。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个破牛皮纸口袋,它本来是用来装1925年上海书店印行的张伯简译制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的。口袋上除有Wang Sinmin的一个圆章,还有署名禹(辛民)“请转中宣部存”的字样,并且打有“工校艺术科”的图章。这样一个口袋,我一直珍藏着,作为一个纪念物。

那时正在建立这个“工校艺术科”,所以人很少。比我早到几天的有王惠德,和我先后到部的还有张仲实。我记不清楚还有什么别的人,只还记得有个马来西亚的华侨林坚,我在东柏坡的那个时候似乎见到过他。不过他好像没有在那里住。在那里住的,做理论工作的就只有张仲实、王惠德和我三个人。

此外,“工校艺术科”还有一个图书馆。它的藏书是原来延安中共中央图书馆的,是从原解放区坚壁清野的地方取出来,运到建屏的。大概就是林坚把它们运来的。这批书运到时很乱,需要做大量的整理工作。于是就调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她们是刘敏、高新华、于佩秋、王贤等几个人。考虑到东柏坡不是久居之地,这批书不久还要转移,我们就请木匠做了一批既是书箱,又是书架的小箱子,把整理出来的书装在箱子里。后来进城,这样的箱子就都用上了。使用这种箱子搬家时就不用再整理图书,不会乱。我现在家里还保存着一个,只是把盖丢了。这个图书馆主任的工作就由我兼管,我对图书馆工作总是很有兴趣的。

这时候我和王惠德两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

把各自搜集到的延安《解放日报》一张一张地整理,居然整理出全套的《解放日报》。最初还缺一张从延安撤退后出的八开报纸,后来这一张也找到补齐了。我们把这全套的《解放日报》运到北京,找了一个地方影印了。现在就有12册影印的全套报纸,在许多图书馆可以找到。在这件事上王惠德和我是有功劳的。

关于这个图书馆,曾彦修告诉我一件事,那就是苏联来的几个人到西柏坡,要查什么资料,就到这个图书馆来了。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苏联计委主任沃斯温新基斯写的书,听说还得了斯大林奖金。可是他们见到了以后,既紧张又神秘地说“这本书要从书架上拿下来”。大概是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这个图书馆根本不是公共图书馆,而且连书架都没有——有的只是上面说的书箱,不要说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按照这个意见去办,事实上也做不到。

这个图书馆在进城之后,就直接了当地使用“中共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后来中央宣传部又接收了一个图书馆,和老北大的图书馆几批书合在一起就称“中宣部图书馆”,后来中央又把这批书提走,因为这个图书馆的许多书是毛泽东同志看过的,说它有档案的价值。

48 08 你写的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在中宣部我的工作主要是写政治课教材。第一本分配给我写的书名是《共产主义》。要求写成六七万字以内的小册

子,是通俗性质的,不是学术性质的。我花了三个来月的时间写成了一个初稿,交给当时惟一的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要我给张仲实看。张仲实是一个30年代在上海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宣传的人,翻译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也写过一些小册子,比我大十多岁。他来帮助我,我是很高兴的。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陆定一把我找去,对我大发雷霆,说,你看你自己都写了些什么?你写的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我第一次看到领导发这么大的脾气,气得他手都有些发抖。可是他说的,我完全莫名其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把马克思写成了牛克思了,只好把我的书从陆定一的书桌上拿回去。回来一看,原来张仲实对我的书稿改动得很多,而改完之后他没有给我看,就交上去了。陆定一批评我的这几个地方,都是张仲实改上去的。因此我就弄不懂陆定一对我的批评了。

张仲实改的这些地方,我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也不认为问题就那么严重。稿子我拿回之后,觉得改得很乱。我要重改一遍,就得从头边改边抄,工作量不小。还有陆定一批评我的时候张仲实不在,我改回去还要同他商量。还不知道张的态度怎样,我同张过去没有一起工作过,我不了解他的脾气,不知道如果把陆定一对我的批评原封不动地告诉他,合适不合适。因此对于那本书稿的修改,我就采取拖延的办法,没有积极去改,而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了也是分配给我写的另一本政治课教材上去了,陆定一也没有再催。这本教材的书名是《调查研究》。而《共产主义》的这个稿子始终我没有再动手改,把它放在一边,最后连这个文稿也丢了。这件事没有人再

问,就真的不了了之了。

后来陆定一这种因为我气得发抖的事情也还有过,不过我知道陆定一部长脾气,气过了,他就没有事了。他对我很好,我并不怕他。

48 09A “秋游”

我们在建屏,居然也有过一次备战后撤的行动。

大概是平汉线石家庄周围的战争形势有了些变化,我们还得到国民党军队进犯中央所在地的情报。于是决定让靠近西柏坡的有些单位机关暂时向后撤一下。这次行动属于军事行动性质,动作就很快。“工校艺术科”的人本来不多,就作为一个小分队向西出发了。这时候,到了秋天,我们就把这个军事行动叫做“秋游”。

事先安排好了一个目的地,这个地方的名字,最近我查了一下是“营里”,它在滹沱河边。滹沱河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发源于山西东北部有名的平型关附近,在五台山附近和清水河汇合,然后流经河北的小觉。我们这些青年就到了小觉的营里。我的印象中的那次“秋游”,我们是从东柏坡出发,朝西沿着滹沱河走,走不多远又钻进了一条沟,这条沟里的一个村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估计也许出了建屏,但没有出平山。

当时正是1948年晚秋季节,天气不热,但也并没有什么寒意。山沟里风景很好,特别安静。潺潺的流水,可以坐在河

边洗脸洗脚洗衣服,可以和一起去的同志们聊天。那时我们离开了紧张的工作,有一种悠闲的心情。那几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不是什行军,而是真正的秋游。

在那儿没有呆几天,备战警报解除了,我们就走回程路。整个行动恐怕只有一个星期左右。

48 09B 总支学习委员

我从渤海回到建屏,西柏坡不再只是中央工委的所在地,而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了。毛、周、任来到了这里,中央机关也纷纷设立,中宣部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中央机关人数不多,只成立了一个党的总支,没有成立党委。党总支书记是杨尚昆,组织委员是曾三,我和刘火担任了学习委员。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学马克思主义,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那时是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认为全国解放之后,我们的干部会很忙,因此要抓紧时间学习理论。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机关的人带头认真学习。因此总支的学习委员加到两个人。

学习的方法之一就是上大课。先开设“社会发展史”这一门,12本“干部必读”中就有这样一本苏联学者写的书。并且要求接着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我和王惠德都担任了上大课的任务。

这时西柏坡已经盖起了一个礼堂,以后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个礼堂召开的。不再是全国土地会议那样,在帐篷里开会的景象了。我们上大课就是在那个礼堂里。在开课之

前，少奇同志在这个礼堂里开了一个总支范围内的全体党员大会，专门讲党的支部工作该如何做。他在报告中特别提出，干部有必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机关总支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

总支分配给我上的课不少，而且第一堂就要我去讲。在上第一堂课时，我很紧张，因为朱德、董老都坐在下面听课。我觉得自己讲的实在不配他们来听，可是他们都认认真真地听着。第一堂课是这样，第二堂课也是这样。

同在西柏坡上这样的课相比，去南庄中央团校作《共产主义》报告，对我来说轻松多了。在南庄的一个大场上架起一块黑板，我在黑板前面讲，下面密密麻麻坐着许多团校的学员和老师。学员们比我年轻，我就不像见到朱总司令、董老坐在听众席上那么紧张了。因此我讲得很自然，也很生动。听众感觉到了我在讲课时是很愉快的，我也讲得使听众很愉快。在这次演讲后，团校的同学给我起了一个我实在不敢当的外号，说我是“共产主义的化身”。

在南庄这次演讲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块黑板和黑板前的我，但人很小，面目看不清楚，但是照片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坐在下面的听众。

48 09C 琐 事

我再写一篇 1948 年我在东柏坡中宣部工作时期，工作之外的记得起来的几件琐事。

第一件是，那时西柏坡每周都有晚会形式的文娱活动。晚会时每次都跳几场秧歌舞。我常常充当秧歌舞里的“伞头”，也就是第一领跳的人。这不是因为我跳得好，而是因为我胆大。有趣的是我在跳秧歌舞时发现，紧跟在我后面的常常是朱总司令。

第二件是，那时中央机关有不少集中到建屏来了。徐特立带了一个编教材的小组在东柏坡后面的陈家峪。我就常常去那里看徐老聊天。张凌光、程今吾、王骏超等都和徐老一起工作。原来在张家口的“工专”，那时也来了建屏，搬到了柏岭。那个地方离西柏坡比较远，不过它同东西柏坡一样是在滹沱河北岸，我也去过，走一趟来回就要四五个小时，可那时我是很能走的。柏岭在洪子店附近。洪子店在建屏是个大地方，柏岭就在它的南面，在滹沱河南，也不近。附近有一个村庄，设有一个化工研究所。在那儿我也有朋友，也去那里找到了那个研究所……总之在建屏我已有一些地方可以跑一跑。

第三件是，在北平《解放》报时，我认识了北平女附中的学生康琳，她后来也到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经常给我写信。她后来到了中央妇委工作。中央妇委也在东柏坡，就在我住的房子下面的一排房子。有一天我上到那里看到了她。到东柏坡她正在写信给我，人家告诉她中央宣传部就在东柏坡，于光远就住在妇委机关那排房子的上面，她上来了，叙了叙将近两年来彼此的情况，从这之后再也没有通信关系了。她喜欢做幼儿工作，不知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五) 1949 年

小 引

1949年在我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讲这一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不能不对这一年的党国大事作一番回顾，写当时的感受和后来的认识。这样就免不了引用当时的历史文件，这和讲故事的体裁，同这本书的其他文字有些不协调。好在这样的文字不会多。本来这本《编年故事》第四册，我打算写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写的过程中发现有些事情如果一刀切，似乎有头无尾，不如再延伸一些时间，把这些事情讲到底。甚至超出1949年的一些内容也写在这本《编年故事》第四册里。

49 01 迎接全国解放的一年

1949年在我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用的题目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献词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接着他写“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1946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

我国国家的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经过三年的战争，我们实行“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到了1949年初，毛泽东发表这篇新年献词的时候，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军事战线上胜利的同时，我们政治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此期间做新年献词的时候，毛泽东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在这期间，从《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看到《评战犯求和》、《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变为呼吁战争》、《国民党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国民党反动派搞政治斗争，我们就用政治斗争来对付他们。这时候，党中央已经来到西柏坡。我也已经从延安出来，做了一年多土改工作，到了中央宣传部。1949年的3月5日到13日，党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七大中央委员本来

就不多,这次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共只有五十几个人。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后,中央就从西柏坡迁往北平。那时候我也正在西柏坡,听说召开了这样的会议,而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时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中国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

49 02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后来我听到了二中全会毛泽东的报告和决议的传达,知道在报告当中除了讲军事问题之外,还讲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问题,讲了一个经济建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关于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我们任务的重要的论述。这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

在当时听传达的时候,我认为报告讲得很全面、很深刻,可以说全部接受了。不仅当时接受了,在1952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的1953年,他又要中宣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理论部分起草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我起草之后,这个稿子经毛泽东看过、改过,加上“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0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成为正式的文件。我在起草这个《提纲》的过程当中,还是按照二中全会的观点,只是更多地加以发挥。

可是经过多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建国后许多问题的根

源就在这个地方。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彻底地摆脱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特别是到了1988年，我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段历史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一本十来万字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书。在这本书的自序当中，我写了这么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我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我认为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即关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地区，乃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它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论》的这两个部分是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指出存在这两个部分的必要。”

我那本书一共分56个小节，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写的。那本书的正文的内容提要也是分56个小节。在第1节的提要中，我写了这么几行字：“我写这样一篇文章，不是为了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想整理一下自己对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段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史的认识，写出来给读者看看。”

在那本书的第19节，我写了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而且回顾了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它是为确定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后基本方针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的历史意义也早就为人们所高度评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报告。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这个报告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报告中对经济构成采取了这样一种叙述方式:首先是讲国营经济,着重指出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后,可以使人民共和国掌握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讲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构成时,把国营经济或国家经济放在首位是与以前所有文件完全一致的。接着就讲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文件把私人资本主义放在第二位,而且对私人资本主义所说的话与《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调子完全一样,没有作什么改变,即讲要承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指出应该允许对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与发展,对之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第三便是讲应该使个体经济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确认:“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些内容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又写进了关于基本矛盾的一段话。那就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段话上面的话是为了经济上广大的发展、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下面接着的话是:“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虽然这一段话看来似乎只是顺便提的,但其实是党中央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思想用一种使人很不注意的方式透露出去。这是一种宣传技巧。

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作为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在毛泽东最早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没有的。因此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和相应的决议),我认为包含了从《论联合政府》后退的因素。

这一节中在回顾 1948 年 9 月会议的时候,说这个“9 月会议”是张闻天所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送到中央之前召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张闻天的文集当中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提法。而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张闻天说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是在 1948 年 10 月,也就是“9 月会议”之后,东北局报告送到中央时,刘少奇增写进去的。在龚育之的那本书中讲,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对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上升到国内基本的、主要的矛盾的地位问题作了发言。这次政治局会

议指出：现在点明了这个问题，对这点可作宣传。按照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惯例，基本矛盾的重新确定意味着党的基本路线的重新确定，准备先在党内，后在党外进行宣传，使这一路线为党内外所理解、所接受。从这一点来看，这样的决定当然不能不带有严重的性质。但是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8年10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上却一字未提有关主要矛盾的问题。

我接着写：“9月政治局会议是一个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的会议。对新社会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的确定是为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的一个中心问题。”把这两个会议的情况联系起来看，表明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我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分析，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向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靠拢。

在我那本书的第22节，又讲了这么一个意思：“尽管明确了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党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政策还是很慎重的，是讲究步骤的，在解决当前问题时是从实际存在着的情况出发的。”

在这一节当中，我特别讲了刘少奇1949年4月天津之行。“刘少奇从1949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在天津调查了十七个问题，把所遇到的问题归纳为资本主义工业与原料供应者（主要是农民）之间、资本主义商业与消费者之间、工业投资与商业投资之间这样几对矛盾，注意到了资本家的顾虑和干部职工中的‘左’倾情绪。于是他就针对天津工作中的实

际问题和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天津作了多次讲话。讲话的精神就是宣传《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说明党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当然存在劳动者的事实。他要资本家解除因为剥削行为怕挨斗的顾虑,同时讲清楚道理来纠正干部和职工中的‘左’的思想。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对于转变天津的工作很快起了成效。5月7日,他派随自己前去的王光美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立即明确肯定了刘少奇的工作。中央秘书处也迅速把天津的讲话转发给各中央局。”

解放初期,我带的研究生有一个叫张凯,我要他研究党史问题。他就对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作了大量研究。很可惜,有一次在澳门他心脏病发作,身边没有人,死在浴室里。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散失了。

在第22节末,我还作了这么一个总结:“今天我们重温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到党中央领导层的一种矛盾:在接触到某些实际问题时,在对国内外公众说明党的路线政策时,就觉得原先讲过的那些‘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是对的,是应该实行的。但同时接受了(列宁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又认为应该把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放在要采取步骤逐步去消灭的地位,从根本上说这是矛盾的。可是党中央领导层不感觉到这种矛盾,使之保存了下来。”

前面所讲的都还是1949年的事情,可从以后的发展势头来说,我们离开《论联合政府》的纲领越来越远的萌芽起于七

届二中全会，则很清楚了。

附：为了便于大家研究七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我们就把毛泽东报告中的有关段落附在这里。他在这个报告中指出：

……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接着作进一步的分析，讲了六点：

第一点是：“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点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点是：“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点是：“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

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这四点的精神是反对右倾和反对“左”倾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五点又讲了另外一个方面。第五点的内容是：“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趋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点是：“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提到新民主主义的话,在第四节有一处,使用的语言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在第五节当中出现两处,一处用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一处用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而第六点特别重要,它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国内和对外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的问题。

49 03 在“劳动大学”的时候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在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一)到北京去

两年多前的1946年,当我们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驱逐出北平的时候,我说,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这个故都来,再回来时我们就是这儿的主人了。现在果真要这样地回去了。

11年的农村生活就这样地结束了。11年的农村生活使我爱上了农村,但是我更爱全国人民的辉煌胜利。

我没有记住离开东柏坡的准确日期。推算一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3月间在西柏坡闭幕的,那时我还在东柏坡。搬家还要作许多必要的准备,算起来中宣部离开建屏去北京的时间应该是4月份的事了。1949年第一季度,我的工作和生活与1948年最后几个月没有什么变化,也不容易分得清楚,因此1949年的故事我就从离开东柏坡说起吧。

我们是坐汽车去北平的,文件等由专人负责运送。我们工作人员坐了两辆卡车,只带随身铺盖和自己用的东西。车走的路线是:行唐—曲阳—唐县—涞源—紫荆关—北京。路上走了三天,边走边看一路上的好风光。遇到著名的名胜古迹就停下来游览。这一带最著名的要数曲阳城里的北岳庙,那是北魏时修建的。我没有想到在一个县城里有规模这么大、建筑艺术水准这么高的庙。同它一比,路上看到的其他名胜就相形见绌,没留下什么回忆了。

出发前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平的香山(说北京也可以,我说不清楚北平再改称北京的准确日期。这个城市解放之后举行了一次入城式,这是聂荣臻同志建议的。我记得他的建议还得到毛泽东的称赞。很可能是在那一次北平改称北京的)。我们的汽车到了北平境内,没有进城,就直接开到了香山。香山是北京有名的名胜,香山红叶谁都知道。我以前也多次游览过这个地方,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我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临时的,但是当时不知道会

住多久。

那时，党中央已经搬进了中南海。还有不少领导人如周恩来等就在城里工作。可是毛泽东在香山，住在半山腰上的双清别墅。从山下到双清有一条石头小路，可以勉强走小汽车。这个地方离分配给我们中宣部的地方很近，但是大家没有到那里去闲逛。因为那儿有警卫，去那里闲逛就会受到警卫的盘问。

党中央也有好几个机构在香山。新华社就在今天香山饭店的那个地方。原先那是一排排的平房旅社，也不叫香山饭店，但是是营业的，游客可以在那里住。当然新华社搬到那儿办公以后就不营业了。新华社搬离之后，那儿又营业了很长一个时期，才拆掉盖了现在的那个现代化的建筑物。

中宣部的驻地就在香山的附近，在香山一共有三处办公场所。一处是在香山饭店门口，抬头就可以看到山上路旁的小白楼。那时我兼任主任的中央图书馆占用着这座两层楼的建筑物。另外两处都是平房。一处是在山下的一条小沟里，根据地形盖了上下几个层次的平房，有点别墅的味道。王惠德和刘敏住在上面的小平房，我住在下面。下面还有一大间房，可以用作办公室。还有一处是在一个比较开阔的两个山丘上，各盖了两排很普通的平房。那就什么风景都算不上了，但在那儿有一个亭子点缀了一下。

那时香山住了许多人，并且不再允许游人进出。党中央机关在西柏坡、东柏坡的时候有个“工校”的代号。到香山后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劳动大学”。“劳动大学”这个代号只是

对周围的老百姓用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用。香山附近的老百姓就很奇怪，这所大学为什么看不见学生，却只见到来来往往的汽车，还有这么多的军人警卫？

(二) 出版了三本书

中宣部的部长陆定一在建屏的时候，从来不到东柏坡来。到北平时来，也不与东柏坡的同志们一块走。他和他的秘书朱振岳是从西柏坡出发，直接到了北平城里。我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他也从来不问从东柏坡来的中宣部的工作人员都在干些什么。在我们记忆中，他也没有到过香山。而他在城里都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想过要了解一下。我们在香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按理说那时我们做什么工作还是应该会请示一下部长的，但是究竟请示过没有，怎么请示，怎么答复的，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想是没有去请示过。事情就有这么点特别。回想起来，大概是丁华同志，他是中宣部的秘书长，曾到香山来同我们联系。

按我的回忆来说，我们似乎是很自由的，在那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安然自得地工作。

在那里，我主要的工作是继续进行在东柏坡时交代给我的写政治课教材的任务。我在东柏坡时写了一本《调查研究》，那是作为中学政治课教材来写的。它同那本《共产主义》是姊妹篇，一本讲理论，一本讲方法。这是很好的主意。那本《共产主义》受过批评后搁下来了。这本《调查研究》在东柏坡写完，带到了香山。到了香山我就把这本书交了上去，胡绳看过之后，正式出版了。此时胡绳似乎在出版总署工作。

这本书是在建国前 1949 年 8 月出版的,没有出版社,仅仅是新华书店发行。这是解放后我出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在中学没有作为政治课教材普遍使用。据说是中学找不到能教这本书的教员。后来它作为一般的青年读物,在 1951 年 5 月由人民出版社改名为《怎样进行调查研究》再版了一次。在“文革”后,得到刘世定、马戎两位的帮助,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在 1981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书名,又再版了一次。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和王惠德合著了一本《中国革命读本》,也是在 1949 年 8 月由新华书店发行,后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两篇,共 14 章,文字不长,不到 6 万字。但这本书印量很大,一次一次的印刷,总量总有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这说明那时对这样的书是非常需要的。这也是我与王惠德合作写的第一本书。

第三本书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香山我开始校阅自己在延安时翻译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译稿。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校对好一部分,就用书的形式分册出版,这是最先出版的一本。它在 1949 年 6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了出版这三本书外,我还为《中国青年》写稿,一下子写了七篇。还是在香山的时候,记不起哪个机关寄来一张“中国著名文化人登记表”要我填写。这让我觉得有点滑稽,就声称我是讹传的中国著名文化人,没有去填那样的表。

(三) 图书馆和资料室

中央宣传部在香山都有些什么人,我记不全了。部长在城里,他身边总有几个人,其中要有人同香山联系。在香山做行政工作的也有一摊子人,这些我都记不起来了。

在香山多了几个原先不在东柏坡的人,一个是程今吾,后来做了中宣部教育处的处长;一个是王骏超,后来是中宣部的办公室主任。程今吾的夫人谢永,后来调到我们的科学处工作。他们在建屏时,是跟着徐特立住在东柏坡后面的陈家峪的。进城到北平后,徐特立带的那些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有程今吾、王骏超两个人到了香山。

业务干部中张仲实不见了,也进了城。我只知道张仲实还搞教育方面的工作,可是没有去问他们,我只是同王惠德在一起。

在香山,我兼任的中共中央图书馆的人员扩大了。除了原先的刘敏、于佩秋、高新华、王贤这些人之外,又调来了朱福荣、谭以明夫妇。朱福荣是朱穆之的哥哥,原先在山西的图书馆工作,他们对图书馆工作是有经验的。后来他们也一直做图书馆工作。这时还调来了马志光,他也是做过这方面工作的。

另外在香山又成立了一个中宣部资料室,调来了一批青年:马家驹、石舫、洪端、席昕、赵朴珊、薄瀚培、姜毓仁、侯德鹏……还有在资料室呆得不长,后来帮助周扬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其中一部分的谢素台和另一个高戈。我和王惠德对资料室工作的看法是以培养青年为主,而且常和他们聊天。

王惠德在图书馆和资料室都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他对这两个机构里的青年很熟悉,特别是资料室的办公室,就在王惠德住的地方的下面,走几步就到了。因此王惠德实际上也起着资料室负责人的作用。我和王惠德,加上图书馆和资料室是香山中宣部这一摊子的主要部分。

49 04 上海探亲

在建国之前 1949 年的夏天,我抽空回上海探视分别了 11 年半的父母和弟妹。

促成这次活动的是我母亲的干儿子沈涵——当时他是上海总工会的副主席。他因公出差到北京找到了我,说我可以同他一起回上海。

我的家早就不在我离开上海时的顾家弄,搬了几次家,我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那时我工作也并不特别忙,就下了个决心,向组织请了假同沈涵一起坐车去了上海。

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也是做工会工作的,也是上海人。她的名字我记得很牢,是史枚美,我想她在家里的名字一定是叫史妹妹,现在的名字是同音字。

回去时坐的是现在说的硬座。那时去上海的火车走得很慢。我当时还年轻,只有 34 岁,但也感到相当辛苦。好在有沈、史同行,一路上同两人聊天,还不寂寞。不过火车走得实在慢,第一夜我忽然想起,北京有一个同志要我带个充气的褥子给他上海的家人。于是我把它吹足了气,垫在身下,果然舒

服了许多。

火车走得很慢，过了两夜才到南京。第三天从南京开出到镇江，说是前面铁路被美国飞机炸坏了，不能前进。那时上海刚解放，美军还配合国民党出动飞机骚扰。南京和镇江之间的铁路距离是很近的，火车到镇江是中午，既然不能前进，干脆下火车到镇江的金山寺游览。一直玩到傍晚回火车上过夜，幸亏第二天说是铁路修好了，到上海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

到上海沈涵带我去了哈同路慈厚里，见到了父亲、母亲和弟妹。我的五妹和七弟本来并不在上海，他们已经从沈涵那里知道我就要回来，是从外地赶了回来的。在上海照了一张合家欢，父母和兄弟姊妹七个人都全了。慈厚里在哈同花园的旁边，有一大片质量不高的出租屋。现在统统拆掉了。乔石当时是我弟弟的党小组长，也住在慈厚里。

不过，慈厚里的家里只有一间房子，实在容不下我。我就找到上海团市委的李昌和冯兰瑞那里。那是在上海法租界的古拔路，“古拔”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名字，解放后当然把这个路名改掉了，现在改为什么路就说不好了。也很巧，上海团市委所在地，正是我在上海做家庭教师的唐家的旁边。

我去上海当然是探亲，但是也想了解一下这个 11 年内一直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刚刚获得解放的上海。我住在上海团市委的那些天，还是了解到不少情况的。

这次回上海，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下子，我打听到我在初中时候的那个哲学朋友雷天觉。他在美国留学多年，回国后，

在上海的什么政府机关当总工程师。我特意去找他，两个人又重新谈起哲学问题。我早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了。从谈话中知道，他还是年轻时候的那一套。这次见面，他给了我一本关于“假心理学”的资料，这是 20 世纪伪科学的典型作品。这种伪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用 27 张特制的扑克牌，把它们扣起来，让在不同心理状态的同一个人去“看”，然后，分析在不同心理状态下“看”对的情况。做了许许多多的统计表，画了许许多多的示意图，证明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看”对的子函数关系。后来，在 70 年代那些搞“特异功能”的人，所做的那些欺骗，他们也就利用雷天觉告诉我的这种方法。我心里特别明白。这也是我那次回上海回家探亲的一大收获。

49 05 人民政协的召开和胡乔木要我做的工作

这一节分两部分写。本来我只打算说说胡乔木要我参加一些有关筹备举行人民政协会议的事情。转念一想，还是应该把召开人民政协的由来和召开这个会议时存在的问题简单地讲一下。现在人们都知道有个政协，但是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觉得讲讲是有好处的。

1945 年 8 月底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有关《会议纪要》，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这个会议 1946 年 1 月 10 日在重庆举行。1948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我们又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并且在党的九月会议明确指

出“准备在 1949 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前面我写二中全会的那一节，有意不讲关于人民政协的事。因为我想马上还要写这一节。

在 1949 年举行的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一个日程表：“我们希望四月或者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1949 年 6 月 15 日至 19 日召开政协会议的筹备会，那时用的名称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为了区别于 1946 年在重庆举行的那个会议，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举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参与的为会议的召开做一些具体工作的时间，可能就在 9 月上旬，那时我们中宣部机关还在大红罗厂。

这时候，有一件工作是胡乔木而不是陆定一找我做的，那就是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因而需要成立若干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胡乔木要我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做成立这些团体的工作。1940 和 1941 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了一年多，这时候胡乔木是宣传部部长。以后胡乔木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他找我，我就去了。

去前胡乔木和我谈了一次话，告诉我这次要成立的团体有新哲学学会、新经济学会、新历史学会、新政治学会。成立这些学会的地点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西侧的一座大楼里。这

座大楼后来被拆除了,在这座大楼和另外一些被拆除的建筑物的地基上,盖起了北京饭店新楼。胡对我说,要成立的新政治学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组织,而是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国民党党员中,以王昆仑为代表的“小民革”。因为民主党派中已经有了“民革”,不好再安排另一国民党派系,因而只好成立这个新政治学会,好让王昆仑有出席新政协会的资格。胡乔木又说,陈伯达是新经济学会会长。后来陈伯达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在这个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做了这个工作。这个政协会议开幕之后就没有我的事了。

下面写我以后了解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和会后的一些情况。

先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员名单。在我得到与会人员名单后,注意到胡乔木告诉我的、我按照他的要求去成立的新政治学会没有算数。王昆仑他们又成立一个“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党派、区域、军队、团体和特别邀请人士五类。列入党派名单的有14个,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民主党派的情况大体上同那时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列入当时党派名单的,有些不存在了,如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

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有的则不被列入了，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且它的名字也改了，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了。无党派人士同特别邀请人士是两回事，无党派人士是郭沫若、马寅初、李达、张奚若、吴有训这些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人，而特别邀请人士是宋庆龄领衔的许许多多人士。这五类之外，还有一张参加主席团的名单，共 88 人。主席团的秘书长是林伯渠。

我当然特别关心团体代表，而且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胡乔木要我去帮助成立的那些学会还是代表的基础，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用的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其中领衔的是陈伯达，一共 15 人，他们是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钱俊瑞、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还有两个候补代表李木庵和胡绳。

我还关心陆定一和胡乔木是什么代表，清楚了陆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胡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领衔代表。

再说会议开幕式。开幕式上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有一个讲话。现在是三个多月之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说“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经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

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下召开的”。这是讲会议的缘起。接着他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讲了这个会议的议程:“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一样的年号。”在这个开幕词中毛泽东讲了这么一句:“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而这话也是在10天后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

毛泽东这个讲话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题目收进《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一个议事日程,是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文件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我们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宪法。

在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第三章“全体会议”中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下: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存在三个问题，是我今天觉得应该很好地思考研究的。

第一个问题是无保留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苏维埃。这是列宁主张的建国原则。它不同于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基本精神是对政府的行为予以约束。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有立法、选举、提出决议案的职权。而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就没有提出决议案的权力，而只有提出建议案的权力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既然无保留地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就没有要监督政府的条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条文中规定的对政府施加的行为,都是正面的建议性的而不是批评性的。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还完全没有提到立宪行宪的事情。既没有说它和共同纲领等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也没有说不起那样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第三个问题。

接着来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序言”后共7章60条。7章的题目是“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总纲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是总纲的11条。第二章政权机关的提法,是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包括我提出的几个问题,完全一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一个特色是在第四章“经济政策”之中,指出存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个社会有怎样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形式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没有在组织法里写,可是在共同纲领里写了。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共同纲领中不使用经济“制度”这样很适当的语言,而在纲领中讲经济“政策”时写,而且不是郑重其事地写——在第一章“总纲”和第四章都这么做。

比如在第四章中讲到五种经济时,是在这么一段话里面

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写到这里才接着出现“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连主词都不是，写在这里似乎是陪衬性质。

1988年我写《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时没有重视这一点。书中对《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倒是比较注意的。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比方在那本书里我写到在宪法未制定前，这个《共同纲领》是带有宪法性质的。这话不错，但是准确地说《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组织法》也带宪法性质。

在这本书里对一个共同纲领我写了两节。我写道：“新中国的成立，使历史是否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概念发展，成了现实的问题。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作结论的时期。”接着我从1949年9月21日起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26日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行了论述。

关于这个《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是9月26日通过共同纲领的那次全体会议上由周恩来做的。周恩来概述起草经过说，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草案初稿，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五六百位代表的分组讨论，又经过一层一层讨论修改，提交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

通过。再作若干修改,最后提交那次会议通过。在通过的纲领的第一章“总纲”中有关社会制度的条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对于这一条,周恩来的报告中作了这样一个说明: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在《共同纲领》的第四章“经济政策”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

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确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它允许资本主义的经济存在,但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前途。虽然整个《共同纲领》中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字样,但按照《共同纲领》去做,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周恩来报告的讲法也非常之好,的确要通过实践来使得广大人民承认社会主义的前途,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

可惜没隔几年,就没有按照《共同纲领》所要求的那样去做。

而在建国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按照《共同纲领》中所要求的那样去做的。我们不妨把这时的情况,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一番比较。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经过 29 年的奋斗,到 1949 年全国解放时,全中国的新社会,已经不再是理论上探讨和预见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了。而到了今天(1988 年),它则又成了可以用 40 年后的眼光来考察的历史事实了。那么,这个成为事实的全国胜利后的新社会,同原先写在纸上的那个新社会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

从政治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要求成立的。比方说,(1)从程序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中国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来筹办的。在中国人民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报告》,对“新政治协商会议发起经

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经过”、“三个月来筹备工作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的决定的经过”讲得很清楚,通过他的介绍,使人们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很讲民主,而且工作是很周到的。(2)从自己宣布执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这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参加者来说,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从这个名单看,既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精神,又注意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问题。(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草案也是由大多数非党员以及少数党员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并多方征询意见,一再修改后,在筹委会通过的。(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届政府是按照《论联合政府》上所写的那样建立起来的,等等。

从经济上看,政府的工作就是按照《共同纲领》的“总纲”和“经济政策”来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没收官僚资本。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是注意保护的,并作了大量宣传,以解除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发展经济的顾虑。老解放区的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很快地就推行到全国。原先已经在老解放区里开展的土地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继续在全国更多的地区推开。

总之,我认为用不着费什么心思就可以看出,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的新社会的情况同《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论述的可以说惊人的一致,几乎一切都是

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实现了。

最近我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北声写的一篇题为《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文章内容虽然大大超出我这本《编年故事》中1949年的范围，但是我还是想用附记形式对这篇文章做一点摘录，将这篇文章的某些内容向读者介绍。

附 记

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讲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随后在刘少奇与斯大林会面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尽快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而在刘到了苏联以后，于10月26日、29日、30日先后三次打电报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在此之前，中共原来是打算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再着手制宪的，但是斯大林既然这么说了，于是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随即是一连串快节奏的“落实”动作，先是在第一时间内由中共中央做出尽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宪的决定，并由主持政协的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公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接着，在1953年1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决议，决定当年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会议成立了两个委

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选举法就被制定出来并获得通过。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制宪进程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顿，直到1953年的下半年才又重新启动，不过这次却进入了“快车道”。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从1953年的下半年到1954年的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范围的异常繁难的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基层选举工作全部完成。相对而言，宪法的起草工作起步则要晚些，1953年底毛泽东率一千秀才组成的起草小组到杭州，算是启动工作，1954年1月才真正开始动手。宪法的起草虽然起步迟，但进度却惊人的快。按毛泽东的计划，1月9日开始起草工作，1月31日就完成初稿，中间经过几次复议之后，到5月1日就可以将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了。实际进度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是宪法草案的大讨论被分成了两步，3月底先由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6月上旬才交由全国人民讨论。据说在3个月的人民宪法大讨论中，有近1亿5000万人参加，到了这个地步，制宪过程已经有几分像一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讨论过后，1954年9月15日，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直主持选举工作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至此，新中国的首次制宪过程全部完成。

存在着明显的疑问：一、斯大林催促中国制宪的真实理由究竟为何？苏联及东欧国家都有宪法，但西方国家依然不认为这些国家的当局具有民选的合法性；至于制宪有助于开展建设事业，此说则更加牵强。二、既然其时制宪并非中共之所愿，为什么斯大林一提议中共就马上闻风而动？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宪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让国家走向法制化吗？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制宪以后中国并未着手制定与宪法配套的法律，以至于到 70 年代末中国能够应用的正式法律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萧北声教授对斯大林积极主张中国制宪建议之谜做了这样的分析：新中国筹建之初，成立了“新政协”，制定了作为多党合作制基础的《共同纲领》。在许多民主人士中，在那些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还不了解的人们当中，《共同纲领》有如一颗定心丸，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类似宪法的作用。而“新政协”作为一种多党派政治协商的形式，更是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所以，相当一部分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对制宪和建立欲取代“政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可能有多少热情和兴趣。中共那时虽然将新中国的政体确定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声明“政协”只是一种过渡，但当时中共并没有马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宪的意愿。1952 年 10 月 20 日，刘少奇就制宪问题给斯大林的“请示”信中明确表示：“因为人民政协在全国有很好的威信，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召开人

民政协,而不积极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选举的准备工作也还有些不够,因此,我们考虑在明年春夏之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到三年以后去召开。”显然,中共考虑到民主人士的情绪,对采用一种新的体制取代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政治协商”体制,从心理到制度上准备都不足,所以才会有如此打算。

至于推迟制宪,其原因除了《共同纲领》比较合中共之意外,更多的是顾及到某种将来可能出现的法理逻辑上出格。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刘少奇说:中共认为,“在当前过渡时期即以共同纲领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在目前要制定宪法,其绝大部分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还是要重复共同纲领,现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把条文的形式及共同纲领的名称加以改变而已。因此,我们在当前过渡时期是否可以暂时不制定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共同纲领则可以在历次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修改补充,待中国目前阶级关系有了基本的改变以后,即中国在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再来制定宪法,而那时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制定一个社会主义的宪法。”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成熟的国家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按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该存在资产阶级的;若立即制宪,就不得不将中国既存的承认资本家、富农的存在与保护私有财产的现实,以宪法的形式确

定下来(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刘少奇在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中比较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在今后两三年内制定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但是再过七八年以后,我们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似乎是有些不好。”

萧北声认为建国之始,新中国选择的确是一种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英协商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不仅有“政协”这种议政平台,而且还有各类精英直接参政的各级政府,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集聚到共产党周围,非常有效地为共产党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提供了知识甚至政策性建议,符合当时中共治国的需要。毋庸讳言,中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缺乏统治经验,也缺乏各种专业人才,在面对国家治理和建设事业难局的初创时刻,团结精英共同治国的谋略至关重要。虽然在制宪之前的中国政府其实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政府,但政府中民主人士的比例确实相当高:全国政协5个副主席中有4人是民主人士;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民主人士占3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中民主人士达28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里民主人士占2人;在各部部长中民主人士居然占了20位,达三分之二,连最高法院院长也是民主人士沈钧儒。中央政府如此,地方各级政府也存在类似情况。应该说,在制宪之前,这种“政治协商”体制还确实不是

“共产党请客吃饭”，民主人士的确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国家管理，这种参与不仅有技术层面的，也有政策层面的。虽然随着共产党人的治理经验逐渐增加，最初表现的“谦虚谨慎”在逐渐减退，共产党与民主人士合作中的摩擦也日渐其多，而“镇反”、“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改造”诸运动也给多党派合作蒙上了某种让民主人士担心的暧昧色彩，但至少在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向斯大林请示制宪问题时，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还基本上处于“蜜月期”。不仅多数民主人士极力配合，尽量向共产党靠拢，即使在令他们颇为难堪的各种“运动”和“改造”中也保持了这种让共产党颇为放心的姿态；就连共产党自己对这种合作的局面也算基本满意。这里不仅有双方情感的融洽，更有现实相互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才是刘少奇反复向斯大林强调中国不急于制宪的真正理由。

既然如此，中共为何最终又听从了斯大林的建议，提前召开人大制宪呢？萧北声教授也有看法，他说从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后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共提出的主要意见，是“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

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斯大林还有一个使中共很听得进去的意见,那就是在通过选举实现一党政府转换时,“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你们更好”。

萧北声教授认为真正打动了毛泽东、让中共痛快地改弦更张仓促制宪的,还是斯大林所谈的最后一点,这的确是最具有诱惑力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妙就妙在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一党政府;而变成一党政府之后再“给其他党派以恩惠”,如此既可将民主人士从权力结构中基本排除,把他们变成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又令他们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这样的巧妙安排出于苏共操纵建立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的经验。斯大林为中国设计的这种体制转换,多少有点搔到了中共的痒处。对中共而言,建国初期之所以建构有点类似于联合政府的精英协商体制,虽不能说全属权宜之计,但决非长久属意的制度安排;然而,如何从联合政府转向一党政权,则尚待筹谋,一时无计。如今既有斯大林的耳提面命,中共自然乐从,于是便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时间表着手筹备“选举”和制宪。而斯大林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中国的政府体制实现苏联化,即向一党政府转换。

49 06 成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这也是胡乔木布置给我的一件工作。在抗战前大概就有一个“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抗战前后我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青年工作，没有听说有这样的学术机构。一直到胡乔木为人民政协的召开要我帮助成立若干社会科学团体的时候，也没有向我提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情。一直到胡乔木要我去成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我才接触到一点有关这个“中央研究院”的事情，因为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原先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改造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在旧中国没有中国科学院，我们胜利以后，蒋介石跑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也跟着去了。这时候，中国科学院已经在筹备了。原来中央研究院中也有一个机构叫做“社会研究所”，这时候，胡乔木找到了我，要我去这个社会研究所。把这个研究所改造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而且，胡乔木说：狄超白可以担任所长。

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是陶孟和。那次我没有和陶见面。陶孟和是人民政协的特别邀请人士，并且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当时他很忙，没有时间同我见面。我也不希望同他见面。我要做的工作，是要他离开自己的原来管的单位。我们见面多少会有些尴尬，而且也没有必要请他去。

也是在这次才知道这个中央研究院实行院士制度。陶孟

和本人就是一个院士。不过我去研究所,只解决改变名称和业务范围,与实行不实行院士制度毫不相关。这次我写《编年故事》的时候,倒想把自己后来了解到的有关中央研究院和它实行的院士制度写一点。

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个研究院的任何文字资料,不了解它创办的历史,也不了解它的章程,也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政治背景和人事关系、院士名单。只知道胡适是它的院士,似乎还是它的院长,还知道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钱端升、陈垣、陈寅恪、梁思成、杨树达、陶孟和这些建国后留在大陆的学者。我反倒不知道郭沫若也是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自己没有提起过,别人也没有说起。这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我就更不熟悉了。不过,我注意到参加这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以及相关方面的代表中有一些人是全国有名的,如梁希、李四光、侯德榜、茅以升、曾绍伦、严济慈,竺可桢、叶企孙、吴有训,其中有几个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关于狄超白,我想多说几句。我同他共事多年,一直到孙冶方接替他当经济研究所所长为止。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应印度、缅甸政府的邀请,派文化代表团赴印缅访问。狄超白是代表团成员之一。1952年4月去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狄超白也是成员之一。1954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

陶孟和后来被安排担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

当时我虽然做的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可是以后我作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负责人,同中国科学院有比较密切的联系。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任。

最近,我看到山西《黄河》杂志副总编辑谢泳的《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出来的81个院士中28个人文方面院士的名单,我可以确认某些人是不是院士,其中一些内容我是知道的;有的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也有很少几个我没有把握。这篇文章对我写中央研究院有用。至于写大陆的事情作者虽然查阅了一些文献,但是对某些重要事情与真实情况不符,有些判断不当。我打算另写文章。

现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到2003年8月底,活着的只剩五个人了。他们是:陈翰笙,107岁7个月差一周;薛暮桥,将近100岁;骆耕谟,94岁多,我在半年前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小会上、不久前在北京医院门诊遇见过他;季羨林,92岁左右;还有我自己,88岁生日也过了。而且在建立学部时我作为中宣部代表参与其事。我有责任提供真实情况和作出恰当说明。

49 07 1949年的《学习》

年轻同志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建国初期有一个《学习》杂志。可是在四十几年前,这本杂志拥有的读者可真不少哩。

这本杂志创刊号是在建国前的1949年9月发行的。它

是一本学习马列主义的月刊。这个刊物的发起我没有参加。第一期上也没有我的文章。第一期有艾思奇写的《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有沈志远的《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有胡绳的《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有郭大力的《谈〈从猿到人〉》，王亚南的《列宁的〈论国家〉》，还有周建人、何其芳等人的文章。这些同志后来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当时应该说是颇有权威的。

不知道是谁提出的，从第二期开始就要我担任这本刊物的总编辑。编辑部是现成的，林澜青、张先畴都是有经验的编辑。第一期写文章的作者也还继续为这个刊物写稿。稿子也有若干现成的，因此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并不那么吃力。第二期是1949年10月15日出版，这已经开国大典之后了。在这一期上发表了胡绳写的《学习全国人民的大宪章》，是号召大家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沈志远的《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柯伯年的《新民主主义的外资政策》、陈翰伯的《谈时事学习》，这些都是联系实际的文章。这一期还有艾思奇的《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非历史观点》、王亚南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名著题解）。

我自己是从第三期开始给自己的刊物写文章的。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问题商讨”这个栏目中，用“君麟”这个笔名回答一个读者提出的问题：“共同纲领是否等于宪法？”在这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艾思奇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王学文的《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狄超白的《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经济》等。

第四期刊物上登载了钱俊瑞、邵荃麟、裴文中等人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期上我才用“于光远”这个名字发表了《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采用的一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差不多还只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为了认识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特点，从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必须学习广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法则进行研究”。我认为一般的读者在当时“学习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本时，要尽可能联系今天与中国的实际，而适合中国需要的，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有系统的研究，则是有素养的经济学家们的光荣的任务”。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我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学习》第三期和第四期发行的时间是1949年11月和12月15日，都在1949年内。第五期就到1950年了。

《学习》一创刊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很快脱销。因此第一期到年底再版四次，第二期上海印的是第七版。1950年后，根据需要一次印足，就不再一次又一次地重印了。

第三期增加了北京发行印量，同时上海的需要量也很大，因此五天以后，在上海印出初版。后来考虑两地印刷不方便，就完全在北京印刷了。

49 08 大红罗厂

大红罗厂是西四北路东的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一头在西

四北大街，一头在颇为有名的毛家湾。现在还有，不过原来比较窄，这些年扩建成一条大街了。

中宣部机关从香山搬进城，工作人员就在这条胡同的两个院子居住和办公。一个院子在路南，一个院子在路北。王惠德、我、图书馆和资料室在路南，以曹葆华为首的编译处在路北。我们的院子人多，院子也大，路北那个院子人少，院子也比较小。

曹葆华的那个机构原来不在香山，从何处并入中宣部我不知道。在那儿工作的有谢宁、潘培新等，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那时也在编译处工作，住在大红罗厂。

曹葆华是我的清华校友，比我高五个年级。我进清华时，他在清华中文系当研究生。我有时走过他的教室，看见他的老师给他上课，常是一个老师只教他一个学生。他是学文学的，喜欢写诗，是“新月派”的诗人。后来到了延安改行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他对理论不在行，但是很努力。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他翻译的。在延安，因为他在清华的班次仅次于朱理治（他是二级的）一年，因此朱是延安清华校友会会长，曹是副会长，我们在延安就相熟。这次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希望有人帮我校阅我翻译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译文。对恩格斯的这本原著，还有些文章，我考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译完，因此在大红罗厂时，同曹葆华进行了一些研究，希望他能参加这个工作。他说谢宁也可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于是，完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工作这件事就在大红

罗厂定下来了。我们国家第一本可以看得下去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中译本，是曹葆华、谢宁和同我合作的，后来在1955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在大红罗厂的时候，陆定一部长和丁华秘书长在大院胡同办公。大红罗厂在西四牌楼的北面，离西四牌楼很近，只有短短的一站路。大院胡同在西四牌楼的南面，也只有短短的一站路。大院胡同这个地方原先郭沫若住过，后来就让给陆定一住。陆定一部长仍旧没有来过大红罗厂。不过从大院胡同到大红罗厂是很近的，有问题解决起来就比我们在香山方便得多。

在大红罗厂我做的工作还是在香山时做的那些。有些如编写中学政治课教材的工作，还是我在东柏坡接受的任务。到大红罗厂后，我和王惠德还为此到北京市两个中学去开座谈会，可是这个工作并没有做下去，没有写出更多的中学教材，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干部教育上了。我们搬出大红罗厂的时间，据我推算是在1949年底或者还晚一点，因为开国大典时，我们是从大红罗厂出发去天安门的。同时我接手《学习》杂志总编辑的职务时，也是在大红罗厂。

在大红罗厂，我工作了大概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49 09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那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

就在天安门广场,北京学生在1919年5月4日、1926年3月18日、1935年12月9日悲壮地举行爱国民主的游行示威。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对于中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五四时,我才四岁。“三一八”时我在上海,而且年纪也还小。“一二·九”那天我们的队伍在西直门外受阻,进不了城,因此没有能到天安门前。而1949年的10月1日我有幸坐在天安门前,参加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

记不清楚是1988年底,还是1989年初,我去深圳,当时“锦绣中华”尚在建设中。我见到那里只有天安门城楼的缩微,就向他们建议加上城楼前的广场。我主张按照开国大典时的广场来建造。我对他们说,加上广场才是完整的天安门。回京后我还从侯仁之教授那里要到了广场的图纸,寄给了他们。不知为什么,“锦绣中华”以后还是没有加上广场。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同现在人们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不一样,它比现在小得多。广场东西各有一个“三座门”,南池子和南长街都在三座门外。广场南面现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上,原来是一座“中华门”。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原址,有建筑物,也有街道,没有留出今天这么大的空间给广场。广场的地面是用一块一块比较小的,但是比较方正的石板砌的。

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群众大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等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这次庄严的开国大典。毛

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是那天讲的。

除了参加群众大会的人之外，也还有观礼的人，还有很多的中外新闻记者。

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观礼台，只临时搭了一个小小的台子，那是便于记者照相使用的。李慎之那天就在这个台上。

我们中宣部从大红罗厂去的人，算是观礼的人。由于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观礼台，因此，除了上天安门城楼的人之外，其他的人不分级别，就只有坐在靠近天安门城楼的广场的石头地面上。那天，我就坐在金水桥西，中山公园东边一点，比较靠前，也就是靠北的位置上。我之所以坐在这样好的位置，那是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央机关——中央宣传部，是党中央的机构，受特别优待坐在最前面的几排。即便如此，天安门毕竟太高了，上面有些什么活动，我们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楚，然而大家的情绪是强烈的，别人这样，我也这样。

盼望了很久，为之奋斗了很久的这样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过去人民群众、爱国青年到天安门都是去向反动政府示威的。那时革命者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更多民众的觉悟。现在天安门广场是我们自己的了，城楼上站着的是我们革命的领导人和拥护共产党的中国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今天，在这里我们就要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新中国的成立，这样的振奋的心情，一生能有几次？

城楼上的景象在电视上播放过许多次，我没有更多的回忆。我坐在天安门城楼下，感慨万千。我一边观看和听城楼

上的活动和讲话,一边想中国人民五四以来 30 年的奋斗历程,也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 15 年的经历。我参加革命时,以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那么强大,而我们的革命力量相对地弱得多。我虽然坚信中国人民革命必将胜利,但是时间会很长。我不认为自己能够看到全国胜利之日。在 15 年后它成为摆在我面前的现实,但对 15 年前的我来说,是完全想不到的,虽然,随着革命的顺利进展,到了最后几年,胜利前景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 15 年中,我们革命的力量在战争中壮大了,根据地巩固了,成片的解放区出现了,日本投降了,内战中蒋介石军队不断失败。历史向前发展,一块块里程碑在自己身旁后退了,因而,人民革命的全国胜利的到来并不突然。而今天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在鸣响。革命胜利了,政权是人民的了。今后即使还会有困难,还要奋斗,但是我们的事情总好办了。

到 1985 年我 70 岁时,总结自己参加革命 50 年历程,我又说了自己的一生,有两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在开国大典那天,我坐在天安门前时,没有想到我们很快地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这是我的第一个意料之外;也就在那个开国大典的时候,认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我们国家的事就好办了,没有想到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国的事情越来越难办,这是我的第二个意料之外。

1985 年 7 月,在我 70 岁生日那天,一些朋友和我聚在一起,我就讲了自己对参加革命 50 年(以“一二·九”运动算

起)的总结,我就这样在两个“出乎意料之外”中度过的。有了这两个“出乎意料之外”,我有了一个这样的觉悟:从一个“政治上黑暗,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转变成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文化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来就很难很难。这个过程的前半段,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夺得政权的时间,如果短了,后半段的改变政治上黑暗,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局面,转变成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文化上发达的局面,所需要的时间和经历的过程加在一起仍是很长很长。那时候,我已经70岁了,又有能不能活着看到“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富裕,文化上发达”的局面的问题,我认为在这里存在一个不以人们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规律性。

客观规律性是最强有力的,它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把孔夫子讲的“矩”解释为“客观规律性”,孔夫子讲自己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到了那个年龄,他对客观规律性已经掌握到了家,达到了“从心所欲”都不会逾越客观规律性的程度。我在1985年70岁,总算也懂得了上面说的那个规律。懂得这个规律逾越不了,自己也就比较有把握,不会再出现第三个“出乎意料之外”。在历史发展的问题上总是有规律可循的,不会出现什么奇迹,也不能期望出现什么奇迹,于是自己便心安理得,不再怨艾,不再着急了。当然不着急不是不努力,我还是主张提倡积极进取精神的。大家用自己的努力,尽量缩小从现在到“我们的事情好办了”那个时候之间的距离。

2003年,我88岁的生日已经过了,从70岁那年到现在

又过了18年。70岁时提出的问题,现在看来仍然存在。那时,我是怀疑是否能够活着看到那样的局面。现在我倒不怀疑了,我敢说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还是要为这样的局面的到来进行奋斗。我这个人是很顽强的。

49 10 政治课的今昔的见证人

在写《我的编年故事》第四册的最后部分——1949年故事——的时候,我想把1949年当时我在政治课方面所担任的职务,我在政治课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我了解的当时人们对政治课的看法,写出来给大家看看。

先说我担任的职务。我有一本介绍党中央在西柏坡时的文件,其中有陆定一给党中央写的关于当时中宣部组织状况的报告,就写有我和王惠德的职务名称,当时我和王惠德始终不知道自己担任的是什么职务。我们开玩笑地说自己是“部员”。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写政治课教材,那是没有问题的。

回顾我写政治课教材的历史,1948年调到中宣部后,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全国解放后我们学校的政治课写教材。当时这件工作是陆定一部长提出来的。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正确很重要。他特别注意的是中学,他认为中学生人数多,可塑性大。那时候已面临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陆定一考虑到了要在学校,而且首先在中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在延安时,我们只能吸引一些先进分子到那里去,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让他们接受革命生活的

锻炼。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对所有的青年进行这种教育。进行教育就要有教材,于是他就把写教材这项任务,分配给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承担。分工给我的有一本《共产主义》,一本《调查研究》。前一本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讲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一本讲了解社会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当时我们考虑到学生们了解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要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所以把它作为学生必读的课程。可惜前一本书没有能完成出版,后一本是在东柏坡完成,北京出版。但是没有能够做到各中学比较普遍地采用它。我们没有注意到,中间存在一个薄弱环节:谁来教?

我在这里重复讲这段在《我的编年故事》1948年的故事中已经讲过的事情,是想说这样一个意思,政治课的老祖宗是陆定一。不过他要求在学校教育中推开的方针不行。学习政治课需要学习者,要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当做学业来要求学生完成,基本上就不行。后来政治课不受欢迎,固然有形势的变化、课程内容的教条化、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有问题这样的原因,把政治课作为学校课程,应该说是根本原因之一。

回过头来说我在政治课方面的经历。我和王惠德还在香山的时候,城里经常有电话请我们去演讲。请我,我一般比较痛快地答应了。请王惠德他表示不去,可是说不出什么理由。对方也不依不饶地要他去。双方可以在电话里一次磨个半小时,而且往往会打两三次电话。王惠德在电话里的态度真好,可就是不去。我对王惠德说,你打电话的时间,跟你去做一次

报告的时间差不多,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打电话上?他就是笑而不答。

在中宣部从香山搬到大红罗厂之后,我们编写《中国革命读本》的事情,在向陆定一部长汇报后,得到陆定一的肯定。同时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中学使用这个读本作为政治课教材的可能性。关键还是教员能否解决的问题。能不能采取陶行知提倡的“小先生”的办法?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选了东城、西城各一所中学做调查。这件事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也是我还在大红罗厂的时候,协和医院派了李佩珊同志请我到协和医院去上政治课。对象是协和医院的院长、各科主任和其他高级医师。李佩珊同志当时是协和医学院的研究生。我想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是一回事。一般的大学基础课是在燕京大学学习,医学的专业课就在协和医学院上。医生就兼教授。李佩珊已经本科毕业在上研究生,是那里的党支部书记。我答应每周去讲一次,地点就在东单二条协和小礼堂。

我考虑听课的是医学专家,是学自然科学的人,就想出一个主意,讲自然辩证法。听讲的人不多,只有三四十人。我记得院长姓张,是内科专家。外科主任姓曾,是很有名的“一把手术刀”。这些老医生的情况,现在早就听不到人说起了。只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刘曾鼎,因为是我的亲戚,我知道还健在。

我给这些专家讲自然辩证法,结果很受欢迎。

我去协和上课是有报酬的,而我作的所有报告都是没有

报酬的，这次去协和讲课是惟一的例外，而且报酬还是用美金计算的。

每次去协和，李佩珊都陪我到协和食堂吃一顿午饭。

也就是由于我去协和讲课，后来我就设法把李佩珊从协和调到中宣部科学处，成了我的很亲近的老同事，现在还经常来往。

现在该讲 1950 年以后的政治课的事情了。我在讲这一年故事的小引里说为了把有些故事讲得有头有尾，免不了讲的范围超过 1949 年，讲政治课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

先再写一段《中国革命读本》。我和王惠德合写的《中国革命读本》是建国后第一本政治课教材。这本书 1949 年 8 月作为上册由新华书店出版。上册分两编 14 章。第一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共 7 章。第二编“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 7 章。出版后印刷了 11 次，即出了 11 版。1950 年我和王惠德把这本书的下册写出来了。于是在 1951 年 5 月出版新版。过去我一直叫这新版为“修订本”，其实应该称之为“全本”，“全本”增加下册第三编“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4 章，第四编“建设新中国”11 章。

这本书既然是我国政治课教材的第一本书，我就认为应该再好好地回忆一下。

接着再来写写《学习》杂志的事情。《学习》杂志从 1949 年开始办到 1958 年，办了近 10 年之久。在《我的编年故事》中我只打算写有关政治课的事情。

前面我写了一节讲“1949 年的《学习》杂志”。现在我接

着讲 1950 年和 1951 年的《学习》有关政治课的事情。

在 1949 年我除了当“部员”之外，《学习》杂志总编辑这个职务倒是很明确的。1950 年中宣部建立“处”一级机构，这时候我是政治教育处副处长，正处长由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磐石担任，张实际上没有来，处里的工作就由我完全负责，这个杂志社的工作就由我这个处去管。

《学习》创刊后一直是月刊，旨在帮助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政治课的概念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分的。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干部必须阅读若干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于是党的出版机关就出版了一套十二本“干部必读”。第一本是《社会发展简史》，第二本是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它们是苏联学者写的通俗著作。还有马恩列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帝国主义论》等等，还有两本原著的引证书，《思想方法论》、《马恩论中国》，我们就把《学习》办成帮助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政治课、学习“干部必读”的刊物。

《学习》在当时是一本非常畅销的刊物。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它能够帮助自己学习理论知识，艾思奇、胡绳、林澜青、张先畴、马午这些人发起创办这个刊物之后，我和王惠德继续把它办下去。刊物的销路一直很好，发行几十万份。艾思奇、胡绳有很大的号召力，做日常工作的林澜青、张先畴是老编辑。林澜青主意多，《学习》的栏目设计就很活泼。关于张先畴，我想再多说两句。我 1938 年去长沙，黎澍、杨庚、曹

国枢等在编《观察日报》时，张先畴也是《观察日报》的骨干。不过那次我没有见到他，他还有一个特长，那就是校对水平真是了不起。我和林澜青校对过几遍，以为不会有错的文章，张先畴往往又指出好几处错误。

我对《学习》所作出的“贡献”，一是写文章比较多。那时我当然不知道电脑打字为何物，而且写的字迹很潦草。《学习》在北京和平门外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印刷，那个印刷厂正式的名字似乎是“京华印刷厂”。一次编辑部为了同印刷厂的人联络感情，我和林澜青、张先畴请他们吃饭，吃到一半，印刷厂的一个人拿出一页稿纸，说我们本来是想到编辑部给你们提点意见的，希望给我们的稿子能够稍微清楚一些。像这样一笔十六七个字连在一起，是太草了一点。我们还没有去，今天你们倒先找我们来了。你们这么客气，我们真有点不好意思说什么了。他倒并没有要把手里拿着的稿纸交给我们的意思。可是我还是从他手里把那一页纸取过来。一看，是我在一页有格子的稿纸上用铅笔写的，而且是不按格子直着一行一行地写的。有一行我真一笔连写许多字，比他们说的十六七个字还多。

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学习》的栏目：除了每期都要约一些名家写重头文章之外，还十分注意能够使众多读者在这个刊物上讲出自己心中的疑问，看到理论水平比自己强的人对自己的疑问作出的解答；也能对某些问题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在这个刊物上同别人进行讨论；还能在这个刊物上，写一点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同别人交流……总之，刊物编辑部尽量为

读者提供说话的园地。表现在刊物上就是设立了“问题商讨”、“名著题解”、“读者笔谈”、“学习经验”、“学习心得”、“读书笔记”、“图书室”这些栏目。

后来,在《学习》上又开辟一个登载胡绳、我与王惠德三个人合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的栏目。这个栏目延续的时间很长。

除了《学习》杂志外,我们考虑到社会上还有在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比我们现在正在办的《学习》的读者低一个层次的人。他们的人数更多,不注意他们是不应该的。于是又创办了一个《学习初级版》,文章更短小,文字更通俗。

在这个《学习初级版》上先是刊登《政治常识读本》。这个读本为王惠德、廖沫沙、庞季云和我四个人合写的,共8章。我一个人写了第二、五、六、七、八共5章,其余三个人各写一章。在这个《学习初级版》上刊登《政治常识读本》时,同时刊登辅导学习这个读本的材料。包括“名词解释”、“问题回答”、“参政资料”和“怎样学习”四种。

八章正文和四种辅导材料全部完成之后,由《学习》杂志社出单行本。

以《政治常识读本》为中心的《学习初级版》是它的第一卷,刊登了一年的时间,接着刊登的是《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以《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为中心的《学习初级版》是第二卷。辅导学习这个读本的材料——“名词解释”、“问题回答”、“参政资料”和“怎样学习”四种的做法,同《政治常识读本》完全

一样。只是《经济建设常识读本》10章全部是我一个人写的。

这个《学习初级版》也发表各方面的言论，它仍旧带有杂志的性质，只是两种常识读本占的分量相对大许多。

《学习初级版》本身已经发行量很大，而这两个读本的单行本出版又有很大的销售量。

当时我们习惯把《学习》叫“大《学习》”；把《学习初级版》叫“小《学习》”。大小《学习》的重要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两本书以及那本《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都是非常畅销的书，每种都有多少万册，具体数字我说不清楚。

《中国革命读本》《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和《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这四本我参与写的政治课教材几乎囊括当时全部的政治课教材。在它们之外，只有一本胡华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是非常畅销的政治课教材。

政治课的路子后来是走出来了。行得通、见效快的就是办《学习》和编写《中国革命读本》。这样的办畅销读物的办法，这样的刊物和读本之所以能够如此畅销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在1949年取得最后胜利，对于我这样的人，尚且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对于革命阵营之外的人，当然更是如此。因而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根据什么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取得胜利。《学习》和那些读本正好适应这样的需要，所以才会有1949年、1950年、1951年那样的政治课局面。不过我那时没有像后来这样看得清楚罢了。

我是我国政治课历史的见证人。讲了这么一大篇，对于

我这个见证人的资格的审定,可以说就差不多了。

再重复一遍,当时知识分子对学习“政治课”热烈的情况,其原因分析起来,就是共产党这么快取得胜利,夺得政权,也是出乎全国各方面人士意料之外的。于是人们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他们听说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哲学,它的名称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不知道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个怎么样的东西,因此对“猴子变人”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人们还听说共产党的“主义”的基础是政治经济学,于是就想了解商品和货币,剩余价值和资本。当然人们还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于是人们很重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问。那时候人们对政治课的热情,同现在人们对政治课的冷淡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现在怀念50年前的历史当然可以,但是要回到那时候的情景是不可能的。在今天,要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政治课产生这么高的热情,就要等待新的形势的出现,那就是要见到改革更大的成效。如果我们从改革中见到了很大的、人们无可怀疑的成效,改变了人们现今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冷淡的观念,一个新的热潮就会到来。

当然在这里还要看我们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工作,要看我们能不能给出透彻说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问题,能够掌握群众的理论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巨大的信念,只能起使得他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件事情上坚忍不拔地进行下去的作用。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这种信念不起多大作用,他们要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

改革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事实,还要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拿出的使他们感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著作出来。

现在的政治课在学校里普遍地不受欢迎,就是在政治上觉悟高的干部中间,对现在的政治课学习也缺乏热情。坦率地讲,如果升学不考政治课,毕业生分配不看政治课成绩,干部提升没有政治课学习这方面的考核,要保持现在政治课的地位,我看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只要能够清醒地看问题,而不是像鸵鸟那样故意把头埋到沙漠里,是不得不承认的。

49 11 三大系统的政治课

党、政府、军队、政协、人民团体可以说成是五大系统。在这五个系统中,我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没有建立任何固定的或者长期的关系。人民团体中的工会和妇联也没有关系。青年团的政治课我也没有管,只是同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联系密切。1950年初,我只是给这本杂志随便写一些文章。比如我给他们写过关于中苏条约的文章。后来我就有意识写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我认为这实质上属于政治课性质的。建立了固定组织方面关系的当然是党,因为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而且担任政治教育处副处长。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回想起来没有用这个处的名义召开过什么会议,讨论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编《学习》和各种政治课教材。再有便是被请去在政务院人事部兼一个干部教育局的副局长,和到人民政协当他们的全国

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的顾问。因此这一节的题目用了三大系统的说法。

这一节讲的问题比较简单。政务院人事部的事是中央组织部向中宣部提出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这时候就兼政人事部部长。副部长是孙起孟，他的党派关系是属于民主建国会的。安子文不经常到部里去，孙起孟常去。人事部的工作安子文放手让他做。当时，我想他大概是一个身份没有公开的中共党员。政务院人事部的工作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完全相应的。设这样的一个部，是因为政府系统的干部人数很多，其中非党员干部不便由党出面去管，改变管理后也就不归中组部管。当然政府系统的党员干部，道理上中组部是可以管的，但是也不管了。设立的这个部是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做的。

政务院人事部设有一个教育局，局长名叫于光汉，同我只有一字之差，他是一个长期做人事工作的老干部。人事部干部教育工作他完全拿得起来，中组部和安子文要我去兼那个副局长，并不是要我做什么具体工作，无非要我对他们的工作指点指点，因此我在人事部开了几次会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没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做了。

至于要我去人民政协帮助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无党派高级人士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也是由政协正式到中宣部来直接找到我，表示希望我能够去他们那里帮助工作。来时告诉我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由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参加学习的座谈会。这些先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兴趣很

高,老说最好是有中共的理论家来帮助帮助,那样就好了。这个座谈会的工作已经设有一个干事会来组织,他们迫切希望我能够做中国干事会的顾问。要我这个顾问给他们出点主意,回答一些他们在学习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给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以上的人上点儿课。他们还告诉我,担任给那些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上课的,除我之外还打算请艾思奇。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请我,是政协李秘书长的意思。他们这样来请,我只有表示同意。

我到干事会去了解情况之后,知道有两个中年非党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负责。这二位因为与我接触得比较多,他们的名字我是一直记得的。可是有许多年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我一下子不能说出他们怎样称呼了。经过回忆也只有他们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这样朦胧的印象。但是他们工作尽职、很积极的印象,是很明晰的。他们自己真刻苦学习,啃大部头马列著作。我一到那里,他们就常提一些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比方他们问我“蒋介石是不是物质”这样的问题,我真没有考虑过该从怎样的角度去回答。

最近我发现在我的故纸堆里有一本这个干事会印的《关于讨论“唯物主义基本特征”中几个主要问题的试答》。我想单独写一节给大家看看。

在这一节我想讲一下给上述三大系统之外的《中国青年》写青年修养文章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是把这看做政治课范围的。我写这些文章的情景很特别。通常吃过晚饭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去。去前临时想好一个题目,到编辑部之

后就同杂志负责人(一般是丁磐石)讲讲这天我想写的题目。通常他们没有什么意见,我就在编辑部的一张桌子上动笔写。在桌子上有一杯水,一盘点心。渴了喝点水,饿了吃一点点心。同时我要他们找编辑部的两个女同志,一个是曹炎,一个是秦式(因为常抄,她们对我的字迹比较熟悉。同时她们利用空隙辨别一个人认不清楚的字迹)来抄我写的稿子,我写完第一页,她们就开始抄。我一页一页地写出来。她们就一页一页地抄,等我写完,不等她们抄完,我就开始看她们抄的稿子,边看边改,改完定稿,我骑自行车回去。到家的时间大约在晚11点左右。1951年10月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青年学习丛书”的《和青年朋友们谈几个思想问题》中的文章大都是这样,在晚饭后三四个小时一遍写成的。

49 12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 干事会的一个材料

上一节说到在我的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印的。封面上印了材料的题目《关于讨论“唯物主义基本特征”中几个主要问题的试答》。封面上还标明这个材料是“会内印刷品”。封面上还有人用毛笔写的“讨论中各组对试答的意见”几个字。我想最大可能就是上一节我说过的那两位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的工作人员之中的一个写的。

材料共12页,无论从材料的什么地方都看不出这材料是

什么时间印的、什么时间讨论材料中提出的问题和委员们发表意见的。当然凭我自己对其他有关情况的回忆我可以推算不能早于1950年也不能迟于1952年,那就是说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的某个月。具体时间就无法仅从这个材料判断了。

我也不记得这个材料是在什么情况下到我手中的,可以肯定也是上一节我说过的那两位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的工作人员之中的一个给我的,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为什么他们要给我看,不记得为什么这个材料会留在我这里,而且注意把它保存下来。而且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的这段工作,在我的个人档案里这是惟一的一件。

当时我一定会知道这《试答》是谁写成的。我想除了这两个工作人员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人。这个材料拿出去讨论以前,我决不会看过。《试答》的水平太低了,像是民主人士自己提出的。

不过这个材料还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材料中记录了不少民主人士的发言要点,而且各组对《试答》的意见,是有名有姓的,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当时许多民主人士的思想状况和他们对党的关系。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讨论中人们都发表了一些怎样的意见。

《试答》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物质的概念和规律的问题”。“问:哲学的物质概念和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有什么区别?物质是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面毛笔记的是“问

题的提法不妥。”在《试答》中有一句话说：“‘蒋介石是个物质’这句话，就可以有两种解说。一种解说是蒋介石是一个有嘴、眼、耳、鼻、五脏俱全，能直立行走的高等哺乳动物——人，这就是蒋介石这个物质的自然科学的定义。但对于革命的中国人民说，更重要的却是要认识蒋介石这个物质的哲学（包括历史唯物论）概念。依照这个概念，蒋介石之所以是个物质，乃因他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方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可以说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集中的代表。他的反动统治曾经有过400万以上的武装部队，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四大家族天文数字的财产和强大的美帝物质支持。这是阻碍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富强之路的最大的反动力量。但是就其所依靠的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说，这是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的东西，然而它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物质——客观实在。自然也有很多的物质现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在这一段话上所记的一个批语是“李秘书长（李维汉）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乃是看得见，摸得到的”。还有一个批语是“章乃器补充：哲学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的不同点在于哲学的物质概念较之更高了一级，它范围更大，包括了社会科学的内容”。没有记下名字的人的意见有“物质总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不过，看有不同的看法，摸有不同的摸法”。“还有的人认为，自然科学中的物质有的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接着提出的问题是“问：物质按照规律而发展是什么意思？所谓善于掌握规律就能胜利，是不是唯心论观点？”“答：任何的物质现象，

不论是自然现象或是社会现象,经常是处于运动或发展中的,但它的运动或发展,主要的并非依靠外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其自身内存的规律。这种物质的运动规律(或发展规律),是客观地固有于物质,而与物质共久远的。这种物质运动或发展的规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非得承认(接受)不可。它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对这个回答,“吴觉农主张物质的运动与发展主要的是外在力量的推动”,凌其峻主张将“改变”二字改为“反对”(最后一句话里面的‘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中‘改变’两个字)。

在这个回答中举了一个例子,其中说“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混合统治,由于它自身的内存规律,不管愿意不愿意,是必然要崩溃的”。上面“李秘书长认为蒋介石的崩溃并不是其自身的规律而且是有外力之作用”。也有人批“此事略嫌有点机械的倾向”。在例二中也有“我们主动地掌握了物质”上面千家驹认为本段说得不够。章乃器认为在此应解释如何掌握社会发展之规律。

这《试答》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物质和意识相互作用关系的问题。在问“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有什么区别?主观的能动性算不算唯心论?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又有什么不同?”时回答说:“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的主要区别是在前者重视思想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后者则只知片面地强调‘物质即是一切’,而根本忽略了思想意识的重大的反作用。根本上,思想意识是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但思想意识对于

物质条件反过来也有很伟大的作用。”有人批：“此处可补充说明机械的物质观是把物质看成死的没有发展的。”接着在回答中写道：“例如农民有要求革命的意识，这根本上是他受着封建的物质生活地位所决定的，但是他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理解了新民主主义的道理，他对于反帝、反蒋匪帮以及实行土改等的革命斗争就更加坚决了，旧的社会制度（物质）就会更快地被摧毁。重视主观的能动性，重视思想意识的积极反作用，正是革命的辩证唯物论的特色。”这时候上面记了陈铭枢的发言说：“主张将‘反作用’改为‘反××（字迹不明）作用’”。

在这一部分中，另一个问题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反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对于同一事物，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反映？为什么科学发达的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宗教、相信神？”这时就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现在的科学尚未到发达的时期。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说：“不同的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不同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所以蒋介石、美帝以及一切反动派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反映’）是永远把人民看做愚蠢无能的‘乌合之众’，只有革命派，尤其是工人阶级，马列主义者，才认识人民群众有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因为反动派的阶级利益在于剥削人民，所以他非敌视人民不可，工人阶级的黎明在于解放人类，所以他真诚地要团结各阶层的人民来共同奋斗。科学发达的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宗教，这一事实证明思想意识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上面所说的能动性，也就是从这种相对的独立性产

生的。所谓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就是它虽根本上产生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它并不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立即改变,旧思想往往会在新社会中残存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了,新的社会制度出现了,但是封建的、法西斯及至殖民地买办的思想意识不但现在,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还会残留下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思想才成为当前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明乎此,宗教在今天,自当有其‘存在的理由’。”这时候李相符又问:“主观能动性是否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属于同一范畴?”还有人说:“在此主要的应说明宗教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有其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存在。(思想的相对独立性)是主要的原因。”还有人在“新的社会制度出现了,但是封建的、法西斯及至殖民地买办的思想意识”处批“旧的社会制度也同样会残留下来”。这个问答的第三个部分中间“实践在认识上的意义如何?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于认识的作用如何?”章克善认为第二个问题解释不够明白。在这个问题回答到“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或作用,有如下数点:一,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或基础)”时,邵力子主张将“认识”二字改为“理论”二字。

上面批注的名字在名单中找不到“李相符”。姓李的不知道是不是编号。姓章的也有几个,可是没有“章克善”。

后 记

《我的编年故事》第四本现在写完了，算是还掉一笔旧账。我一直记得这笔账，而且一直认账。不过我这个人“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惰性特别大，很长时间老在别的地方动。《我的编年故事》的第三、四册就一直在恒静状态。去年，出版社催了我一下，有了推动力，就动起来了。今年我又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半年时间内一鼓作气，把这两册写出来，总算把它完成了。

这四本编年故事体裁不那么一样。中国的俗话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不过这几双草鞋没有打出一个样子。四双草鞋四个样子。我倒是有个希望，除了新出的《我的编年故事》第三、四册单独发行以外，第一册和第二册也重印少量，配上几百套。图书馆和个人可以看到全貌。我也可以送给亲戚朋友。不知道出版社愿否把一双一样的草鞋放在一起，搞一个统一的包装。我本人倒是不怕寒碜。事情是怎样，就让它怎样。你们这个出版社成立20周年，而我已经过了88岁的生日了，从头来试做统一样式的皮鞋，已经不可能了。